1502

高唐文史资料

海内外高唐人续辑

第十六辑

政协[illegible]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CHINA GAOTANG

中国高唐

聊新出准字（2003）-035

高唐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海内外高唐人续辑）
大 32 开本　7.75 印张　140 千字
印数：2000 册
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出版
聊新出准字（2003）——035 号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编审：李玉兰　曹俊山

顾问：郑宽亭　侯立中

主编：王　琴

编辑：王　琴　刘　刚

七届政协高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名单

（2003年5月政协七届二次常委会议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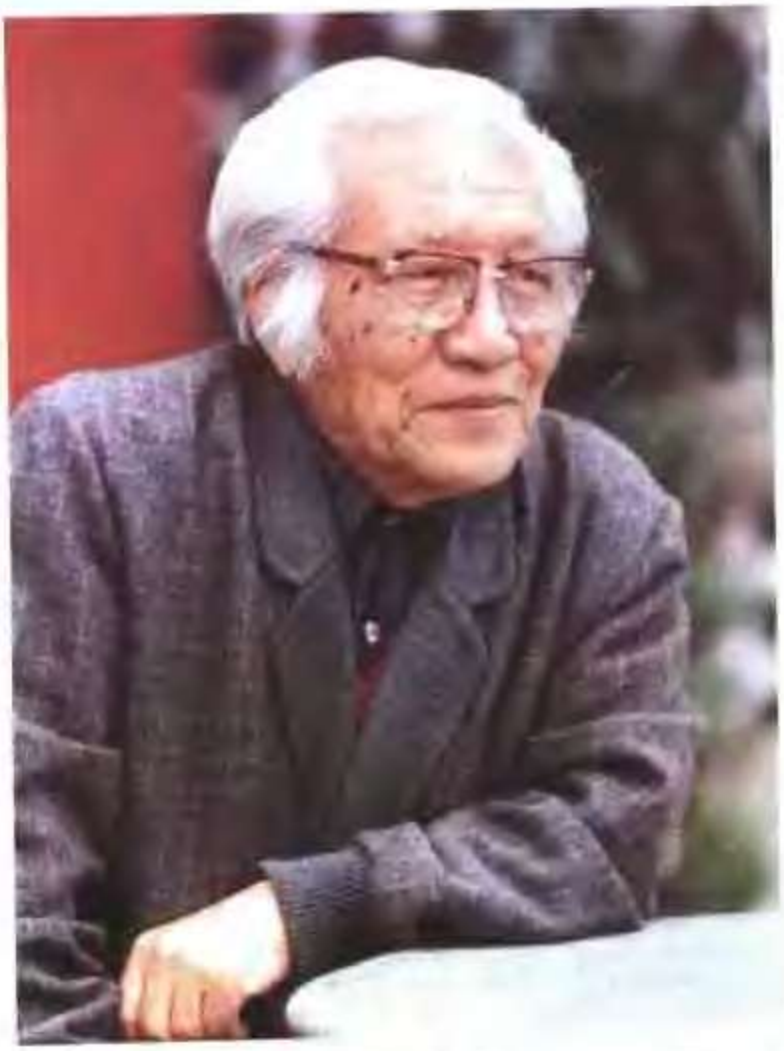
主　任：王　琴

副主任：云庆祥　金延莉

委　员：白玉华　朱宝华　任志红

刘春赋　白忠海　林爱文

军旅文人画家韩静霆



国画大师孙瑛（1997年5月）

孙瑛夫妇与少年儿童共度“六一”

延安抗日大学女学生王开近照

王开在统计工作会议上

杜鸣在演播室（1995）

杜鸣在国际家庭日庆祝大会上（2002）

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高级编辑姜德明

刘志诚近照

刘志诚（左二）与日本友人在一起

刘志诚（右一）在巴黎总商会举行的欢送宴会上

王国骧近照

刘福盛近照

外科主治医师刘福盛(右三)在手术台上

雷达专家周怀仁

周怀仁与海装部副部长赵登平在108雷达前

西陲曲艺家刘爱华

英语教研员韩民忠

高级记者杨风山

韩民忠(左二)与外国英语专家研究教学法

解放军第89医院骨科主任、军医大教授范启申

水产专家李振泉

李振泉指导渔业户养殖金鱼（1997年）

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著名画家李燕

航天科技工作者朱明华

文博专家陈昆麟

国家一级鼓师鲁华在演出中

鲁华（左四）在中国戏曲音乐国际研讨会上

军校博士生导师王连水

王连水与毕业生

北京市贸促会会长姚望

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生导师
王吉红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张根山（左一）
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视察

李振海博士

美国 DDI 公司董事长李振海与美国客户在双龙公司

海军油液分析专家刘东风博士在实验室

刘东风随舰艇分析油液

博士生导师张洪生

浦碧雯近照

生物工程专家魏东芝

前　言

为全面展现高唐在海内外工作的优秀儿女的风采，让家乡人民更多地了解他们对社会的突出贡献，以达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之目的，高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继去年出版第15辑《高唐文史资料》（海内外高唐人专辑）之后，今年又征集、整理、出版了这期续辑。

本辑共收编27位海内外高唐人的传记资料和近50幅图片。同去年相比，侧重介绍了成就突出的中青年。有多才多艺的文职将军、享誉中外的画坛巨匠、独步文坛的书话家、从事重点学科研究的专家教授、心系家乡的海外游子……他们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并以不同的方式为家乡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献计出力。他们是高唐的财富，是社会的栋梁之才。家乡人民为他们而骄傲。

本辑人物编辑顺序除韩静霆、孙大石外，其余均按出生年月的先后排列。

由于时间紧，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差错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征集出版有关高唐知名人物、重大事件、风土人情等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希望关心、支持高唐文史资料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亲见、亲闻、亲历的历史资料，弘扬高唐历史文化，使之更加绚丽多彩。

编　者

2003年12月

目　录

军旅文人画家韩静霆 …… 易　水(1)

附:韩静霆简介

走近孙大石 …… 张志忠(13)

记忆犹新 …… 王　开(30)

杜鸣与《爱晚亭》 …… 王琴整理(48)

故乡情 …… 王国骧(52)

姜德明的文学世界 …… 施斌杰(58)

附:姜德明自传

刘志诚传略 …… 张春亭(69)

自叙——告家乡父老 …… 刘福盛(86)

附:刘福盛简介

我从事雷达研制事业 …… 周怀仁(88)

我人生的春夏秋冬 …… 刘爱华(100)

求学之路与教学生涯 …… 韩民忠(117)

我的新闻人生感悟 …… 杨风山(123)

军医范启申简介 …… 文史科整理(133)

李振泉自传 ……(137)

国防科研一兵 …… 朱明华(141)

我的事业之路 …… 李　燕(148)

一片丹心鉴古今 …… 马怀超(164)

老兵新传 …… 张根山(172)

齐鲁艺苑一棵草 …… 鲁　华(178)
难忘故土深情
——我的军旅生活中的几个片段 …… 王连水(187)
创新永远是美丽的 …… 夏园园(195)
附:姚望简介
海外游子　情系高唐
——记美国 DDI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海博士
…… 曲海霞(203)
我向家乡汇报 …… 王吉红(208)
献身海军装备事业的人
——记博士高工刘东风 …… 文史科整理(214)
生物工程界的科技精英——魏东芝教授 … 乡　晴(224)
在科学的王国里遨游
——略述我的工作成果和治学体会 … 张洪生(231)
农业环保战线的女兵 …… 房　方(238)

军旅文人画家韩静霆

易　水

韩静霆其人:命运的弃儿与宠儿

1944年11月22日,一男婴在风雪夹裹的伪满洲国吉林小城辽源矿区呱呱坠地。那男婴命运多舛,就在他来到人间的前夕,他的父亲——一个有学问的有良知的矿工,因思念故土山东高唐,想回家看一看,正在为如何出伪满洲国地界费心劳神之际,突然大难临头:附近另一个也想回山东老家的人"伪造出国证"东窗事发(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从一地到另一地竟叫"出国",而且还须办证!呜呼哀哉!),蓄一撮猫屎胡的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把"伪造出国证之罪"安到了那男婴父亲的头上,大洋刀一挥:"监狱的干活!"

家里飞来横祸,丈夫身陷囹圄,生死未卜,如今又添了一张嘴,那男婴的母亲心如刀绞,自以为无力将男婴养活,遂用眼泪洗一把脸,将心头肉抱出家门,放在了一处雪迹斑驳的煤堆上。那男婴饥寒交迫,在风雪中大声哭叫,不知是对命运的诅咒与抗争,还是对生命的礼赞与歌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男婴命旺,他的哭叫声终于被人听到,被一户家境稍好的人家抱进家门。但一家之主看到家人从煤堆上拣来的这条小生命时,并未立即表态。

他找来一本“相书”，望着男婴的眉眼口鼻，与“相书”上逐章逐条核对一番后，方对家人笑了一下：“留下他吧！”

那男婴叫韩静霆。

韩静霆命苦，但却从小受到缪斯青睐，生命中隐隐有一群蝌蚪状的小精灵在控制他、驾驭他；他们不停地鸣叫、翔舞，让他激动，让他向往，让他每每产生幻觉：自己也成了一尾“蝌蚪”，加入其中，鸣叫、翔舞……八九岁时开始用铁皮罐头盒自己做胡琴（二胡），拉得吱吱嘎嘎，激情飞扬。10岁出头与小伙伴“集资”六元钱买了一把“真正的胡琴”，如获至宝，如鱼得水，很快就在小城里拉出了一些名气。不久后，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些斑斓绚丽的颜色、线条与图案，他不能自已，又拿起笔开始胡乱涂抹，弄得昏天黑地，大人们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自己却沉溺其中，如醉如痴。韩静霆没敢做“画家梦”。画家如神，遥远、高大，是一种光环，可望而不可及。他的“理想”是将来能到一家电影院去画海报。他知道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决定报考地区艺校，当然是考美术专业。迷上了颜色，并没有影响他对“蝌蚪”的挚情，他便背着那把“真正的胡琴”走进了地区艺校的考场，如县乡秀才之人贡院，如贡生之人国子监，惶惶不已，神圣不已。入座展卷，琴仍在背上，成为考场一景，引得监考老师和其他考生争相“刮目”，险些乱了考场秩序。背胡琴的考生最终没被录取，画海报的“理想”自然也无法实现，其后倒是给一家小工厂画了一阵子黑板报。

地区艺校美术专业把韩静霆关在门外，但“蝌蚪们”

不嫌弃他，16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进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到省城求学之初，没有地方住宿，他就蜷缩在长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一书包苞米面大饼子，几个咸菜疙瘩，外加一把价值六元钱的“真正的胡琴”，白天到艺校苦读，晚上回到火车站候车室，拣个干爽点的角落一躺，做梦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不知人生之苦、之难为何物。晚上，候车室的工作人员经常用拖把拖地，韩静霆常常被赶得贼一样“四处逃窜”。刚拖过的地面湿淋淋的，躺在上面照样打呼噜。几天后，拖地的工作人员就不再赶他了，因为睡觉之前，他那把胡琴经常把人弄得或雄赳赳，或喜洋洋，或悲切切。工作人员说：“这孩子以后有大出息。”再拖地时，就把韩静霆躺着过夜的角落空过去，给他留下干爽的一角。

如此少年，命运不忍心永远对他施虐。1963年，韩静霆踌躇满志地前去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福星高照，竟考了头名状元。然面命运还要再考验他一次，又在他脚下拉了一道绊马索，头名状元韩静霆又未被录取，理由是“没有档案”。韩静霆胆大包天，气壮如牛，提起笔一口气写了四封信，分别寄给宋庆龄和教育部、文化部和中央音乐学院等业务机关。这次干得漂亮，10月中旬，他终于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通知，让他写一“简历”，即刻入学。此时，全国各高校已开学一个半月了。韩静霆忘情一呼：“洒家来也！”背上他那把“真正的胡琴”急奔京城而去。是年，中央音乐学院共招收了七名新生，其中六名来自音院附中，从各省市招收的只有一名，就是韩静霆。

韩静霆在中国音乐最高学府苦读五年，以他的聪颖和勤奋，在音乐事业上“修成正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毕业后他并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走下去。先是到工厂劳动五年，然后穿上军装步入军旅。不知何时，他的魂儿被文学勾了去，一转身工夫，成了名作家：出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写话剧、搞电影、弄电视，样样出手不凡，屡屡拿奖，“火”得要命。后来还抽空写歌词，让歌星们大红大紫，拿大红包、大礼包，他自己只拿两盒烟钱。他不介意，大度地一笑：全当“洒家”扶贫了，另外还培养了歌手，一举两得，善事也。

看韩静霆作画：非作画，搏杀也

命运那厮做事还算公正，虽手段狠了些，但心眼不坏，他在给了韩静霆诸多苦难、坎坷的同时，也赋予他出众的才华。韩静霆心大、才高，成了红红火火的作家，那些跳动闪烁的颜色却仍在不停地向他频飞媚眼儿。韩静霆虽系良家子弟，但亦骨肉凡胎，且情感丰富，如何经得住“美色”诱惑！于是把居家阳台用钢窗封了，上面覆以铁皮作屋顶，里面空间只有窄窄的一条，仅可容纳一张写字书桌，权作画案。靠里的一面是碉堡般的水泥墙，其余三面皆为钢骨与玻璃，风在钢骨与玻璃的缝隙中自由进出，阳光如泱泱大水破窗涌人。铁皮“屋顶”与楼壁结合部有一裂缝，一下雨就漏。透风、透光、透雨，韩静霆遂为自己的“画室”取名“三透斋”，自号“三透斋主”。知命之年，又刻一闲章，曰“五十画童”。“五十画童”舒腰展臂，泼墨挥笔，大打出手，“三透斋”中骏马挟风，春花带雨，秋

叶凝霜。

韩静霆在“三透斋”中画得墨香盈宇，朱紫满堂。但“三透斋”毕竟太小，连斗室也算不上，充其量只可称为“升室”，虽足以容下“五十画童”心中的水墨朱紫，苍鹰神骏，奇山秀水，仙鬼人妖，却不时给他的皮肉一点教训——因空间太小，作画时稍不留神，钢窗或水泥墙就在他的胳膊或膝盖上警告一次。更何况韩静霆作画善大写意，喜欢大气魄，大精神，故也常常走出“三透斋”，借室作画，单位会议室、仓库均在可借之列，豪华简陋都不计较，能放开手脚就行，如孙行者之使金箍棒，天宫龙宫都是好去处。

韩静霆作画喜酣畅，忌雕琢，电闪云阁，腾蛟起凤，流水落花，绝无扭捏拘谨瞻前顾后举笔不定之态。一般画家作画，喜独居画室，韩静霆不，有人在侧，画性愈浓。笔者曾多次看他作画，每每被其运笔、用墨、姿态、表情所动。看他作画，是一大乐事、趣事。日前在京某驻军单位会议室内，观韩静霆作残荷，简直就象看一场角斗：只见“五十画童”将四张六尺整宣在十余米长的会议桌上并排铺成洁白一片，右手执如椽大笔，在黑瓮中一蘸，转身箭步挥将过去，笔端划过宣纸时“嚓”然有声，恍若利刃划过石壁之声；忽而弓步，忽而跨跃，挥臂幅度之大，完全不似作画，倒有几分刀剑相搏之姿；面部亦被心中激情趋动，忽而横眉立目，忽而笑逐颜开，表情丰富无比，变化万千。一阵“嚓嚓”过后，八九株或斜或弯或折的残荷之“茎”跃然纸上。韩静霆后退一步，略作审视，忽又向前，左手抓

过黑瓮，将半瓮浓墨尽倾纸上，旋即又倾以朱黄等色，右手中不知何时已执四支画笔，每道指缝各夹一支（手指如再多出几个，他手中之笔一定还多！）；忽而将大小不等的四支画笔轮番探入墨中，“混战”一通，忽而将笔扔在一旁，箭步跃起，双手擎起宣纸，上提下抖，左倾右斜，十八般武艺一齐上，只是不见一般画家作画时的固定套路与章法。如是，“激战”一个时辰，衰叶、枯蓬、残英迭次化处，一幅大写意《残荷图》赫然浮出“白色水面”，似有残蛙弥漫，飒然秋风。韩静霆直了一下腰，换了笔，在空白处即兴题诗，转瞬即成十数韵，诗画相映，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浑然天成。诗题完毕，韩静霆掷了笔，跃上一把椅子，审视整幅画面，喜上眉梢，脱口自语道：“好，好！”笔者哂言其作画时的表情姿态，韩静霆笑道：“非作画，搏杀也。”

韩静霆作画，他那位聪慧伶俐多才多艺的知音伴侣王作勤多在侧，或帮他展纸捧墨，或不时递上一杯热茶，间或还提一两条“宝贵意见”。某日，笔者子一会议室观韩静霆作巨幅《风雪八骏图》，韩夫人开始未至。稍顷，为“五十画童”送一袋脆枣来，继而又出去买来冷饮，我是朋友，沾“五十画童”之光，不劳而食。韩夫人诙谐幽默，妙语连珠，笑称自己是“五十画童之书童”。韩静霆笑道：“有如此聪慧体贴之女书童相伴相助，画不出好画来，还能怪谁呢？只嫌年纪大了些，若书童年纪轻些，我画得会更好。”言毕，投入墨海，一画就是四个小时。待八骏蹄声、啸声与风雪之声浑成一片，题诗业已完成，韩静霆掷笔于案，笑道：“痛快，痛快！”此时方感疲惫不堪，想坐下

休息一会儿，但过去因背老父登医院台阶留下后遗症之脚踝，却已僵痛如木。遂做金鸡独立状，单腿跳至椅前坐下。笔者望着画面上踏雪追风的马蹄打趣道："马腿雄健，画家之腿却出了毛病。""五十画童之书童"笑出一个"妙"字，但明眸中却分明透出几分心疼来。韩静霆亦大笑，随即道："有画作足矣！"

韩静霆作画，"胸无成竹"，更不象某些画家须先用铅笔勾出草图，他只略作筹划，落笔后全由激情与才华支配（他写作亦如此，初稿即定稿）。画到忘情处，如鱼在水，倾碟倒瓮，朱紫四溅，脸上不时溅上墨迹，稍事勾画，即可登台救场唱花脸。且每每废寝忘食。常人都把"废寝忘食"视为苦事，韩静霆却道："此言差矣。画到不能入睡，是兴奋，是神欢体轻；画到忘食，是书画可以代食，是极佳心境，何苦之有？"每有神来之笔，或画出自己得意之作，韩静霆便情不自禁，"自卖自夸"，或连声叫"好"，或大呼"痛快"，颇有几分古代英雄之风采，"五十画童"之情态，可掬、可爱。

韩静霆的画：文人画文人精神

今秋某日，笔者在京城一部队招待所内，见两外地人站在一幅画前观赏，遂走将过去。一看那力透纸背的走线，那与众不同的用墨和超拔飘逸的画境，便断定是韩静霆的手笔，一看落款，果然是他。那两个外地人也多少懂些为画之道，边看边指点议论："这画不俗，很有个性。""这画家怎么和写《凯旋在子夜》的作家重名？"笔者窃笑。韩静霆的画个性鲜明，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别人画不出

来。

韩静霆的画多为大写意，弃繁去冗，遗貌取神。如水中之冰山，大部分隐于水下，只耸起一股凛然之气；似云中之虬龙，只探出趾爪须齿，云后便传出雷暴之声。用墨诡谲多变，走线如利刃裂帛，画境雄阔博大。鸿幅巨制自不待言，即便是尺方小品，亦透出大气、豪气乃至霸气，小画亦有大精神。他之作画，看上去随心所欲，不见常人惯用的传统章法，但其画风画技均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深厚底气的。

乍一打眼，韩静霆的画几乎不见传统，但细品后，就会发现有着很深的传统功力。他曾撰文"跪着挣断脐带"。曾跟随大师齐白石的大弟子许麟庐先生苦修十年，又独自参悟十年；曾拜明代青藤道士徐渭为大写意的祖师爷；曾愿做"八大山人门下走狗之走狗"……

韩静霆跪在传统面前，复进入传统之中，然后羽化，破茧而出。他之为画，使的是一条在传统中淬砺，又从传统中杀出的"韩家枪"。他之运笔，如武士手中之剑，将真气逼于锋刃，力敌千钧。某次作荷，画荷茎时竟一连画烂三张宣纸。他之用墨，忽而"挥霍无度"，忽而惜之如金，间或辅以诸多"韩氏技法"，朱紫姚黄，云蒸霞蔚，雪泥鸿爪，气韵天成。

仅有这些，还不能算是"韩画"，他还须有韩静霆独特的诗与字相佐。韩静霆出口成章，每作完画，必以"野"而不俗，独成一体的书法题诗作文于其上。他之题诗作文，亦如其作画，口中念念有词，笔下蛇走龙腾，进入境界便

如春江流水。他作巨幅《唐皇游猎图》，画毕，稍作吟哦，挥笔题道："多情天子唐明皇，笙歌弦舞动未央。华清池摇玉环影，秦岭路遗荔枝香……"画面空白处转瞬已满，续纸再题！洋洋洒洒六十韵，一气呵成！意境雄阔，韵律铿锵，诗画相辅，满纸生辉。

韩静霆以文成名，是文人画家。"文人精神文人画，文人画文人精神。"他说，如果他写绘画箴言，很可能就是上面这句话。他画荷、马最多，各不下数百幅，甚至上千。他笔下之马，非厩中之马，亦非辕中之马，乃心中之马；他笔下之荷，非塘中之荷，亦非湖中之荷，乃心中之荷。荷之出泥淖而自洁，清香远播；马之临深渊而腾跃，踏云追风。或许韩静霆以为，唯此二物，最能代表文人精神。由此及笔下万物，韩静霆的画，无论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抑或鹰犬兔马，仙鬼人妖，无不洋溢着一种超拔俊逸、高贵不俗的精神。韩静霆的画、诗、书均高标不俗，且浑成一体，如人之躯、股、臂，如花之茎、叶、蕾，画境、诗境、书境相辅相融，透出一股擎樽舞剑之英气。

韩静霆临纸挥毫泼墨，意趋笔动，笔意合一，淋漓恣肆，其狂野情态如入无人之境，但在艺术上却几近苛刻。他曾将过去所作的数百幅画付之一炬，自称"曾作废画三千"。命运感其虔诚与才情，遂在成就他的文章后，又成就了他别开生面的大写意画风，已在圳、穗等地举办过三次个人画展，《韩静霆画集》业已出版。今年六月，中国最高美术殿堂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盛况空前的"韩静霆文人画展"。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夫人莅临观看了画展，全

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观画并称赞其画作独具特色。倪萍友情出场，主持了开幕式，空军政委丁文昌为展览剪彩。部队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展览取得了成功。

韩静霆甚是了得。以后他还会干什么？文学是他忠贞不渝的“发妻”，帮他当了作家，当然不能丢下；绘画是他苦恋多年的“情人”，让他成为画家，自然也不会舍弃。但此人乃一“情种”，又自恃才高，难保“感情专二”，没准儿那一天，他还会再“移情”命运深处的那张琴呢，那可是“青梅竹马”！

（本文原载1997年《军旅文化天地》第九期）

附：

韩静霆简介

韩静霆原籍高唐县尹集镇唐洼村，1944年11月12日生于吉林省东辽县，中央音乐美院毕业后从军，现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视协、剧协等会员，是空军文职少将。他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履历：关东鲁人，文学甲虫。白石徒孙，痴魔画童。音苑学子，久废琴声。空军儒将，纸上谈兵。

韩静霆将军是位艺术通才。其早年便以聪慧而闻名，诗琴书画，无所不好，后以文学名世。作品《孙武》（长篇小说及20集电视连续剧、话剧）、《凯旋在子夜》（长篇小说及11集电视连续剧）、《战争让女人走开》（中篇小说及

电影)、《市场角落的"皇帝"》(中篇小说及电视剧)、《大出殡》(长篇小说及22集电视连续剧)、《人猴共舞》(长篇小说)、《远的云、近的云》(无场次话剧)及歌曲作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希望》、《男子汉去飞行》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军"八一"文艺大奖(两次)、全国图书奖(三次)、广播电影电视部"星光奖"之"优秀撰稿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次)、全国畅销书奖、全国青年最喜爱作品奖;影视作品获"飞天奖"、"金鹰奖"、上影厂最佳编剧奖、全国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部分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课本,他因此闻名遐迩。

他更精通乐理和影视艺术,担纲总撰稿并策划的国家级盛事有: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1992、1993、1994)三届,国家文化部春节晚会(2000、2001)两届,首都欢庆香港回归、首都欢庆澳门回归大型文艺演出,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世界妇女大会、第六届(2001)和第八届(2003)少数民族运动会、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2003)、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西湖博览会(2003)等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及多部大型晚会和话剧的总策划,被艺术界誉为"千手观音"。

他与国画艺术更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几十年来孜孜以求,涵泳万象,并从中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情。美术作品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7),并在广州(1995)、福州(1994、1995)、哈尔滨(1993)、太原(1998)、澳大利亚驻华使馆(1997)举办个展,在北京音乐厅与澳籍女画家合展(2000)、英国伦敦三人联展(2001)。作品多次参

加全国性展览。部分画作分别为澳大利亚总理、瑞典皇室、日本桥木家族及著名收藏家收藏。

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广州、福州、杭州、哈尔滨、山东电视台对韩静霆均作过专题介绍，海内外报刊载文称其为“奇人奇画”、“文坛奇才”、“关东怪才”。

走进孙大石

张志忠

引　言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马颊河畔，有两个相隔不远的村庄，一个座落在河东，一个座落在河西。在这两个不大的村庄里，走出了两位同世纪的大画家——李苦禅和孙大石（原名孙瑛），这在中外画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李苦禅已有定论，堪称一代宗师。孙大石于1982年从美国回国定居，孤军奋斗20年，靠自己的实力也奠定了在中国画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深，其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短短二十年，孙大石从国内画坛陌生之人，到被画界公认的大家奇才，其奥秘何在？概言之：源自孙大石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源自他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源自他那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经历，源自他那豪放大气、撼人心魄的艺术作品。他是一位漂泊海外多年、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爱国画家，他是中国水墨画的鬼才、放出异彩的天才，他的作品被誉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高度合流。

坎坷经历　传奇人生

自古英才多磨难，孙大石的童年是在不幸和凄惨中

度过的。他幼时家贫多病，母亲深怕他夭折，到处求神拜佛，并让他拜一巫婆为干娘，每逢节日便前往干娘家送礤头。为求身体结实、生命长寿，母亲给他起小名叫“石礤儿”（这也是后来大石之名由来）。可惜母亲命薄，孙大石九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失去了慈母，他的童年便在屈辱和苦难中煎熬。正如他后来在日记中所回忆的那样：“幼丧母，家道贫，薄袄破裤西北风。树下扫黄叶，堤上砍古藤，篓不满，叶飞腾，回家继母骂不停。腹中饥，天寒冷，西邻炊烟飘向东。独自南墙依，含泪涕无声，天色晚，人已静，空腹上床到天明”。

孙大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只知道自己是属羊的，后来填表格时，推算为 1919 年，出生的月和日不能没有，自己就定了十一月初八。在他不幸的童年岁月里，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爱上了绘画，大自然成了他绘画的老师和摹写的对象，有时树枝和手指成了他的画笔。他在童年时期便为四叔孙学忠画了《苏武牧羊图》。去夏津学徒，在皮箱上画装饰画，令他的绘画师傅惊讶不已，预言这孩子将来在绘画上准有出息。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十八岁的他从此步入了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也许是上苍的保佑，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慈母九泉之下的祈祷，在每次生命的关口，他都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历了不知多少危险，我是该死而未死之人，我这条命可以说是拣来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在那漫长的抗战岁月里，他

的画笔始终不离手，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地画家。1942 年，西泠印社展览部主任、知名画家、鉴赏家周礼在孙大石画作上题道："大家在精神，名家在气象，骨性天成，各行其是。此帧骨格盎然，堪称佳作"。周礼把自己创作的两幅山水精品画赠于孙大石。1943 年，孙大石完成了防空洞素描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人物造型、明暗关系已十分准确。从他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中，已显露出一位画家的气质和天赋。

在战争岁月里，使他终生难忘、对他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他找到了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相敬如宾、貌美贤惠的终生伴侣——谢从玉女士。他们结婚之前，虽然有段小小的坎坷和磨难，但孙大石的执着、谢女士的忠贞，终于成就了这段郎才女貌的良缘。他们从结婚至今，已到了钻石婚龄。六十年间，他们奔波在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地球的东西两端，经历过战争与爱情的考验，也经历过暂时离别的痛苦（1949 年至 1950 年，孙大石在台湾曾因思想左倾被关押受训一年。期间靠谢女士白天往返几十里路卖菜，晚上给附近的仓库缝麻袋来维持生活并照顾被关押的丈夫的生活）。到了晚年，两个老人为纪念结婚六十周年，他们请北京著名化妆师，打扮成现代的新郎新娘，举行了钻石婚合影留念。在中外画界，从始而终相爱六十年的夫妻并不多见。

第二件事：1946 年孙大石在汉口知遇丰子恺先生。与丰子恺的相识，成为孙大石绘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丰先生的绘画思想、人生观念对孙大石产生了重

大影响。“生活即艺术，人人皆可成为艺术家。”“人类生活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的，二是精神的，三是灵魂的。”“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足以言画。”这些朴实而富有哲理的艺术观、人生观，鼓舞和激励着年轻的孙大石。“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这首丰子恺自撰并书赠孙大石的七言诗，正如毕加索用笔下的和平鸽来诅咒战争、渴望人类和平一样，透露着丰先生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渴望之情，也成为孙大石后来辞去军职，步人专业画家行列的前因之一。这幅六十年前的书法作品，现陈列在孙大石美术馆。

从 1953 年到 1973 年，是孙大石在台湾辞去军职成为职业画家后，奋斗、探索、成功、辉煌的二十年，他就象艺术王国里的一匹野马，充满着活力与竞争力，充满着激情和创新，充满着勇气和挑战。他的绘画理论达到了当代美术理论家难以达到的高度，他的美术作品又充实、丰富、佐证了他的美术理论，他的名气已誉满台岛和日本。

他曾把自己比喻为大海里的鲸鱼，台湾已难以盛下他这条鲸鱼，他要向更广阔的世界空间发展，他愿意冒险去挑战人生和艺术。“如果把人生当艺术看，有变化、有创造，才是人生的真谛。”“上帝已为我安排了新路，我要赴美国开辟新天地，我要把上帝赋予我的绘画天才尽情地发挥出来”。他放弃了在台北舒适安逸的生活条件，去挑战未卜的未来，这是常人难以做出的选择，这就是孙大石。他坚信：人生就是自我的不断超越，人生就是向更高

目标的挑战，人生就是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绕路走，路是人走出来的。1974年他应美国二十一世纪画廊及纽约圣若望大学美术馆之邀，赴美讲学举办画展并全家定居旧金山，定居美国是他步入中老年之后的又一重大人生转折。

现实与理想有时是有距离的。初到美国后，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羊闯入驴群中，处处觉得别扭。他的国画作品一时也难以被美国人接受，全家的生活曾一度陷入窘境。为了生活，他改画水彩，并用炳烯和水墨颜料创造了布上水墨画。他在美国纽约、加州、旧金山、威斯康辛州等地举办了个展，进行了广泛的东西方文化对话。靠勇气，靠实力，靠创新，他在美国画界站稳了脚根，他的作品销路一直看好。《世界日报》、台湾《中央日报》等媒体对他成为美国职业画家和他的艺术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他的美国之旅获得了成功。在美国靠优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安度晚年了，他该歇歇脚了。但是安于现状，不求进取，这不是孙大石的性格。成功——开拓——再成功——再开拓，这才是孙大石要走的路。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孙大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他要回祖国大陆发展国画艺术。他认为，国画的根在中国大陆。当时国内"左"的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国，国内政策多变，政治运动频繁，你又有从军国民党部队和逃往台湾的历史，前途难测。孙大石不是搞政治的，但他相信中国不会再

发生文化大革命了，中国大陆正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祖国需要有识之士回国创业、为国出力，祖国大陆才是发展国画艺术的大海，是鲸鱼、是蛟龙就要到大海中遨游。1982年他携夫人毅然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了他晚年人生经历的又一大转折。

这次挑战和冒险，他又获得了成功，祖国欢迎海外赤子的归来，靠他的艺术经历、艺术作品和成就，祖国给了他很高的政治荣誉和艺术头衔，他的艺术创作也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时期。使他感到最欣慰的是：他与高唐县人民政府在风景秀丽的县城中央鱼邱湖北岸，合资修建了孙大石美术馆，这是他人生的最得意之作。

命运的安排有时是不公平的，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死掉，有的人一生在悲苦和平庸中度过。但有时又是公平的，命运之神虽然没有让孙大石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没有让他象齐白石那样遇到陈师曾、徐悲鸿等贵人相助，命运之神让他经历了过多的磨难和坎坷，却赋予他坚强的毅力、不断探索的精神、自学的能力和绘画的天才，给了他大海般的胸怀、火山样的激情，让他读懂了造化和人生这两部天书，让他有了好的归宿。他少年从高唐出发，步人了广阔的人生。祖国大陆，除了西藏没有他的足迹，其他各地都有他的脚印；世界五大洲，除了非洲他留下了未到的遗憾，其他各大洲都有他的身影。他围绕地球转了一圈，晚年又回到出发地定居，这简直就是人生的奇迹，是难以解释的造化。“肺腑知音唯画笔，终生伴我谋生机。大洋两岸任我居，地球东西换空气。”“为国事枪林弹

雨，存余生走遍天下。挥画笔翻天覆地，大丈夫四海为家。”多么朴实！多么豪迈！“我站在母亲的墓前来鞠躬烧纸，她的儿子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绕地球一圈，回来给她立碑。我想如果母亲地下有灵，她老人家也会万分高兴的。能如我经历过这些事情而活得有声有色者，恐为数不多。”

而今，孙大石先生已入耄耋之年，虽然他把生与死、荣与辱、名与利已看得很淡，虽然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那生命之火仍在熊熊燃烧。他认为做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不容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有前进的动力、奋斗的信念和争取的目标。他打算假如活到九十岁，正是2008年，他要在北京举办庆奥运孙大石九十诞辰书画展，他要和死神赛跑。如果说，毕加索是西方画坛的一座火山，那么孙大石就是东方画坛的一座火山。

爱国爱乡　世人楷模

孙大石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画家，他的人格魅力通过他那爱国爱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早在美国时期，他便时刻思念着祖国，“梦里回国喜悦泪，醒来凄凉夜不寐。”他曾在一幅画上题道：“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更爱祖国的绘画艺术，为了生活而画西洋画，痛苦，痛苦。”他在美国生活了八年，但只有在美国定居的绿卡而没有加入美国籍，究其原因只有一个：他不肯举手宣誓——誓死效忠美国。他身在美国，心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变化，他盼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1982

年他冲破重重阻力，打消种种顾虑，与夫人一起毅然回到祖国，实现了海外赤子落叶归根的多年梦想。

回到祖国，他亲身经历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他挥笔写道："少年立志在四方，足迹踏遍远重洋。看遍人间天下事，泥土仍是老家香。"挚诚的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看到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感到格外亲切，他创作了一系列爱国题材的作品：有描绘祖国建设风貌的《潘家口水库》；有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五岳独尊》、《轻舟徐行浪静中》；有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万山不隔中秋月，海峡难分骨肉情》等。孙大石不但用画笔来倾注他的爱国情怀，更用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例来回报祖国母亲对海外赤子的爱。

孙大石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事例，在国内书画界，在他的家乡——高唐，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他多次向中国残联、宋庆龄福利基金会、民政部福利基金会等单位捐钱捐画。1990 年以来，他捐资上百万元与高唐县人民政府合资修建了孙大石美术馆。目前孙大石美术馆已成为高唐县精神文明建设、书画之乡建设的重要窗口，成为鲁西文化事业上一颗璀璨的明珠。1995 年—1999 年，孙大石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收藏的书画精品、文物、藏书等全部无偿捐赠给高唐县人民政府，为高唐人民，为高唐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

为了促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1996 年他为高唐一中捐资 20 万元，设立了永久性孙大石奖学金，每年奖励优

秀高考入选生。目前，这些受益学生有的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有的已出国深造、有的在读研究生。他们每年都把自己的工作收获、学习成绩向孙大石汇报。孙大石每当读到一封封莘莘学子的来信，心灵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孙大石的学历不高，他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更深知文化的重要。为了使家乡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1998—1999 年他捐资 80 万元，在他的故乡——三十里铺镇孙庄，修建了孙大石希望小学，并为学校装备了微机教室，目前这所学校已成为当地的中心小学。每年“六一”儿童节，孙大石都要自己出资为全校每位学生买一份价格不菲的学习用品。他挂念着孩子，也牵挂着家乡的老人，为了让他们能愉快地安度晚年，他出资为孙庄老人修建了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室，又为村里修了水泥路。为国家，为家乡，他提出了多少合理化建议和提案，他资助过多少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他是一位富翁画家，又是一位贫困画家；他什么都有，什么又都没有。他把一切都无私捐给了人民（包括他居住的房屋及所有陈设）。他的生活很俭朴，甚至舍不得买一包餐巾纸，但只要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他却倾其所有，慷慨相助。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他的捐款，他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捐款达到几百万元，这些钱是他的血汗钱，是他从工资中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和山东电视台《天南地北山东人》节目组对他进行专题采访，面对镜头，他说的话很朴实，却感动了现场的每个人。“既然是一个人，只有凭自己的良心，尽做人

应尽的义务足矣。”“一个人能有力量帮助别人，就是幸福者。”“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何其短暂，用这短暂的时间，做点有益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人活在世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生是什么，如果不理解人生的意义，不管他的权势有多大、财产多富有、知名度多高，都是白活一生。”“钱多了，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连卫生纸也不如。”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话套话，但句句闪烁着博大的宇宙观、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光芒。

河北省易县一家民营古砚雕刻厂经理被孙大石的人品画品所感动，自愿无偿投资雕刻了天下第一砚，献给孙大石。此巨砚重十吨有余，五位石匠雕刻三年而成，雕有八十七条龙，分别代表直辖市、省市自治区和五十六个民族，另雕有长城等。中央电视台及多家报刊对此砚均有报道。1999 年孙大石把该巨砚又捐赠给高唐县人民政府。孙大石那炽热的爱国爱乡之情，透明的为国为民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

孙大石——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画家，他永远属于祖国，永远属于人民。

一代大师　百年风范

孙大石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成功之路，他的艺术作品，是他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由一位业余画家步入了职业画家的行列。他广泛涉猎各画种，吸收各种艺术手法，融会贯通，为己所用。1951 年他的油画作品《抢救光

隆轮》,获台湾全军绘画比赛一等奖,受到台湾当局最高行政长官的接见。他以此为发端,开始了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断冲刺。1957 年他与胡奇中等人在台北举办联展,轰动台岛,同年倡导成立了"四海画会"。翌年,在高雄市举办第一次个展,又获成功。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是孙大石在艺术道路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1960 年他加入台湾最高美术组织——中国画学会,并当选为理事;

1961 年他被国立历史博物馆聘为参加巴西第六届国际现代画展评选委员,并在高雄市举办第二次个展;

1962 年他应邀参加香港第二届国际沙龙展;

1964 年应邀参加在台北举办的中国现代水墨画联展;

1965 年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台湾);

1966 年在台北国际画廊举办第三次个展;

1967 年应柴原雪女士的邀请,在日本东京大和画廊举办个展,被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纸佐马誉为"中国水墨画的鬼才。"大和画廊与他签约,邀请他每隔一年前往举办一次展览,这在大和画廊的历史上首开先例。同年获中国画学会最优画家金爵奖。

1968 年他同刘国松等人筹组"中国现代水墨画学会",被选为副会长兼执行主任委员。

1970 年至 1972 年,他连续三次在东京举办个展,盛况空前(刘海粟享誉扶桑,那已是后话了)。日本权威美术

评论家田近宪三写了专评:“在水墨画界,出现了一位放出异彩的天才。”“他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属于现代的,而同时又能把握古典的高雅。”“他超越了前人的束缚,而自由奔放地踏着古人所开拓的广阔境界向前迈进。”“他把描写大自然的磅礴气象,以现代的感触更深一层地融化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开拓了属于他自己的境界,再加上他的天才横溢,终于创出了一条独自的道路。”田近宪三在文章的最后深有感触地写道:“水墨画在我国,曾一时呈现出沉滞现象,所幸现在又有了复兴机运的到来,而孙大石(原名孙瑛,号大石)先生的作品在我国的展出,将不知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台湾媒体《自由生活画刊》、《中华日报》、《中国晚报》等著名报刊,都对孙大石作了专题报道和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的毕加索,未来的张大千”。岭南派国画大师赵少昂给孙先生来信,求一幅净墨山水作品,“以示院中诸弟子”。赞扬孙大石的画“独具新意,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赵少昂特意创作了一幅花鸟精品赠与孙大石。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称:“古典式的中国绘画到张大千算是真正结束了,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绘画,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美术现状考察来看,孙瑛堪称具有开拓性的艺术家。”

孙大石的作品风格,大气磅礴,中西合璧,激情四射,独具风貌。1965 年他创作的《红岩》,进一步运用了夸张笔意,几笔顺势下扫的山石代替传统的皴擦,几朵红点把具象山花杂树进进行了抽象的处理,山体与渺远的天空间,点缀几艘小船,给画而增强了无限的空灵和动感。他

在画上边题道:“画无派,字无体,秃笔横扫写自己。”他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他1970年创作的《山庄云彩》,是一幅神来之笔的作品,他已完全摆脱具象的束缚,而进入了纯粹的精神世界。他创作的巨幅国画《台湾横贯公路胜景》、《山水通景》、《泼墨山水》等,气吞山河,震撼人心,既有雷霆万钧之力、墨龙飞舞之势,又有精心收拾、苦心布局的细微之妙。

1974年至1982年,孙大石定居美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中西文化对话。在美国他多次举办个展和讲学,西洋画创作有了新的飞跃并创造了布上水墨画。这八年是他在绘画道路上进行中西结合的探索时期。

1982年他回国定居,迎来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在人民大会堂,国画大师李可染、吴作人欣赏并高度赞扬了孙大石的作品,他被吸收为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应邀参加了“中国现代绘画苏联巡回展”。1984年他与刘国松等六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台湾画家六人作品展”,并在西安、上海等地巡回展出。国内书画名家对这次画展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侨联主席、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会长。1986年他应邀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当代中国画展”。同年应柴原雪理事长的邀请,肩负祖国艺术界的重托,携带自己和刘海粟、李可染、叶浅予、黄胄、董寿平、刘开渠、吴冠中、赖少其等名家的作品赴日本参加“亚细亚第二十二届现代美展”。1988年与董寿平、黎雄才参加“亚细亚第二十

三届现代美展”。翌年，参加“全国名家联展”。1991年日本东京美术馆举办“孙大石近作观赏展”。1992年参加在前苏联举办的“中国绘画巡回展”。199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孙大石归国汇报展”。而后又在济南、青岛、烟台举办返乡汇报展。他的作品被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社、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等近百家单位永久收藏。1995—199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两次出访，用他的作品做为国礼赠送给澳大利亚、智利、古巴、新西兰等国家首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为他颁发中国文史馆馆员聘书。2000年被文化部授予跨世纪画家寿星荣誉称号，其作品入选“中国百年精品画展”。

他在回国后的十几年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崖下白帆》、《天山瑶池》、《石骨松格》、《晨曦放筏》、《四川广元》、布上水墨画《青山不老》、《晨之宁静》、《山乎海乎》等，被美术界评为不朽之作。

孙大石并不是一位只专绘画的画家，他在绘画理论上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他的《论水墨画之创新》、《中国绘画的现代观》、《手眼俱到、再表思想》、《我的艺术观及布上水墨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绘画》、《中国绘画之精华及其发展》等著名理论文章，观点独到，字字珠玑。他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古今中外的绘画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详尽阐述

了中国绘画的发展、独特风格及历史地位，对中西绘画风格的形成、绘画章法、表现技法以及色彩构成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提出的“发扬传统精神，不拘旧有形式”，“受古人形式之束缚则死，得古人精神之启示则活，受自然形色之束缚则俗，得自然气象之感受则雅”，“泥古仿新皆为旧，画中我在自常新”等观点，精辟深刻。国画大师李可染曾让自己的儿子李小可要记住上面的话。

在孙大石数百万字的日记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谈他的创作体会和经验、谈绘画的各个方面。《孙大石悟语录》一书就是从他的日记中筛选而成的。孙大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国画创新理论，比大陆艺术家早了二十年，他的泼墨技法比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法早了两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主张大笔挥写，唯如此才能表达笔势，有了笔势，才有气势，有了气势才有画面上的生命力，有了生命力才能震撼人心。”“笔落纸须心坎发出，无自感不能感人，心不定落笔不稳，神不凝则气韵难生。”“倘若人格扫地，自不能产生伟大感人的传世作品，此可断言。艺术的优劣大多表现在人格的高低上。”“绘画到了最高峰，就是人格的较量，就是思想感情的发泄。”

孙大石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有创新的绘画理论家，再加上他那叹为观止的人格魅力，这就构成了他成为艺术大师的三要素。

孙大石没有师承，没有学生，更没有与上层社会、新闻媒体、美术界人士的各种关系。但在短短的十几年里，

他却成了中国画坛有影响的画家，成为中国美协公布的全国百年百名画家之一，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和叹服。他从来不靠炒作来出名，他鄙视那些为了名利而投机钻营的画匠，更鄙视那些为出名而到处炒作的所谓“画家”。他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他坚信：一个健康的社会自有公正存在，自有大批有良心、有道德的艺术家、评论家和观众存在，作品和时间是最好的评判官。一时的浪花终究要沉落下去，永远的大海存在才是真理。

李苦禅大师看过孙大石的画，欣然提笔赞道：“上帝造万物，画者亦能造万物，画自家画即开辟自家蹊径也”。

国画大师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华君武观看孙大石的画展后评道：“孙大石的水墨画有他独特的创新意识，既有传统的精神，又有新的创意。于大写意水墨画的磅礴意境中，传达出人的丰富感情，纵横挥洒之间，阴柔阳刚，内涵宏大，可称独具风骨”。

全国著名山水画家秦岭云撰文评价孙大石的作品：“以大手笔写大河山，视点在九天之上，俯视鸟瞰大千世界，真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感，大石的大泼墨，树立了一种新风。”“他作画纵情挥洒，任意泼写，大刀阔斧，象外生趣，华夏画宛，堪称一家。”

全国著名美术评论家杨悦浦在2000年出版的《孙大石评传》序言中开篇写道：“孙大石是我国当代著名中国画家，其写意水墨山水画既有传统功力又有时代的韵味，富有创新意识，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推进中国画改革进程中一位重要的艺术家。”

全国著名画家吴冠中观看了孙大石创作的《月下玉龙山》后称道："真是鬼斧神工，妙造自然也。"即兴为作品题诗："崎岖千里访玉龙，不见真形誓不还。趁月三更悄露面，长缨在手缚名山。"

台湾著名美术评论家朱沉冬撰文评价孙大石的作品："观孙大石的水墨画作品，真是得鱼忘筌之作。内在光芒是透明的，隐含着高度的精神界域。他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体认，达至一种最高的创造境界，也是唯一向这方面奋进的开拓者。"

全国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在《人民日报》撰文评价晚年的孙大石："他还有当年那股另起炉灶的胆气，仍然那么激情地放笔挥洒，仍然保持着他那山水画的阳刚风骨，仍然注意从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意识里汲取营养，甚而在画布上作中国画的新实验。他的艺术已经在现代的意义上根植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了。"

孙大石自己在诗中写道："横扫竖抹拖拉滚，笔行纸上似有神，干湿浓淡气韵在，个中自有中华魂。""前生莫非是画工，一日不画心难宁。笔落纸上千愁泄，江山无尽意无穷。""泼墨挥洒不平凡，看之容易作却难，不是千锤与百炼，岂能一笔写泰山。"

孙大石是一位艺术的得道者，他已达到艺术与自然境界的不隔之境，他的魂魄已融化在宇宙空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发现和研究孙大石将成为美术界的一个课题。他的艺术将永远年青。

记 忆 犹 新

王 开

我祖籍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大王村(今属固河镇),1917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父亲王荃芗,字挺波,满清秀才。1905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攻读法律,1907年毕业回国。1908年被推选为高唐县劝学所总董兼视学员,两年间创办乡村小学三十余处,1910年到北京考取法官后,在辽阳、沈阳等地审判厅(法院)工作。1924年,他任奉天(辽宁)省高等审判厅推事兼刑厅代理厅长时,辽阳一财主被土匪绑架,状告他家从前的佃户,辽阳地方审判厅认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原告不服,上告奉天高等审判厅,经我父亲审理,仍维持原判。原告找了军阀张作霖,张越权干涉,要把被告按土匪治罪,父亲拒绝改判,更不同意移交军事法庭,愤而离职,去济南任律师。济南"五三"惨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济南,我父亲去吉林省民政厅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判国投敌,对附逆人员一律加薪晋级,父亲不肯当汉奸,遂去宾县(当时张学良电令吉林省政府移宾县)参加抗日政府。后因势孤力单,抗日政府解体,他返回济南,重任律师。在当地是一个较有名气的穷律师,与法理相悖的案件,他不受理,有理无钱,他仗义受理。他的处世誓言是:"明白做事,清白做人"、"要将清白遗子孙"。他青年时期就主

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读书,反对妇女缠足。他教育子女不要依赖父母,不要追逐名利,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解放后,他拥护党的政策,并以子女孙辈都能为人民服务而深感欣慰。他 1962 年在长春病逝。临终前他再三嘱咐,死后一定要火葬。他说:中国人多地少,死人不应与活人争地……

我的母亲李秋实,幼时曾在她外祖父家读过私塾,结婚后读过锦州模范学堂。她坚强朴实,吃苦耐劳,能忍能让,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子女不溺爱,不娇惯,不偏袒,教育子女要勤奋上进,不要追逐荣华富贵,虚荣之心不可有,不义之财不可取。她尽力使子女都能上学读书,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她主张女子更要读书,能自食其力,在社会上、家庭里才可以免受欺凌之辱。

抗战期间,我和家里音信断绝,日本投降后,两位老人由我三弟接去北京。1949 年解放军入城时,我母亲伫立街头,引首翘望,希望能在队伍中看到我。老人家失望了。后来几经辗转,通过画家李苦禅先生,才收到我的信,他们喜出望外。

我初高中在济南女中读书,是管理严格的住宿学校,平时外出要请假,学生与外界很少往来。当时有位英语老师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过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对苏维埃并不理解,但对电气化很感兴趣。从老师那里借来《妇人与社会》(倍倍尔著),囫囵吞枣地读一遍,不得要领。语文老师授课兼容并蓄,涉及古今中外,讲《古文观止》,也推荐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柔石、丁

玲、巴金、冰心、肖军、肖红等人的作品，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项链》等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1935年高中毕业，那时家中经济已比较困难，在我之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读书。幸运的是，当年参加会考得了全省第一名，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的赠给本年度会考第一名的购书券，由学校折合成三百多元现金给了我。这笔钱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本来会考第一名可以免试进入山东省内任何一所大学，但有了这笔钱，我可以放弃这个机会，去北平升大学。当时我理想中的第一学府是清华，但为了把握起见，更为了读师范能免费，我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选定物理系，也是为了科学救国。以后因为我在北师大成绩好，又得到过家乡高唐县政府发给的奖学金。

进入北平师大，开始我仍埋头读书，因为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将东北三省拱手让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占领察哈尔，秘密签订“何梅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汉奸殷汝耕之流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侵略者不断地袭扰北平，把坦克开进城里示威，飞机低空盘旋，平静的古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北平的反动势力猖狂，国民党宪兵三团随意抓人，这时“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迷茫苦闷中，我开始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萍踪寄语》等。北平师大歌咏团教唱的救亡歌曲引人向往，那歌

声给人们最大的力量，那歌声引导着人们奔向前方。《毕业歌》唱出了爱国者的心声："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东北流亡三部曲》如泣如诉……

学校内外，进步力量与反动组织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能只顾埋头读书，1937年"新五四"事件发生在师大后，我就参加了民先队。

1937年7月1日，学校放暑假我回济南，火车上有几个日本兵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给人精神上很大压抑。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失守，天津学生陆续南下，九月间济南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平津六所大学内迁，师大、平大、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大迁西安，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迁长沙。我与杨滨、宋延平、宋彦人、李彝臣、老马、郝大姐结伴离开济南。火车站已处于战时状态，车上十分拥挤，多是逃难的人。在济宁还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到徐州转陇海路西行。到开封停留数日，继续西行。到郑州宋延平去长沙西南联大，郝大姐去武汉，剩下五人去西安西北联大。后来，除老马郝大姐外，其余五人先后都去了延安。

到西安后，我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去医院为伤兵服务。1938年春，学校南迁汉中，步行数百里，越秦岭，走古栈道，出褒谷，到汉中。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

从事救亡活动，时常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与迫害。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更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定奔赴延安。

在城固我和杜绍西相遇相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先队的成立大会，任民先队西北队宣传部长。学校南迁后，负责组建陕南民先队。他平易近人，热情坦率，与之相处，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同时离开学校，到西安后，他先去救亡刊物《怒吼》工作，后在胡乔木、刘光同志领导下编辑《青年战线》。我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那时进出办事处十分小心，先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跟踪，我去延安乘坐的是八路军的汽车，车上同行的有平大两位同学，还有演《八百壮士》的袁牧之和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他们两位都穿军装，名签是化名。路上过了两夜，第三天傍晚，远远地就听到军号声。车到近处，望见城墙上有位小号兵在吹军号，我们高兴极了，终于来到了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

我进了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第五队（女生队），地点在离城二十里的柳树店。大队长何长工，队长丁雪松，指导员王钰，从此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到抗大的第一天是星期天。班里只有班长鲁燕一人，她去帮厨，我也跟去了，和她抬了一筐菜，去河边洗菜。这是我到延安的第一课。

在抗大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格外舒畅，真是海阔天空，生活在这里感到骄傲和幸福。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

紧张的军事生活和自觉遵守纪律以及集体活动互相学习的风气。加上老同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把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那年九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大军事课与政治课并重，学习《社会发展史》、《两个中国之命运》、《论持久战》等等。平时上课在窑洞前的平地上，凳子放倒坐，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有时去城里或东门外广场上，直接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使我们了解各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的斗争情况。有一次听朱总司令作报告，中间休息时，大家都请他签字，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坚持抗战到底”。我一直珍藏着，“文革”期间丢失了。

军事生活丰富多彩，除了操练队形、站岗放哨外，学习怎样开展游击战争，怎样掌握使用武器。每天抽空把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注视三点连成一线。一次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子弹，我射中 21 环，其中有一个 10 环。有时按实战要求，夜间紧急集合，听到命令，立刻起床，迅速敏捷地整装集合，随即出发。每次总有人或是绑腿松了，或是皮带丢了，真是丢盔弃甲，行军归来总结检查。

参加劳动，也是一种锻炼。有时去背柴或背粮。一次背柴，遇上雨天，走在山路上，路很滑，站都站不稳，舍不得把柴丢下。一位同志出了个主意，人坐在捆好的柴捆上，顺着山坡滑下去，像坐滑梯一样，有惊无险，即省时间又省力，一个个滚得像泥猴。回到队上，指导员早已为大家煮好了姜汤水，催我们快把湿衣服脱下来，擦干头

发，以防感冒。还有一次，我和宋琦合抬一根树干，我在前面抬小头，她在后面抬大头，一路走来，肩上越来越轻，回头一看，整个树干的四分之一都在她肩后。这种挑重担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两件事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生活在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环境里，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可当时并不觉苦，个个意气风发，其乐无穷。

在集合时，有人指挥唱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每唱到“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时，便无比自豪，感到责任重大。并决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要为实现这崇高的历史使命努力学习，充实自己，把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把民族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11月间，抗大成立了女生大队，我们队转为八大队一队。在八大队成立大会上，毛主席讲话说，我们抗日不仅为求民族平等，同时要在抗日战争中求得中国妇女地位的平等。中华民族解放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当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指示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女生大队成立不久，敌机突然轰炸延安。星期日，很多人进城去了，光华书店是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不料竟成了敌机狂轰滥炸的目标。这次轰炸，更增加了我对敌

人的仇恨，我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化悲痛为力量。

1938年底抗大学习结束，队上有的同志去前方，有的去卫生学校，有的去通讯学校。我和一部分同学去党校，在那里学习六中全会文件、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的理论。

1939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发出了通知："为了克服抗战新阶段中的困难，为了改善人民与工作人员的生活"，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在基本上不妨碍战斗、学习的条件下，抓紧春耕时机开展劳动生产运动。同志们立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上山开荒的高潮。女同志也不甘落后，和男同志一起扛起镢头上山开荒。手上磨出了血泡，没人叫苦，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使多年的荒山披上了绿装。这次大规模的生产开荒运动，不仅改造了大自然，也使每个参加劳动的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劳动创造一切"的真理。

1939年夏，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了，我们党校三十班(全是女生)全班转入女大一班。"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一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女大开学典礼上讲的。女大开学不久，班上指导员和班主任相继调走，经民主选举，我先后被选为不脱产的班主任和指导员。女大为锻炼女同志的独立工作能力，从一班开始，各班指导员都由学员选出。以后又陆续调出一些人到政治处、教务处工作。女大除校长外，八名处级干部中有七名是女同志，这一重要措施使同学们看到了

妇女自身的力量。女大成立高级班后，我调到四班当指导员。

1940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做了调整，根据每人具体情况做适当的安排。上缴任务按小米折价计算，分为五升、一斗、三斗三个档次；在专业分工上，有的种粮，有的种菜，有的养猪羊，有的烧木炭，有的纺线。女大主要是做衣服、做鞋、纺线、织毛衣。女大的校服，就是学员自己动手做的。学校里有十几台缝纫机，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有人用缝纫机，有人用手针。缝制过程采取流水作业，按部位分工，有人做衣身，有人做袖领，有人上袖上领，有人锁扣眼，有人钉扣子，还有人专门把相关部位用手针固定在一起，大家协调配合，不窝工，不等活，配合熟练，也展示了组织才能。衣服的样式与军装稍有差别，当时称做"列宁服"，穿在身上，格外精神。解放初期在各地曾风行一时。我还学会了做棉衣、做鞋、纺线，捻羊毛线用的是古老的生产工具。有时也给供销社加工织毛衣，领取工资。通过辛勤劳动，生产提高了，生活也改善了，以前冬天穿草鞋毡袜，现在换了棉鞋毛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更顽固地推行其反共方针，不断制造摩擦，并于1940年停止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为了保证军队和机关学校粮食供给，边区政府组织征粮工作团，女大四班同学被派往延川县，参加征粮工作。我们去的同志，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缺乏

农村工作经验，但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个共同愿望，力争完成任务，决不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下去之后，深入基层，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家串户，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交救国公粮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并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他们建立了感情，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特别是妇女，把我们看作是她们的贴心人。我们跟随老乡打场，推碾推磨，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摸清粮食产量，动员党员带头，带领群众踊跃交救国公粮。任务完成后，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扬。这次征粮对我们是一次锻炼和考验，使我们从实践中对群众路线、密切群众、依靠群众增加了感性知识，提高了工作信心。当我们离开延川返回延安时，路经我们曾住过的地方，婆姨娃娃围着我们，依依不舍，往我们衣兜和背包里塞鸡蛋红枣，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女大我得到了中央妇委颁发的工作学习模范妇女奖状和中央青委颁发的模范青年奖章。当领到奖状和奖章时，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深感不安，只不过仅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女大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召开西北党代会，我与当时的校党支部书记周岚同志被推选为代表。后在党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讨论时，有人提出我们俩党龄短，工作经验少，不够代表资格。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说，第一，他们是正式党员，有资格当选；第二，他们代表妇女青年。这样

我们俩人就被通过了。有了这一过程，更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会议在安塞县召开，会上毛主席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朱总司令作了军事方面的报告。我和周岚利用会议空隙时间，就妇女工作的状况、困难和问题写了发言稿，由周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我们的发言稿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毛主席在我们的发言稿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它提出了问题"，并首次提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

1941 年根据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精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其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去研究院经过考试，我考入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倡每人都要重点学习好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资本论》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研究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展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真理。他在强调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我们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此，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中国经济研究室分三个组：大后方经济研究组、经济思想批判组和边区组。我在边区组，去财政厅、粮食局和边区银行，收集资料，编制卡片，后因整风学

习而停止。通过整风学习，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能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别人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通过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这期间有两件事我长久难忘：一件是杜绍西帮我借到一部崭新的《资本论》，我如获至宝，但在过延河时不慎掉在水里了，虽然晾晒干了，但水渍无法消除，对书的主人我感到万分歉意，那时找到《资本论》是很不容易的；另一件是一位同志在她离开延安到大后方去之前，看到一本《自然辩证法》，摘录抄下留给我，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1942年，我和杜绍西相处五年后结婚了。迟婚的原因主要是怕生儿育女给工作带来累赘。两年后大女儿出生了，因我身体虚弱，夜间照顾孩子的事情落在绍西身上，他是模范丈夫，孩子的好爸爸。

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时，来了一场大风暴。在“抢救”运动中，绍西蒙冤，此时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贺老总（贺龙元帅）嘱咐我：“告诉杜绍西，不要想不通。”对贺老总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当时并未理解，也未转告杜绍西。不久中央发现抢救运动“逼供信”错误，迅速纠偏，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绍西的问题得到甄别。他能宽厚地对待历史遗憾，没有怨言和不满，仍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工作。我未被连累，已属万幸。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在延安，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涌上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游行。南门外市场上卖瓜果的老乡，心情

激动地招待游行的人群，吃瓜果不要钱。夜幕降临时，大家又高举火把，迎来了狂欢之夜。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牺牲两千万生命的代价，这胜利来之不易啊！

人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希望重整河山。令人气愤的消息接连传来，蒋介石下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投降，并开始对解放区发动进攻，新的内战又迫在眉睫。

为建设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又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首批是以张肪（张学诗）为队长的东干队，其主要成员是东北人。绍西家在沈阳，16岁去北平读书，“九·一八”后有家难归，他时常怀念孤苦伶仃百病缠身的老母，这次组织上批准他打回老家去，我和他一起带着孩子告别了延安。

离开延安时，组织上照顾带孩子的人，给一匹马，马背上有一副驮架，一边柳条筐里放孩子，一边放衣物行李。此行经甘谷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到黄河渡口。在这里看到了汹涌澎湃、奔腾叫嚣的黄河，滚滚几千年，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老练的船夫在波峰浪尖上勇敢沉着地把我们送到对岸碛口。过临县到兴县，东干队一分为二，身强力壮的男同志为第一梯队，轻装前进，其余的带着老人孩子为第二梯队，一前一后，日夜兼程。路过岢岚、五寨、神池。抗战时期，晋西北条件比延安差，枣糠、黑豆为主食，吃莜麦面就是改善生活了。夜间过同蒲路，有民兵带路，不许讲话，不许吸烟，连不懂事的孩子都没有哭一声。过铁路时，马失前蹄跪下了，牵起马来，继续跑步前进，大约跑出几百米，才想起来，摸摸

孩子甩出去没有，原来她还睡着哩！经雁北地区的朔县、山阴、应县、阳高、天镇，去张家口，一路上多是穷山恶水荒无人烟。敌人占领时期，在这里实行清乡并屯，把附近小村屯的老乡强行圈到一个寨子里，不许随便外出。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房屋倒塌，缺吃少穿，衣不遮体，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坐在炕上，用苞米叶围在身上。没有牲口推碾子拉磨，将干瘪的苞米粒煮熟吃，没有盐，没有菜，把捂在缸里又酸又臭的树叶子当菜吃，我们把随身带的衣服都送给她们了。

张家口是沿途经过的一个大城市，战后遭到破坏。我们住宿的房子，没有门窗，没有床，地上铺草垫子，席地而睡。这时已是初冬季节。

由张家口去承德，人和马都上了火车。在承德大约停留了一个月，把马留给当地后勤部门，坐火车到彰武。火车不通了，又步行前进。这时从各地奉命来东北的干部战士都汇集在一起，浩浩荡荡象铁流一样，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每天有人打前站，把菜饭和住宿地点先安排好。为抢占沈阳蒋介石部队乘美国军用飞机捷足先登。东北局由沈阳转移梅河口，我们到了沈阳西面，离沈阳 18 里的地方，接到通知：此地不安全，要立即北上。绍西是中队长，要照顾大家，我背上孩子夜行军，走了许多路，问了当地人，才知道我们所在地是沈阳北面，距沈阳还是 18 里，不能停留，继续往北走。经法库、康平，到昌图县的八面城，等候东北局派人来。在八面城，一个偶然的机会，绍西找到他的堂弟，得知他母亲已于 1938 年去世，临终前

贫病交加，举目无亲，日子过得很凄凉。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子欲孝而亲不在。随后，我们到 洮南，从八面城坐火车走了三四天，那时机车烧煤，铁路上没有煤，用豆饼、大豆、苞米棒代替。白天坐车，夜晚下车吃饭，找地方住宿。到洮南我们被分配到嫩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后来我去洮南县委任秘书，住在县委，把刚满两岁的孩子留在省委，白天在伙房炕上玩，三顿饭到司令员食堂取，夜里绍西带她睡。起初，县委共五人，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及警卫员。县委工作主要发动群众访贫问苦，酝酿成熟后，召开群众大会诉苦诉冤。不久发生鼠疫，为防止疫情蔓延，对出现疫情的街道实行隔离，并采取强有力的医疗措施组织送医送药。

1946 年 5 月我调往哈尔滨，由白城子乘坐最后一次开往长春的火车。此时蒋介石动员了 430 万军队，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东北向解放军大举进攻。长春正在撤退，我们未出车站即转车去哈尔滨。东北局财委将绍西留下，分配我去东北贸易公司做人事科长。前方战事吃紧，哈尔滨实行疏散，我随老幼病残转移佳木斯，并负责接受和保管由哈尔滨等地运来的布匹、纸张、烟叶等生活日用品及原料。

1947 年初，我到东北贸易公司牡丹江分公司任秘书科长。8 月到东北贸易公司绥汾河办事处任秘书主任，兼东北民主联军绥汾河办事处秘书主任，那里是对苏联进出口贸易的口岸。

1948 年春夏之交，我到吉林百货公司任副经理。当

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平抑物价,繁荣市场。

1949年5月我调到吉林省工业厅。曾任研究室主任、生产技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地方工业主要利用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建厂,有煤矿、金矿、锑矿、油母页岩矿、变压器油厂、石棉制品厂、亚麻厂、火柴厂、陶瓷厂、糖厂、食品厂、地方煤矿、植物油加工厂,还有机械厂及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又从上海迁来公私合营的搪瓷厂、暖水瓶厂、铝制品厂、日用化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给国营企业输送一批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并为哈尔滨亚麻厂提供原料而停办了吉林亚麻厂,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技术人员当中,有一部分是从伪满滞留的日本人中留用的,他们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一样对侵华战争没有责任。为消除他们的顾虑,对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一视同仁,抗美援朝前他们回国了,其中今健在者及其子女,在中日友好交往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我任吉林省统计局局长。统计工作要求准确及时地提供统计数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提高统计水平,尽力发挥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的整体作用。1961年参加了省里组织的全省手工业调查工作。这次调查对我省手工业 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统计工作深得省领导的支持与信任,在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四四决定"(主要内容是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对各级统计部门上报的数字不得修改,有不同意见可以由统计部门同时上报上级)前,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就指示各部委厅

局(包括报社)使用和发表统计数字须经省统计局审订,省里主要领导人从来没有要求统计局随意修改统计数字,使我们在工作中免受干扰。与我共事的同级干部,工作中配合默契,互相信任,互相补台,机关干部大多数努力工作,积极肯干,并得到干部家属的理解与帮助。

1966年春夏之交,国家统计局开始批判以王思华局长为代表的"主副之争",即统计工作应以报表为主,还是以调查研究为主?并把"报表挂帅"的罪名强加与人,以后又上纲上线,是搞修正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各省统计部门的领导干部多受牵连。

1967年到1969年我被批斗,之后下乡插队。那时生产队不分配我工作,我只好自己找活干,背上粪筐去拾粪。等我拾满一筐,就把粪就近倒到田里,因为都是公社的地。

一年后回来工作,分配到吉林省轻工业局。那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而抓生产是如履薄冰,不时就给我扣上个"穿新鞋走老路"的帽子。到长春纺织厂蹲点,给女工解决夜班宿舍,弄来小米,让职工下夜班能喝上小米粥。我还主张按劳付酬,不要强制献工,我被指名道姓批判为"慈善的奴隶主"。我反对搞"五小",主张企业得有一定规模,不是有台机器就可以生产了,这又被批评指责为"一贯右倾"。

直到"四人帮"垮台,我又回到统计局。1983年离开统计局调到省人大,是人大常委会委员,1989年离休。

革命生涯虽然艰苦坎坷,但也生动丰富,特别是我还

有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绍西为人宽厚，对人从不疾言厉色，他是一个很能克制自己宽容别人的人。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多年中，从未争吵过，分离时间较长尽量写信回来，字里行间一往情深，忙时片语只字，也让人感到宽慰。1957年我们结婚十五周年，他从北京寄来一张明信片，画面是硕果累累红彤彤的柿子树枝，左侧题款："红到梢头甜到老"，正面他写了九个字："祝愿我们美好的日子"。情深意长，耐人寻味。他对老人细心周到，对孩子循循善诱，在孩子心中，比我还受欢迎。孩子如今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尽职尽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在革命的洪流中不过是一个小水滴，并非披荆斩棘的英雄人物。人生有许多道路可以选择。回顾过去，我无怨无憾。

（本文原载陕西政协《天人古今》1998年10月20日"延安女性专号"，此次做了修改。作者王开，女，86岁，现住吉林省长春市）

杜鸣与《爱晚亭》

王　琴　整理

在浙江宁波市，高唐人杜鸣以他的人品、学识、才能和他所主办的《爱晚亭》节目，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杜鸣，又名杜顺时，1927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出生之后就被当时高唐文化名人杜友棻（高唐南街人）抱养，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1945年杜友棻病逝后，他随大姐杜修时去济南读中学，后被抓兵到国民党青年军，因传播进步言论被捕。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员，1948年6月被营救后去胶东统战部工作。奉胶东统战部部长谢明钦之命到上海做空军上尉分队长、堂兄杜道时驾机起义的工作，并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坚定了杜道时驾机起义的决心（见《高唐文史资料》第二辑杜道时撰写的《我从台湾驾机起义始末》一文）。后来杜鸣又去兰州、重庆等地做策反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950年2月，部队送他回青岛市公安局下辖的胶东统战部工作。当年7月青岛市公安局根据他的意愿，保送他到东北师范大学深造。1953年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宁波市效实中学任职，先后担任语文、政治学习组长、年级组长、工会主席等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被调到宁波市教委负责语文教研工作。1983年到宁波教育学院任副教授，1989年离休。离休不久，即受聘于宁波市广播

电台，担任《爱晚亭》广播节目的编辑、记者、播音室主任，直到2001年才真正离开工作岗位，现在宁波市安度晚年。

离休后杜鸣在电台发挥余热十二年，为《爱晚亭》栏目注入了心血，为宁波人民特别是宁波的老人们做了许多实事。

《爱晚亭》是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的一个栏目，是专门替老年人说话、为老年人服务的广播节目，它是由杜鸣和赵耀东、王瑛三位老人于1993年8月22日开办的。主将杜鸣为办好该栏目，组稿、采访、邀请嘉宾到处奔走，用去的时间难以计算，不仅报酬有限，还经常自己把钱垫进节目里。有一次，杜鸣“三顾茅庐”才请来了一位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老干部到电台做嘉宾，老人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可是，按电台当时的规定，只能给老人十五元的稿费。杜鸣心中过意不去，于是把别人送给他儿子的结婚礼物——一套景德镇紫砂壶送给了这位老人。不料，第二天老人打来电话：“紫砂壶盘底怎么有‘结婚志喜’四个字？《爱晚亭》对我老头子开什么玩笑？”杜鸣只得再顾茅庐，把误会解释清楚。

“谁欺负我们老年人，找《爱晚亭》去。”家住余姚县的张老汉逢人就说。因为《爱晚亭》实实在在地为他出了一口气。那次被恶媳妇殴打之后，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了《爱晚亭》向杜鸣哭诉，杜鸣拍案而起，“我们《爱晚亭》对这种虐待老人的行为决不姑息，您让您儿媳妇听下一期的《爱晚亭》广播节目。”没几天，老人高兴地打来电话，媳妇不仅赔礼道歉，还摆了酒席为他压惊，只求老人向《爱晚亭》

求个情，不要把这件事从广播里播出去了……

针对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虽说各街道基层单位都专门设立了老年协会受理类似事件，大大减轻了《爱晚亭》的压力，但杜鸣说，《爱晚亭》替老人说话、为老人撑腰的宗旨永远不会改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养老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让老年人颐养天年已是一项战略性的大事。目前独生子女家庭逐渐增多，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如果子女都是双职工，根本无力照顾老人，请保姆经济条件又受限，但敬老院不仅少，而且要赞助费，进不去、住不起。有的老人还有旧思想，进敬老院怕被人误认为子女不孝，不能享受天伦之乐。于是，杜鸣在《爱晚亭》专门报道了宁波市康乐中心托老所的情况，特别介绍了托老所“费用不高，回家自由，有老师上课”等优点，使许多老年人打消了顾虑。康乐中心托老所一时报名人满为患，许多老人说：“是《爱晚亭》使我们下决心进托老所的……”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迫切。“黄昏恋”的故事再也不是新闻，杜鸣通过《爱晚亭》对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发现老年人可以说恋的多，成功的少，就是成功了，婚后大多因性格不合也磕磕碰碰，和和满满的可谓凤毛麟角。他决定在《爱晚亭》开辟一块老年人婚恋的“试验田”。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走进《爱晚亭》，要求《爱晚亭》为她公开向社会征婚，杜鸣为这位女同志的胆魄所感动，于是连续播出了这则征婚

广告。一时间消息传遍四方，应征信件也雪片似地飞来。杜鸣再三斟酌，从中选出一位早年离异的老书法家。两人约见的那天，那位女同志破例化了妆，还带上了项链耳环，以示重视。不料，那位书法家思想很传统，见过这位“新潮”对象后，思虑再三，最后婉言谢绝了。对此，杜鸣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老年人虽说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还是很匮乏，传统的观念、世俗的目光以及难以改变的性格习惯，使老年人对幸福的追求总是退避三舍。”对此，杜鸣更加不遗余力，在《爱晚亭》节目中尽量增加这方面的宣传，为老年人创造幸福生活摇旗呐喊。

离开家乡五十多年，杜鸣和家乡从来没有断过联系，这其中自有不忘家乡养育之恩的原因，更有亲情的牵挂。对与之相处只一年的养父杜友棻的续弦巩立青老人，杜鸣始终在以一个儿子的身份为其尽孝，让人敬佩。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孤寡的巩立青年老病重，其生活费、医药费均由杜鸣承担。他说：“巩立青老人出身贫苦，为父亲又终生未改嫁，我虽跟她没血缘关系，但名分上她是我的长辈。”可见杜鸣品德之高尚。

故　乡　情

王国骧

我1928年6月11日出生于高唐县城内南街(曾名民丰街)一个教师家庭。老家在尚官屯,虽然离乡多年,但思乡之情,无时惑已。

今年四月下旬我偕老伴和小女儿回高唐来,让老伴和孩子们认认老家。那天八点从泰安出发,在茌平和事先约好的外甥会合,同到高唐。途中我们相叙别情,经过一个河桥时,他说:"这是高唐县境了,那个非常繁华的乡镇是南镇,刚才过来的河就是徒骇河。"

听到"徒骇"二字,猛地脑子就象打了兴奋剂,六十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望着新面貌的村镇,绿油油的麦田,顺嘴说出了:"一过徒骇避日寇,二过徒骇走天涯;七十有五老大回,故乡无处不飞花"。

中午到县城,在饭店送走了从西安回来迁他们父亲杜超时骨灰的几个外甥。便让在县城工作的侄子带路去看文庙,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宾馆大院说这是县委招待所,也就是高唐"文庙"所在地。原来的建筑只剩下这个大成殿了,门上一个匾额写着"苦禅大师幼年读书处"。我站在殿前,看看四周,怎么也感觉不到这个矮小的庙屋就是过去高唐县城那个庄严高大的殿堂。我停立好久回忆往事:

我在这里读过两次书，第一次是1936年从三清观女子小学转来文庙小学读四年级，第二年考入高小读五年级。文庙小学是在文庙东边，与文庙一墙之隔，是高唐县第一完小，也是最好的小学。历年来高唐有多少仁人志士、国家栋梁、社会贤达在这个小学受启蒙教育而走向成才之路。我想苦禅大师幼年读书也是在文庙小学并不一定是在这个大殿。

1937年抗日烽火燃到高唐，学校停办，我们全家避难老家尚官屯，结束了文庙小学读书生活。在农村跟我伯父和父亲读书，亦耕亦读地学完了高小、初中一二年级的课程，还读了不少古典著作，例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及若干古文和唐宋诗词。

1944年我插班入高唐简易师范二年级读书，简师原设在三清观小学旧址，不久迁入文庙，这是我在这里第二次读书了。当时文庙有前后院。前院是教室、办公室；后院是大成殿（现存的这个殿）和西庑房，被当作了学生宿舍和伙房。我们的床铺就安在大殿内孔子和四大贤塑像座的边上，朝夕与圣人相处，棉油灯下，扪虱搔疥，孜孜夜读的情景犹如昨天历历在目。现在大殿前的碑林及古柏没有了，殿内塑像也荡然无存，那天我来时殿内正在办服务员培训班。文庙小学更难寻旧踪。

师范学校都管饭，那时简师每月发给学生70——80斤谷子，谁在学校吃饭就交35斤小米面或玉米面，由校方伙房蒸窝窝头吃，自己带咸菜。走读的领了谷子在家吃饭就不交小米面了。住校的多是农村来的，生活艰苦些，

但都能交上粮食吃饭。

简师是四年制，1945 年我们第一级的学生才三年级，学校就停办了，没有一个毕业生。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又爱读课外书，在班中有一定号召力，组织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名“志会社”。现在名人刘野当时和我同桌，也是志会社成员之一。

1944 年高唐成立了一个初级中学，开始与简师并立，后因在县城召开运动会两校闹了乱子，简师学生撕了日本旗骂了汉奸。伪县政府解聘了简师校长和教务主任，把简师并入中学改为简师班，我校学生不服，闹了几次争校名的事件。1945 年麦收之后有一天传出了一个信息说要逮捕简师三年级学生，我班同学连夜离校，有的回乡村躲一躲，有的跑到徒骇河东一些学校读书，有的到杨敬斋部成立的政治部。我在秋天也去了河东十七联合中学。这就是本文开头说：“…过徒骇河避日寇”的由来。

抗战的后几年高唐以徒骇河为界，河西是汉奸杂团，河东是国民党打抗日旗号的杂团，两种军队隔河相踞而又相安无事。国民党据点办起了中学，先是以村为名。例如茌平吴春阳在张达镇办的中学名“张达镇中学”，云茂才在施屯办的中学名“施屯中学”，还有禹城境内的油张院中学、魏寨子中学等。后来这些分散的中学被教育部门合并改为“联合中学”。十七联合中学是以油张院中学为主校划入茌、高境内各个中学而成立的。我在十七联中的施屯分校读初三。因离家近每礼拜六回尚官屯家中拿咸菜。那时徒骇河是一条干涸的河，不知迈过多少

次，直到1946年春节后我跨过徒骇河随学校迁济南。这一去几十年没回故乡，而是一生坎坷浪迹大江南北，所以说："二过徒骇走天涯"。

山东省立十七联中迁济南后，我跳到高中一年级读书，简师时的同班同学有几个仍在该校读初中三年级。不久十七联中改名为"山东省立禹城中学"，未改私立，是校址在私立育英中学的西邻，校舍和教学设备非常简陋。我在校读书两年半，曾受姚卿详（又名董华）、张守常等高唐进步人士的影响，做了一些与高唐学生有关的社会活动和校内文化活动。《高唐文史资料》第九辑《通信的友谊》一文中曾有叙述。

1948年高中毕业，当时我校在山东省会考中名列前茅，我可在省属高等学校免试入学。但我一心要报考名牌国立大学，济南却又不是考区。于是老师亲友给我凑了一个机票钱飞青岛转南京考学，不幸大学未考在南京感染伤寒病，并几乎送命。

写到这里我怀念两个人：一个是张建岳学兄，另一个是金仲兴兄。在我病情沉重昏迷十余日的时候，他们先后从别处赶到南京到医院照顾我，让我死里逃生。建岳兄家是高唐杨屯乡夹滩村，我们是同学又是文友，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近年写的《高山行》、《山水情怀》两书曾赠我。仲兴兄高唐金寨人，解放后曾在县医院工作。1986年他听说我在泰安工作，立即到我处会晤，他爱写作曾将所写诗文示我，并说在家乡他们有个诗社。可惜！那年别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患难相助的乡邻友谊永远难忘。

济南解放后，暂时与家庭失掉联系，生活无着，遂入高唐人张绍华先生主办的震华学院。解放形势迅速发展，渡江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并裹胁青年学生南逃。我跟着学校跑了东南西南大半个中国还几乎去了台湾，在流浪乞讨中仍梦想安定下来读大学。我和高唐城南五里铺的同学王文华（又名王文德）在杭州六通寺每天一早上山砍柴煮饭，还要读念英语。步行进广州走四川时什么都丢了，还背着一摞书。

1950年回济南考取了山东师范学院二年级插班生，同时也被山东造纸总厂以职员录用。因家庭经济有困难我参加了工作。1952年底调轻工业部建筑工程公司，毛主席指示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向一切内行人学习。我遵循教导努力学习、工作。1956年被建工部评定为一级技术员。可惜1958年我被错划另册，下放班组劳动。“四清”、“文革”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直到1980年平反恢复原职务工作。落实平反政策时我曾到北京找过刘野、唐米，希望他们给予帮助。

二十多年消磨了我30—50岁的宝贵年华，但我在劳动实践中弄懂了建筑行业各个工种的工艺，并实际操作过。同时攻读了建筑技术各门专业课程（同济大学六门课程我读了三遍），也锻炼了身体和意志，使我成为既有工艺实践，又有技术理论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平反后，在评定技术职称时，省职改领导小组直接评定我为高级工程师。曾被本单位评为劳动模范，获得山东省建筑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建工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主

编了山东建筑技术中级教材《木工工艺学》。担任过泰安建筑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建山东分公司驻苏丹项目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1991 年超龄退休后仍被公司返聘，直到七十岁才全退休养。

我读了一辈子书，但正式在校读书的时间只有八年半，小学四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半。抗战时期在家“耕读”，流亡学生时“走读”，工作劳动时又“工读”，现在老了却天天“闲读”。所以我是文凭没有，论实际本领自认为有一些。老伴是个医生，原在山东省卫生厅工作，后调我单位，这次同来高唐，认了认婆家故里，深有感触。

我这个家庭可算教育世家。父亲王茂轩一辈子教书，我姊妹兄弟六人有五人教书，我四个孩子有三个教书。

高唐养育了我这个家族，我们应无愧于高唐，虽天南海北永远不忘家乡。“七十有五老大回”，看到家乡繁荣昌盛，心情激动自豪。回到老家尚官屯，见了小时候的砍草读书伙伴，他们在村口柳荫间闲坐，怡然自得的过着幸福晚年。村里电灯电话、柏油路、自来水，还有村办中学、剧院，真是“故乡无处不飞花”。

2002 年 8 月于泰安

姜德明的文学世界

施斌杰

姜德明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岗位上工作了整三十个春秋，借此结识了无数文坛巨子名流，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组稿、藏书、写作，构成了姜德明独具个性魅力的文学世界。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副刊，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件大事，对当年27岁的姜德明来说，可谓一次人生转折。因为随着改版后人员的调整，他由读者来信部调到了文艺部副刊组，从此进入与作家打交道的30年。

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力量强而且名人多，主任林淡秋是老"左联"成员，著名作家、翻译家。另外两位主任，袁水拍是诗人、翻译家，华君武是漫画家。两位副主任，袁鹰是散文家、儿童文学家，苏光是美术家。具体到部内各组，知名度高的也不少。副刊组有诗人白原等，评论组有评论家李希凡、蓝翎等。美术组有漫画家方成、沈同衡、英韬、苗地等。另外，文艺部聘请的三名顾问更是有名：诗人艾青，作家萧乾，美学家吕荧。当时姜德明在其中资历自然是很浅的了，幸运的是他与萧乾在一个办公室里对桌办公。林淡秋便给姜德明说："萧乾先生当年在《大公报》编副刊主要靠的是各位作家，现在给你的任务就是把萧乾先生认识的人你都认识了！"于是，文学史

上就有了一段“萧乾带姜德明拜识名人”的佳话。象钱钟书、杨宪益、季羡林、臧克家、吴祖光、黄苗子、邓广铭等等，姜德明都是跟着萧先生认识的。

在副刊编辑的岗位上，姜德明不仅认识了很多的名家，而且也与他们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象茅盾、夏衍、巴金、艾青、唐弢等。这从姜德明保存的书简中就可以见出姜德明与他们之间来往之密切，所谈之欢悦了：茅盾的书简有五六十封，夏衍的有近百封，巴金的有四五十封……

与巴金先生相识较晚，始于 1965 年 。当时文艺副刊的作者，过去有关系的仍由原来的人负责联系。负责联系巴金的是一位来自重庆《商务日报》的记者老夏。他们在重庆时就认识，关系不一般。六十年代初老夏调到《新闻日报》，姜德明便接替了他的工作，始有缘得识巴金。两人见面所谈的内容颇广，谈现代文学，谈人物，也谈出版，很有价值。姜德明是个有心人，更是个勤奋者，每次与巴金会面回到旅馆，都要认真回忆整理出文字。不久前，姜德明据此编辑了一本巴金先生谈文论艺的书《写在绿窗下的日记——与巴金聊天》。应该说，这部书是与巴金先生聊天的结果，也是姜德明作为一名编辑勤奋努力的结晶。去年 10 月 14 日，姜德明去上海还特意看望了巴金先生。

作为一名党报的副刊编辑，那时约稿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有钱钟书，是姜德明始终没有“攻”下来的一名作家。姜德明多次见到他，也写信给他，他就是不写。催急

了，有时他也表面上答应，说“哎呀，实在写不出来，有机会下次一定写。”结果呢，到姜德明退休他也没给写。姜德明对此十分理解，不写自有不写的理由，这并不妨碍他对作家的感情。姜德明是这样注释的：这就象张中行一样，气候不对，他根本不写。只有新时期以来，他写起来才一发不可收，象出土文物似的。对一个文学人物，如果不能从时代的背景着眼分析，便不能给他的行为、思想以正确的判断，钱钟书是这样，张中行是这样，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就是姜德明——一名编辑家的心胸。

一名副刊编辑要与作家相交长久，学识、毅力和人品三者，是必不可缺的条件。因此，姜德明与广大作家，能有如此深厚、如此密切的友谊，就不仅仅是时势或岗位使然，更是其学识、毅力、人品使然。

向名人组稿，这仅仅是姜德明文学世界的一部分，而藏书与书话、散文的创作，才是他生命的追求。

姜德明出身并非书香门第，他藏书的兴趣起始于他父亲纸店里收购来的旧书。姜德明的父母都是山东高唐县的农民，后来到天津开纸店经营中式帐本，同时广收旧帐本及一切旧书纸张，以拆改成新帐本，或再卖给造纸厂。从父亲的旧货堆里，姜德明翻捡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比如《良友画报》、《论语》杂志就是那时候最先从这里看到的。那时姜德明还只是一名小学生。进入中学，课堂知识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习惯地走向旧书摊，从中寻觅课外读物。当年天津天祥商场二楼全是卖旧书的，他经常往那里跑。从课堂里知道鲁迅、冰心、叶

圣陶，到了地摊才发现，原来他们写了这么多的书。求知的欲望促使他开始搜罗旧书。如今姜德明的藏书有不少就是那时侯搜集的。张中行先生在一本散文里曾说，中国当代藏书家，“南有黄裳，北有姜德明”。有趣的是，黄裳先生的藏书，也是在天津读中学时从天祥商场二楼起步的。

1951年，姜德明由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那里是一个旧书摊的集散地。这祥每天中午他都可以散着步去买上一本两本，读过之后收藏起来。藏书自有它的乐趣，这种乐趣在于意想不到的收藏而带来的惊喜和眼钝漏珠而带来的遗憾。六十年代初，姜德明与唐弢先生去海王村访书。姜德明站在一排书架前横扫一遍，估计难有好书漏网。不想唐先生跟在他后面，一眼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鲁迅在东京印的《地底旅行》。此书极为罕见，姜德明不免大吃一惊，悔恨自己眼钝。至今姜德明所存鲁迅在东京印的只有《月界旅行》，虽然也是珍本，但《地底旅行》却更难得。让宝贝从自己的眼前滑过去是够令人懊恼的了，但姜德明还有更大的遗憾。1958年，那是个狂热的年代，姜德明为适应“厚今薄古”、“大破大立”的形势，竟然一时头脑发热，卖掉了一平板三轮车的旧书！这才是姜德明想起来就伤心跺脚的事！

当然收获的喜悦也是经年累月犹有回味的。“文革”期间，姜德明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购得三册抗战前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文艺刊物《文饭小品》，只得其中三册，

而另三册多方寻觅不得。一次回天津探亲，顺便又去了趟天祥商场，一眼便发现了那所缺三册，一本不重一本不少。当时姜德明除了激动外，真感到邪乎了：冥冥之中岂非有书神相助？

姜德明搜罗的不少民国版本如今已是绝版书，但有些书在起初买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它的价值。象阿英在抗战开始后编的《长征的画集》，因为阿英是地下党，所以现在已成革命文物。还有他在天津买了一种剧本《出狱之后》，署名是马天安。当时买的时候，姜德明也不知何物。后经考证，马天安即是革命烈士马骏，曾与周总理一起办过觉悟社。这一剧本，连他的亲属以及《马骏烈士传》的作者都不知道。其实姜德明只花了三毛钱买的。柯灵在上海沦陷期间，曾编了一本《怀人集》，收有10位知名作家化名写的17篇文章。此书就是主编柯灵现在也没有。但此书对正确认识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是很重要的。

在移居北京的四十多年里，为了旧书，姜德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旧书摊，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在旧书店里他认识了书也认识了人，像阿英、唐弢、谢国桢、路工等是常见面的熟人；也结识了一些访书的名人，像廖承志、胡乔本、李一氓、邓拓；也结识了不少贩书人。最近姜德明写了一本《书摊梦寻》，记下的就是自己跑书摊亲自挖掘和发现旧书的体味。姜德明先生的藏书多限于新中国建立前的新文学版本书刊，其它如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就很少。要粗略估计

一下姜德明先生的藏书量，新文学版本 15000 册绝对有的，加上解放后的就要将近 20000 册了。

从藏书到著述，是一种质的飞跃，也是一条求知做学问的路子。姜德明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他认为："整个文学史不可能写下那么多人的名字，但是人家走过来的脚印，特别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在那个残酷的白色恐怖下面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后来大多默默无闻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该给予评价的都应该给予评价。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这种做学问的责任心，注定他会有大量的别致的严肃的书话随笔源源不断地写出来，而成为独步今日文坛的书话家。他的书话，如他所说"或寻找一些人弃我取、有益他人的事情，或做点介绍，或做点小小的考据，或补他人著译的散佚和微不足道的差误"，但极具欣赏价值和史料价值。

唐玉虬为怀念妻子钱若珊而作诗文集《怀珊集》，书中题句名流如云，有张元济、陈叔通、熊十力、叶恭绰等数十人，俞平伯也在其中题短文一篇。姜德明在一文中称：俞题《怀珊集》短文，正是其因《红楼梦研究》挨批被迫写检讨之时。但从俞的短文，看不出先生遭围攻后的窘态，相反更豁达、从容、冷静地为一家庭妇女写赞词，正可见先生处逆不乱的境界。然而此短文却不见俞平伯各种著录。再如徐志摩的《卞昆冈》跋，胡适湮没七十多年的《乔答摩底死》序等。这些补遗，无疑是重要的史料贡献。

1989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话剧选》，收录了陆镜若的剧本《社会钟》。陆与李叔同、欧阳予倩

曾经都是春柳社的骨干分子。姜德明根据自藏本进行汇校后发现,剧选之《社会钟》只是根据 1913 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不完备的残本,仅有五幕且标题不全。而全本(1912 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则是七幕,且各有标题。类似这样的匡正修复谬误的地方,姜德明在书话中涉及很多。显然,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钟情于汇校工作的苦功夫,也是力有不及的。

姜德明的书话是真正在做学问,因此韩石山有文称他为著名版本学者。但姜德明写下的散文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有趣的是,在姜德明已出版的 16 本书中。散文集与书话集刚好平分秋色。蓝翎在一回忆五十年代的文中,提到姜德明时已下了"将成为散文家"的断语。几十年过去了,姜德明的确成为真正的散文家了,他的散文十分倾向于巴金、孙犁、萧乾等人平淡真诚的品格,这正是他崇尚朴素美的结果。1989 年他的散文集《相思一片》正是以其"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感情"而获新时期散文创作优秀奖。

回首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姜德明感念不已的是萧乾老先生。他忘不了当年萧先生领他拜识名人时给他的鞭策:"一名编辑光是组稿,光是熟悉作家不行,最好自己得要拿起笔杆子来,这样才能够了解作家的甘苦,才能跟作家交谈,或者往来时有一种平等的感觉"。萧先生的话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使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写作习惯:"左右开弓,里外结合"——出差接触生活就写散文,在家就翻检旧书,写书话随笔。

姜德明先生告诉记者:“现在退休在家,出差的时间少了,在家的时间多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书话,我要让我集存下来的资料变活,即使不能每本都写。”

在姜德明先生的家里,记者有幸浏览了这位藏书家的旧藏——多么诱人的一室珍藏啊!它们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仿佛与时光同醉又与藏书老人共享其乐。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1997年1月11日周末版)

附:

姜德明自传

1929年我出生在天津。我的父母都是山东高唐县人。父亲家在赵庄乡桑庄(今属三十里铺镇),母亲住城西房庙(今属汇鑫办事处)。父母亲都出身贫农家庭。父亲十几岁时便跟乡亲到天津当学徒,在清代开设的老字号“聚德堂”学做中式帐本。到我出生时,他已独立经营一家纸店,雇有十名店员,置有几处房产。因此,我的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

童年时代,我跟母亲回姥姥家几次,忘不掉院内土墙边金黄色的大南瓜,也忘不掉家人带我到棉花地里去捉蝈蝈。还有一到晌午,我便到门口去等卖油条的小贩,尽管油条硬如皮条,却是当时高唐的上等点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重返过高唐,在县委招待所住了几天,从县委借了一部清代刻版的《高唐县志》,知道文天祥被解往京城时曾路过高唐,并留下一首诗。当时的县委翟瑞华书记陪我看了城南和西北部沙丘起伏的黄河故道。归

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荒原》，报告了在那原来的不毛之地，已经开始种树，长了庄稼，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出去闯关东的人陆续又回到了故园。这篇散文收在拙作《不寂寞集》中。

我在天津读了小学、中学、大学。大学只上了两年，天津解放了。1950年我参加革命，进了北京新闻学校，在校时结识了同学唐书杰，他是高唐城关人。不久，学校批准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初上战场，即牺牲在朝鲜。我会永远记着他的名字。一年后毕业，我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工作。起初在读者来信部政法组工作，1956年调文艺部，编了三十年文艺副刊。1963年入党。退休前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被评为高级编辑，享受政府津贴。197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散文协会副会长，中国鲁讯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散文集《相思一片》1989年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1991年退休后，仍不时写作。在职时写作全靠业余时间，故笔名余时。顺将已出版的拙著书名列后，以告家乡亲人：

《书叶集》（1981年5月·花城出版社）
《南亚风情》（1981年4月·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边草》（1982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
《清泉集》（1982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雨声集》（1982年9月·山东文艺出版社）
《书梦录》（1983年3月·安徽人民出版社）
《绿窗集》（1983年7月·百花文艺出版社）
《寻找樱花》（1984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味集》(1986 年 7 月·三联书店)
《活的鲁迅》(1986 年 8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相思一片》(1987 年 5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燕城杂记》(1987 年 10 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王府井小集》(1988 年 3 月·作家出版社)
《书廊小品》(1990 年 11 月·上海学林出版社)
《余时书话》(1992 年 9 月·四川文艺出版社)
《梦书怀人录》(1996 年 8 月·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书摊梦寻》(1996 年 11 月·北京燕山出版社)
《流水集》(1997 年 9 月·上海远东出版社)
《文林枝叶》(1997 年 9 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姜德明书话》(1998 年 1 月·北京出版社)
《与巴金聊天》(1999 年 1 月·上海文汇出版社)
《不寂集集》(1999 年 1 月·北岳出版社)
《书坊归来》(1999 年 3 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文苑漫拾》(1999 年 5 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闲人闲文》(2000 年 8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
《守望冷摊》(2002 年 1 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出版社)
《猎书偶记》(2002 年 3 月·河南大象出版社)
《人海杂记》(2002 年 4 月·远方出版社)
《新文学版本》(2002 年 12 月·江苏古籍出版社)
《姜德明序跋集》(2003 年 3 月·东南大学出版社)

我曾经说过,出门旅行时,我爱写点散文;在家读“五

四”新文学版本时，我爱写点书话。平生别无所能，实在惭愧之至。

2003 年 3 月于北京

刘志诚传略

张春亭

提起刘志诚，许多高唐人都很熟悉。对于家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方面，他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因此，人们都很敬仰他。然而，他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也许，人们并不一定详细了解这位令人尊崇的高唐老乡。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一

刘志诚，1930年10月22日生于高唐县姜店乡廖王庄一个农民家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三，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早期，家里人靠种田为生，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只好随外公到高唐城里做生意，后来赚了一些钱，在城里买了几间房子，但母亲和他们兄妹仍然多数时间在家种地。

刘志诚的小学生活是在高唐县城的文庙小学度过的，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回农村劳动。1946年3月，刘志诚考入济南第四临时初中读书。济南解放后，他又考入山东省商业专科学校。1949年初政府动员参军南下，刘志诚积极报名参军，被分配在支援前线司令部工作，后又随军经徐州、南京到达上海。

1950年3月，刘志诚被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

工作。当年9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学习经济管理专业。1951年7月结业回上海华东区交通部工作。1953年3月,国家交通部在上海挑选干部,刘志诚又被调到北京,先后在交通部计划司和基建司工作。

刘志诚自知文化知识根底不厚,在交通部基建司工作,必须要有建筑方面的知识。为此他花了一年时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建筑系函授班,学习建筑专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建设委员会成立,刘志诚奉调到该委员会任副处长。八十年代初,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刘志诚又被调到外国投资委任处长。频繁的外事活动使他深深感到,不懂外语,工作很不方便。于是他在原有外语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又去电大学习英语,达到初级水平。他多次一人出国,除专业谈判外,其他尚可应付。1982年应日本政府之邀,他又到东京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学习班学习援外程序一个月,并取得了结业证书,对日后与日本洽谈投资事宜很有帮助。这期间,他曾多次陪同谷牧副总理到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深得谷牧同志的信任。

在"文革"期间,谷牧曾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并多次作检查,但都未能获得通过。后来,刘志诚被军管会指定为帮助谷牧小组的组长。谷牧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早获得解放,与刘志诚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认为,谷牧是1931年的地下党员,出生入死,忘我工作,对革命有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又有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应该给予解放。他不断做

群众的工作，帮谷牧解决家中困难，帮谷牧写检查并获得通过。然而，在较长时间内，谷牧仍迟迟未能重新出来工作。刘志诚考虑再三，便给在“文革”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写信，请求将谷牧放到重要的岗位上。不久，谷牧便被任命为国家建委主任。这些刘志诚事后都不曾对谷牧讲过，但他诚心诚意帮助老干部的行为却使谷牧记在心间。

1982年4月，国务院调整合并机构，将中国进出口委、外经委、外贸部、海关总署四部委合并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刘志诚先后担任外经贸部外资管理司副司长、国外贷款管理司司长，直至1990年12月，他又被选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会长由吴仪兼）。1994年离休后，他与与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合作成立了北京鑫帝桥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至今。

二

刘志诚在外经贸部工作期间，主要负责管理接受外国援助性的政府贷款和利用外资的工作，曾先后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重要会谈，其中包括与日本首相中曾根、竹下登，瑞典首相卡尔松以及挪威女首相布伦特兰等的会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刘志诚也参加了里根总统的答谢宴会。这期间，为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刘志诚几乎走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并无数次出国考察工作，他到过26个国家，其中大多属发达国家，仅日本就去过十多次，韩国也曾邀请他去宣讲中国的

投资政策等。从1980年至1990年刘志诚在外资司、贷款司工作期间，由他经办的外资项目达700多个，共200多亿美元，包括港口、铁路、机场、电站、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化肥、环保等国家急需的项目，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上述项目和资金中，日本占五成多，因此，与日方的交流较多。

最令刘志诚难忘的是他与木村一三的交往。本村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任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会长、日本国际石油公司董事长等职，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会见过他。1979年5月，木村访华，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木村在与我国交通部部长曾生交谈时，提醒说日本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可以利用。交通部随即出了一份简报报国务院。李先念阅后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此后，刘志诚多次参加与日本政府的洽谈事宜，当年12月即签订了第一份贷款协议，共接受日本援外贷款500亿日元，用于铁路、港口、水电站等项目建设。日后刘志诚见到木村一三先生时，对木村先生最早为中国提供信息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从此，二人成了朋友。本村每次来华都要会见刘志诚；刘每次去日本，也要拜访木村。刘还曾致函木村一三先生，请他出任北京鑫帝桥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名誉董事长。木村一三先生回信说："我力量虽微薄，但有您的委托，故同意任贵公司名誉董事长。"

1982年刘志诚率团访日，再次商谈日本政府向中国

提供援助性贷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松浦幌一章为日方首席代表与刘志诚会谈。松浦提出日本政府重视对华援助，但因政府财政赤字，经济上尚有一定的困难，可能满足不了中方要求。刘志诚说，中国清代著名作家曹雪芹在他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里说过，家大有家大的难处。我们理解日本政府的困难，但我们两国的困难是不同的。你们是富国，是富有的困难；我们是穷国，是贫穷的困难。希望对方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经过友好协商，日本政府当年即向中国提供550亿日元(约合5亿美元)的贷款。

1985年3月，应联合国工业贸易发展组织巴黎办事处邀请，刘志诚又带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赴法国访问，洽谈投资项目，成员包括山东省、天津市、重庆市外经贸委的负责人和广西自治区桂林市、辽宁省朝阳市市长等。为此，法方多次组织大型报告会，许多企业家及新闻媒体都参加了。刘志诚在报告会上详细讲解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政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巴黎，法国外交部特为代表团举办了酒会。代表团在法国半个多月的活动中，遍访了各大城市，刘志诚的生动讲解引起了一次次小小的轰动。法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代表团从里昂回巴黎的途中，法国记者采访了刘志诚。回国前，法国总商会主席又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的酒会为代表团饯行，法国各地商会也派代表出席，刘志诚的讲话再次受到欢迎。我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对刘志诚说，与过去历次相比，你们所受到的礼遇是破格的。

次年，联合国工贸发展组织巴黎办事处即组织法国企业家访华，刘志诚特意陪同他们到烟台、重庆、桂林等地洽谈投资事宜，并在桂林召开了投资研讨会。以后法国在中国搞了许多投资项目，包括雪铁龙汽车公司在中国办的合资公司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各级领导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自然也有刘志诚等人的一份辛劳。刘志诚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及其所属鑫帝桥国际商务咨询公司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其主要业务仍然是为国内外企业寻求合作伙伴架桥铺路。

1994年11月，世界著名十大建筑承包企业——法国艾萨义(SAE)建筑工程国际发展部总经理施瓦茨先生访华。他非常欣赏刘志诚的办事能力，一到北京就找刘商讨合作事宜。刘志诚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法方的意见和要求，并经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一份建议书，迅即发往艾萨义总部及其国际发展部，法方很快表示同意，双方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由于刘志诚对中法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即使在刘志诚离休后，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还致函刘志诚，希望双方不断联系，推动中法之间的经贸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三

刘志诚从事外资工作十多年，为各省市开办融资、合资企业，兴办各种项目，做了许多实事好事。1988年，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运动场馆已经建好，但还没有安装电话。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请刘志诚帮助引进外援。刘志诚与瑞典爱立信电话公司有联系，并与该公司驻京首席

代表毕约克比较熟悉。他给毕约克打电话说:“亚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有几十个国家参加。请你们考虑,可否为亚运会场馆安装电话?我认为,这对你们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条件是我们既不要广告费,你们也不要设备费,你们只给安装电话就行了。”结果,他们为亚运村安装了数千门电话,赠予成分约合80万美元。张百发非常感谢刘志诚,说帮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还开玩笑地许诺要给他一个北京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刘志诚笑笑说:“我本身就是北京市民,又不是外国人,有什么荣誉市民的问题?”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不少国家孤立中国,使我国一时处境非常困难。北京市原计划修建复兴门至八王坟的地铁工程也因缺乏资金而迟迟不能开工。刘志诚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出面与日本政府联系,日本政府很快同意给予援助性贷款40亿日元(折合3086万美元)。同年8月,该工程正式动工,我国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以及日本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等出席了开工仪式,打破了外国政府对我国援建项目的冻结。该工程于1993年9月竣工投入运营,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缓解了长安街的交通压力。

刘志诚参与洽谈引进的外资项目,在全国各省市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这里难以一一列举。对有些沿海和西部边远省区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给予满足。福建省副省长张遗、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向刘志诚提出分别在厦门高琦和深圳黄田各建一个国际机场。经过刘志诚的努力,得到了科威特阿拉伯基金会的支持,这两个机场都

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对当地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还有一次，西藏卫生厅厅长来京开会，要求刘志诚帮助引进一些先进的医疗设备。刘志诚很快为西藏争取到了一批外国援助的先进设备。

作为山东人，刘志诚自然更愿为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力。济南市附近原有一个军用机场，曾因机场小、跑道窄，飞机偏离跑道发生一次爆炸事故，死亡几十个人。山东省的领导同志曾对刘志诚提起希望另建一个较大的机场，只因缺乏资金难以实现。刘志诚一直把此事记在心中。1988 年科威特基金会主席费萨尔来华洽谈援助项目，刘志诚便向他提出可否帮助济南修建一个国际机场。他向费萨尔解释说："山东是我的家乡，因机场狭小，还出了一次事故，急需修建一个大的机场，请你们给予援助。"费萨尔说："刘先生，您知道，我们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协商，刚刚商定了四个合作项目，再增加一个十分困难。"经过刘志诚的一再争取，科方终于同意提供援助性贷款 1050 万美元，用于济南遥墙机场的建设。

对于刘志诚来说，引进了资金决不算万事大吉。他还经常询问开工了没有？经济效益如何？济南遥墙机场的协议是签定了，但工程是否已经开工了呢？刘志诚一直放不下心。一次他到山东潍坊洽谈项目，返京时特意去济南过问遥墙机场的施工进展情况。当他得知机场当年因缺配套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影响了施工进度，当即找山东省副省长李春亭，直率地说："遥墙机场这么好的

项目，不能因为资金不足而拖下去。如果你们觉得资金难以解决，我就把外资拿走好吗？"他说这话当然是一种激将法，却使山东省为该项目追加投资5000万元。后来这个机场建成了，被命名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并已与一些国家通航，而且还成了北京机场的备降机场。刘志诚重视这个项目是他认为济南有了大型机场，可以大大增加国内外交往，提高山东在国内外的地位。

对于养育自己的家乡高唐县，刘志诚更是一往情深，步入中年后他很想为家乡办些实事。特别是他从事外资工作以后，考虑到高唐是一个产棉县，棉花对高唐是一种优势，但是原有的设备落后，产品质量较差，达不到出口的标准。在他的大力协助下，1989年高唐引进日本软贷款2.54亿日元（合200万美元），采购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纺织机械，开办了一个针织厂，该厂于1990年投产，现已累计出口2000多万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些设备的引进和使用使家乡人受到了启发，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掌握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重要性。为了改变高唐县的农业结构，刘志诚还帮助引进外资800万美元，采购了欧洲市场上的先进产品和知名品牌——荷兰STOK的先进屠宰设备，在高唐开办了鲁海肉联厂。刘志诚说，有了这个肉联厂，高唐县农民就可以发展养牛；养牛又可以带动饲料产业，牛肉还可以出口；接下来还可以办皮革厂，生产皮鞋、箱包等；同时还可以利用牛骨、牛血作化工原料，发展化工产业。如此深加工下去，影响肯定是深远的。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厂的效益一直没有达到预想

的结果。

刘志诚认为，为家乡引进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家乡引进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思路。有一年，他在济南市南郊宾馆主办引进丹麦先进技术学习班，特意请省里给高唐县安排几个名额，请家乡政府派人去听听，看看高唐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对曾经任高唐县长、县委书记的路广业评价很高，他说路县长办项目比较踏实。他和路县长一起共商高唐经济发展大事，讨论发展规划前景，为高唐经济发展注入了心血。

四

刘志诚在外经贸部负责引进外资工作的同时，重视各省、市、自治区外经贸委是以怎样的思想和方法对待引进外资工作的。他每次到各省市开会布置工作，都力争把会议办成一个学习班。有一次，他在广东主持会议时说："我今天已经把你们需要的外资带来了，但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利用这些外资，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项目经过论证，证明是好的，利用外资是必要的，那就千方百计尽快加以利用，谈判不能没完没了。比如，广东很缺电，要建电站，谈一年只降了100万美元，还不如早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好，其价值可能远远超出100万美元。更何况降价之后制造商还会以次充好或减少配件，把降的价钱找回去。广东改革开放，非常需要程控电话，要算价格帐，也要算时间帐。当然，也不是越贵越好，只要互利就行了。外国给我们的优惠贷款，不够用还可以去争取，如果我们拖着不用，援助性贷款必然要跑到其他

发展中国家去。”与会者听后都觉得很受启发。广东机械公司进口二部经理唐鲁州说:“刘司长讲得非常透彻,的确是高见,令人佩服。”

刘志诚认为,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我们本来就落后,别人跨一步,我们必须跨两步、三步,才能赶上和超过人家,所以我们必须争时间,抢速度。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时间就是金钱》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国际商务》杂志上。一位美籍华人看后给他打电话说:“看了你的文章非常高兴。我和中国谈项目,有时一拖就是一年、两年;也有的合同签定一年多了,仍未执行。你说得很对,中国人应该懂得时间的宝贵。”

刘志诚办事,决不仅仅满足于从理论上教育别人,更重视身体力行。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就尽力伸出援助之手。改革开放初期,大连市有位副市长带队出国,花了200万美元只采购了1万门爱立信程控电话机,回大连后受到了批评和指责。刘志诚属下的一位处长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却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问题。日后他到大连市出差,特意对市外经贸委的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位副市长初次经办此事,缺乏经验。200万美元买1万门电话是贵了些,但却争取了时间,加速了大连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如果再等一年、两年,也许价钱会便宜一半,但是,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大连用的还是旧式电话,不仅自己不能与有关国家直接速话,而且外国公司到大连,连电话也打不出去,你还谈的

上什么开放呢？所以，这位副市长的决断，从加快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说，还是做了一件好事。为切实争取时间，刘志诚回北京后，立即与爱立信公司交涉，希望他们最好在辽宁办一个电话技术培训中心，无偿提供培训设备，帮助中方训练技术人员如何安装、使用、维修电话等。由于刘志诚的积极争取，对方表示完全同意。结果，由爱立信无偿提供的设备比那位副市长买电话多花的钱还要多。这不仅为大连市弥补了经济损失，还培养了技术人才。而爱立信公司也因此作了广告，扩大了宣传，赢得了信誉。因此，双方都对刘志诚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速度，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刘志诚甚至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通知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过去，进口外国设备，由国家计委审查后即可对外谈判签约。后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了一个通知，规定进口设备还要经国务院进口设备审查办公室批准后才能进口。实践证明，这一规定给下面增加了许多麻烦。根据各有关部门反映，刘志诚向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作了汇报，并准备向上级提出建议，要求只经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即可。经李岚清同意，刘志诚给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减少重复审查。姚依林很快批示同意。之后，刘志诚即拿着姚依林的批示到海关作了传达。从此，减少了审批环节，节省了时间。刘志诚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全国各地、各部门、各项目单位的称赞。他们说："这样做效率高了，项目建设快了，全国都受益了。我们国家如果能够多几个象刘志诚这样的领导干部，国家现代化

的速度也一定会快多了。”的确是这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一定的胆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又有谁敢于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通知提出否定意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呢？

刘志诚认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接受外援也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韩国接受外援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就“毕业”了，我们也应该抓紧时间力争早些“毕业”。有一次，丹麦开发署署长严森非正式地对刘志诚说：“你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支援不起呀！”刘说：“我们从来也没打算请你们永远援助我们。目前我们有困难，一旦我们手头富裕了，我们也会援助别人。我们决不会躺在别人身上，永远以发展中国家自居。我们希望自己尽快成为发达国家，也像丹麦那样成立开发署，援助别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减轻你们的一些负担。”他还说，我们目前只是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援助而已。中国不是一个自私的国家，我们现在也援外，但数量有限。这位外国朋友听了很高兴，认为刘志诚说得合情合理，应该继续给中国一些宝贵的援助。

刘志诚是在二十年前说这番话的。如今他说，我们现在接受外援也受限制了，除环保项目和其他不赢利的项目外，凡属赢利项目，外国已不再对我们提供援助了。看来，我们和韩国一样，也快要“毕业”了。

五

刘志诚在外经贸部工作期间，以他的经验、智慧、为人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影响了许多人，并且培养提拔了许多干部。他说，发现和培养一个优秀干部并放到相应的

领导岗位上去，甚至比作一个好项目还重要。有的干部在局内得不到提拔，他就把他调到公司去，或派到国外商务处去，或调到别的部委去，或借调到外地去，以达到培养、提高、提拔的目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志诚在国家外国投资委员会工作，由于需要日语翻译，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挑选毕业生。他向院方领导说："外资委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外语水平高，而且政治素质、仪容风度都要好。"经学院人事部门推荐，刘志诚审查同意挑选了毕业班班长于贞生。1984年他派于贞生到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去学习金融业务。由于于贞生的出色表现，野村株式会社社长伊藤正则向刘志诚提出，希望留于贞生在野村工作，并说要多少钱都可以。刘志诚未加可否，却有意识地说："这件事您还是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小于对伊藤说："非常抱歉，我来日本学习的目的是要回国效劳，恕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小于在日本学习一年多，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有个日本姑娘爱上了他，希望与他建立恋爱关系。小于说："建立恋爱关系可以，那么以后你可要到中国去工作。"小于委婉地谢绝了她，学完后便回到了祖国。刘志诚认为于贞生是一个难得的优秀年轻干部，便一直寻找破格提拔他的机会。终于有一个到外地挂职锻炼的名额，便极力推荐他先以副处长职务去工作两年，回来后又顺理成章地提拔他为正处级干部。于贞生现在已是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十多年间，经刘志诚推荐提拔的干部有十多人，现正在各个岗位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现在在美国旧金山领事馆担任总领事的王永普、在中化总公司担任部门总经理的郭永平等。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刘志诚总是给予全面分析，一分为二看待优缺点，凡能保护的干部都尽力给以保护。例如，有一个干部在外事活动中犯了错误，局内已作了严肃批评。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个干部时，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要给他记大过处分。刘志诚说，毛主席处理犯错误干部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处理问题，就应该本着从宽的原则，不记过，也不入档案。当时李岚清接受了这个意见。事后证明，这个干部不仅改正了错误，还丢掉了包袱，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可以说，刘志诚的言行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他们没有忘记他。逢年过节，他们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表示问候。有的说：“我们虽然没能经常去看望您，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您。”

六

在将近七十年的生涯中，刘志诚并非一帆风顺，他也曾遭受过挫折。那是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时任交通部综合科负责人的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让别人提意见，提了意见又说人家反党，把人家打成右派分子这样影响不好。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去处理才对。”从此，他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替右派说话”等，并被下放到河南省新郑县郭庄乡张祥村劳动改

造一年。后来回到交通部工作，直到 1978 年才为他恢复名誉，以至影响到他的进步长达二十二年。然而，刘志诚依然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外经贸部工作期间，李岚清任司长，刘志诚任副司长，二人共事多年。部领导曾提出调他到国外工作，以便提拔他为正局级干部。他坚持说："我没这个想法，就这样不是照样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吗？"

刘志诚一生坚守的一个信条是：工作中，不管别人求他办什么事情，他都要尽自己所能去办，决不向对方提任何要求。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有人夜里一两点给他打电话说："有个项目，请您帮助联系。这么晚打扰您，真不好意思。"刘志诚说："你不是为了工作也没有睡觉吗？"他当然也可以说："现在是休息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但这种话决不会从他的口中说出。他常说："我们都是为人民办事的，是人民用薪水养活了我们，我们辛苦一点又有什么不应该的？"

刘志诚一生经历丰富：做过行政领导，也做过党团工作；有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也有在上层领导部门工作的经历；有在国内工作的经历，也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还有挨整受批判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锻炼了他，丰富了他。他对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国外各有关援助机构、国内外各有关大公司曾有过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影响，尤其对国际金融、利用外资和项目管理具有较丰富的经验。1983 年他曾获得美国休斯顿荣誉市民称号。1986 年获得高级经济师职称。他的坚定信念是：与时俱进的共

产党领导和不断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是无可替代的。他最欣赏的诗句是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他平易近人,是一个性格豁达开朗、兴趣广泛的人。他喜欢游泳,喜欢打乒乓球,还喜欢下象棋、打桥牌等,曾是国家三级运动员。

2003 年 7 月于北京

自叙——告家乡父老

刘福盛

我生长在家乡的黄土地上，
圣洁的齐鲁学府哺育我成长。
儿时，爷爷嘱我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亲爱的党指引我走上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战场。
几十年医学实践有苦有累，使我才干增长，
救死扶伤没黑没白，让我更加坚强。
朝气蓬勃五十年，站在讲台和手术台前，
为千万病人祛除病痛，让他们恢复了健康。
曾经施教的学子涌出医学殿堂，奔向建设远方，
科研论文、成果奖状装扮辉煌。
而今征程未已，壮志未酬人渐老，
不甘寂寞，余热生辉，坚守病人身旁。
作为人民医生、人民教师的苦乐，犹如过眼烟云，
留下的是无限宽慰与欢畅。
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为人民奉献一生，
报效祖国、建设家乡，更待儿郎！

2002 年 5 月 11 日

附：

刘福盛简介

刘福盛，1931 年 5 月 10 日出生子高唐县固河镇李官

屯村，1955 年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抱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理想来到祖国东北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分配在哈尔滨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历任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肿瘤医院外科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系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1992 年退休后受聘于省市各医院，从事肿瘤病的外科治疗及培训工作等，被黑龙江省卫生厅誉为“当代医学家”。

三十年来专攻腹部肿瘤的外科治疗，对胃癌、大肠癌、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外科手术及综合治疗有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在省内外享有盛名，有“关外第一刀”之美誉。曾担任医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工作，先后被聘为讲师、教授，两次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参与研究的课题及主要成果有：胃癌、大肠癌的扩大根治手术，术前放疗及综合治疗研究；乳腺癌的动脉插管化疗及扩大根治手术研究；肝癌、胰腺癌的手术治疗研究等，曾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及省卫生厅科技进步奖多次。

退休后发挥余热，穿梭受聘于省内各大中医院，为病人做手术，救死扶伤，受到广大患者和同行专家的赞誉。

我从事雷达研制事业

周怀仁

2003年2月家乡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再次来电约写本人自传资料的同时，寄来一册《高唐文史资料》（海内外 高唐人专辑），其中有我的老校友、老同学。几十年我们天各一方，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他们那光辉的业绩，他们那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精神，他们对高唐父老乡亲的热爱和奉献，使我感动。我为家乡高唐有这样的优秀儿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家乡人民和政府对海内外高唐人的关怀，也使我倍感温暖和厚爱。我年迈将要沉淀的热血激起了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此我愿向亲人们作一概括的汇报，愿以此向高唐的父老乡亲、同学、校友，向漂泊在海内外的高唐志士仁人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寄以良好的祝愿。

我1936年出生在姜店乡范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过着饥寒交迫、到处流浪的生活，直到家乡解放，我才有机会读书。由于家庭贫穷，我从中学到大学全享受国家助学金，在学校读书时，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读书、读书、再读书。我这一生读过十四年书，工作后，实验室、试区场、宿舍，从早到晚，计算、设计、实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雷达研制三十七年，从实习生逐步晋升为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受命担任过产品组组长、

室主任、工厂设计所所长、研究所产品副总研究设计师，主持雷达产品设计工作。

三十七年中我参与或以产品主持设计师的身份，主持研究了621型、514型、515甲型、518型、589乙型、384型等敌我识别雷达、舰载对空搜索警戒雷达、大型三坐标引导指挥雷达，被电子工业部、海军司令部特约参加过10人组成的海用雷达调研、整顿、规划组，被海军司令部特约对法国导弹驱逐舰战斗群进行过参观访问，赴伊朗出售安装过雷达。曾写过《米波测高雷达阵地选择》、《信号分析与波形设计》、《雷达恒虚警处理器》、《TWT——CFA放大链》等十几篇论文发表在《现代雷达技术》等期刊上，还翻译过《雷达工程手册》、《现代雷达》、《雷达分析》等书。

忘不了的读书岁月

我出生的家庭据说曾是大家族，还有人中过秀才，祖辈开始衰落，到我父亲这一辈更是一贫如洗。儿时我住外婆家，砍柴、割草，野孩子般的嬉戏。解放后我村成立了小学，我才回家上学，那年已是12岁。老师看我个头高，年龄大，不好意思与小孩编在一年级，让我在高年级从第五册读起。一个字不识、一个数码不认的野孩子，居然读最高年级是个笑话，可想象到我读得吃力，但我坚持下来了。白天我拼命地攻读，晚上到学习好的同学家补习，第一学期各门功课平均不到30分，第二学期超过了70分。

1949年初，我的老师唐书范先生调到刚成立的大董

庄高唐第四完小当校长，就把我介绍到该校就读。全班有60多位同学，有的二十多岁已为人父，有的解放前已读完小学，年龄上我又属于最小的群体之内，虽然初小我没有什么基础，但由于我读书用功，每学期考试成绩总在前十名之内，毕业时考了第五名。

1950年末我考入全县最高学府——高唐中学第二级，当时还有第一级、两班女子师范和两班女子高小。该校历史悠久，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精干的管理干部，在这里，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老师的培养和教育，党团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优秀学生的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了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1953年我考入了聊城一中，这是我人生旅途上很重要的一站，基本上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一中位子大运河两岸，河东是一排排教室、宿舍和四周长着参天白杨树的大操场，河西是建筑风格独特、设计精巧的山陕会馆，教职工大院中心是红砖绿瓦高大的礼堂，在钟楼上高挂着一口大钟，嘹亮的钟声指挥着全校师生的教学和学习生活。一中具有团结友爱、勤奋严谨的校风，有立志、刻苦、多思、进取的学风，有诲人不倦的老师和情同手足的同学。一中的升学率在全省一直名列前茅，每年新生入学，校长总是先介绍有多少人考取清华北大，有多少人保送苏联留学和哈尔滨军工大。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我学习更加 刻苦勤奋。我们高唐考入聊城一中的七个同学都不示弱，在学习上我们成绩虽然不是最好的，但都是一流的学生，加上我们各自都有特长，我是短跑百米

全校第一名、校足球队队长，白若景是四百米绝对冠军、校文体部部长，童祥云文章写得很有名气，常庆之、王万顺、王保林、韩民忠等篮球打得很漂亮，当时同学们都称我们是“高唐七君子”。

1956年4月聊城一中推荐我去苏联留学，校长张训斋和教导主任刘传江分别找我谈过话，并填写了留学的表格，但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暂停了去苏联的留学，六月份 又推荐我报考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业学院)学习军事工业。当年7月我顺利地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专业是坦克制造，后因院校专业的调整，改读无线电系雷达专业。该校是治学严谨、人才辈出的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南临美丽的紫竹院公园，有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和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不但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和特有的雷达技术，也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生活最艰苦的年代，挫折和教训使我又懂得了一些哲理。学术需要去继承，更需要去创新，幸福生活需要去创造。人生象是在演戏，社会是个大舞台，你是观众，是演员，更是导演。人生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坎坷，有挫折，为追求真理和智慧，必须去思考，去追求，去拼博，才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

在南京的日日夜夜

1962年我被分配到第四机械工业部(现为信息产业部)南京720厂，它是中国最老的专业雷达研制生产工厂，很多雷达厂是从这里派生出去的，很多雷达是这里研制生产的，很多雷达专家技术干部是这里培养的。到1962

年它承担的生产科研任务已十分繁重，虽然一年就分来了四十几位大学毕业生，但和要完成任务所需技术人员相比，差距太大了，尤其是在雷达专业人才较少的情况下。我报到后，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新产品办公室，从事621型敌我识别雷达的研制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已仿制和研制了一批雷达，基本上形成了地面雷达防空网。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能分清敌我飞机，影响作战指挥，甚至击中自己的飞机。那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严重恶化，苏方撤走了专家，断绝了雷达防空武器的供应。中印边境发生激战，美蒋间谍飞机经常来大陆骚扰、侦察。由于没有敌我识别雷达，敌飞机已到内地我们还分不出敌我。鉴于上述状况，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求第四工业部、720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敌我识别雷达系统，参考型号为苏制HP3——10和HP3——20型敌我识别雷达。

敌我识别雷达的研制，保密性很强，在方案拟制、样机分析、试制阶段参加的人员很少。总参有专职人员抓总，四机部有位副局长驻720厂指挥，我们基本上被封闭在实验室内，白天黑夜地干，但大家都很高兴，干劲十足。我的主要任务：第一，完成HP3——10的性能测试分析；第二，对621型各分机主要技术指标进行分配，拟制主要分机的任务书；第三，参加第一台621型样机的调试测试工作；第四，拟制621配置现役雷达的总体方案。我都如期完成任务，那时我每个月都得到最高的奖金。

1964年初，我被任命为新产品514型雷达产品组副组长、副主持设计师，负责514雷达的全面研制工作。经过一年半的奋战，研制出第一台样机，在南京土山进行了试飞，当时总参谋部张爱萍副部长 、四机部王诤部长等现场观看了我们的试飞实验。结论是514型雷达设计新颖，雷达威力范围可达450公里，大大超过了 苏联的Ⅱ——10、仿苏的407、美国SCR——270同类型的雷达，并且能够自动测高，有动目标显示还能变频。提高了雷达的抗干扰性，得到部领导和军方的好评。514型雷达是我国防空网中的主要雷达之一，也是民航机场的主要雷达之一，720厂生产了十五年之久，共生产了几百部，还向几个国家出口。

1965年底，我被任命为515型雷达组组长、雷达主持设计师。根据越南丛林战争的需要，军方要求我厂为越南研制一种全固态化的、抗干扰性能强的，既能人背马驮，又能直升飞机运送，适用于山区丛林作战的515型雷达的任务，这种雷达那时已超越常规雷达的概念，没有继承性，也没有参考型，整机和主要元件几乎是同时开始研制，十分困难，尽管四机部、总参谋部召集有关厂、所和高校开过几次协调会，但进度很慢，总拿不到器件。

1966年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把我和产品结构主持师王瑞珍召集到北京饭店参加传达毛主席批示的“09工程特别公函”的汇报会，海军要我们把研制的515型雷达首先安装在051导弹驱逐舰上，冠名为515甲型对空搜索警戒雷达，能接受这一任务我们感到非常

光荣，但任务十分艰巨。我回到南京，向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以及厂里的中层干部作了汇报，全厂掀起了为515甲型雷达研制奋斗的高潮。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时爆发，厂长、书记下台游街蹲“牛棚”。和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姚副厂长、王总工程师也成了“国民党特务”被打翻在地，批判我的大字报专刊已成，帽子也已做定，准备先衔袜子游街再批斗。幸好有一位山东工学院电机专业毕业的老乡是造反派有影响的头头，他站出来讲了一段话：“老周祖祖辈辈是贫农，阶级立场坚定，他是没有问题的……”我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随后造反派令我去烧了半年的锅炉，接着，不知什么原因，又强行任命我为515甲产品组组长、主持设计师，警告我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忠不忠看行动”。

第一台515甲型雷达如期安装在051导弹驱逐舰上。我在大连造船厂奋斗了半年之久，经过总调、试用、试航、试飞，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使用方提出的要求，填补了我国导弹驱逐舰对空搜索警戒雷达的空白。515甲型雷达随051导弹驱逐舰出海南太平洋参加我国的导弹打靶实验，由于雷达性能优良，工作稳定可靠，观察目标良好，我荣立三等功并得到嘉奖。

奋战在大别山

后人很难相信，但又是无可非议的事实，我们研制海用产品的人，却离开了大海、长江，踏着当年刘邓大军的足迹，到大别山区岳西县安营扎寨。岳西县政府设在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县城，被一条沙河蜿蜒盘绕，沿沙河的山

沟里依次建立了0871总厂、雷达设计所以及五个分厂、一个医院、一处技校，第六个分厂设在六安。从1969年开始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到达这里，有的车间建在山洞中，工人住着茅草屋，又做工又种菜，当时生产着由南京移交过来的581型空军用雷达和354型、405型舰载海用雷达。

1972年8月25日海军和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七、第十研究所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一次会议，称8·25会议。我为技术顾问陪同0871总厂军管会主任、海军大校陆广恩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国要建造大型导弹驱逐舰，代号为055型，0871总厂承担518型舰载对空搜索警戒雷达的研制，该雷达要达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国际水平，要选用先进的雷达工作体制，采用先进的雷达技术，无任何继承性，只给介绍了几个国外同类型雷达的型号，当时看来是一部雷达畅想曲。

我被任命为雷达总体副主任、518雷达主持设计师，全面负责该雷达的研制工作。首先进行雷达总设计方案的论证，拟制总体研制方案，经数次汇报得到海军的批准，拟制下达了各分系统的设计任务书，设计所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都从事了518型雷达的研制工作。

为了更好地完成研制任务，我也与中国科技大学方树尧教授领导的教研组合作研制捷变频综合器，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雷达终端信号处理、自适应DMTI技术方面进行长达三年的合作。著名学者蔡希尧教授、保诤院士都进行过多方面的指导。其他如华中大学、南京772厂、北京12研究所都为518雷达研制做出了贡献。

由于518雷达的新技术多，合作单位多，虽然历时八年才完成样机的研制，但是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有了技术储备，从而使山沟里的雷达厂在研制雷达过程中能紧紧地跟随国内外的技术发展前进。

1974年我受四机部、海军司令部的特约，参加海军雷达十人调研整顿规划组，赴全国海军雷达研制生产的研究设计院、研究所、工厂、高等院校、海军的北海、东海、南海三个舰队，对正在研制生产及服现役的或即将要服役的海用雷达进行调研摸底分析，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对海用雷达的研制、生产进行了分类调整，并写出了海用雷达发展、研制规划纲要。

1978年我再次受海军司令部的特约，以海军少校的身份，参加了由武器系统、信息指挥系统、动力系统、电子战系统等各方面军事专家组成的访问团对法国以迪居艾特鲁安导弹驱逐舰为首的驱逐舰战斗群进行了参观访问，其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完善正在研制中的055型导弹驱逐舰的各系统武器装备。

在0871总厂期间，我还被任命为设计所所长，把山沟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六安，进行了生产、研制各方面的整顿，准备在雷达研制方面再创辉煌，但这仅仅是美好的理想。当今的世界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祖国是改革发展和开放，历史已恢复原有的面目，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代替，军事工业为主导投资无限量的时代不复存在，堂堂的南京720厂雷达产业已被压缩到极限，0871总厂能若何？我这个所长觉得压力很大，危机感很强。在

这种压力下我阅读了大量文献,细心考查了近代战争纪实,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幻影——ID"战斗机200架,在地中海上空保持50米的高度飞行,进入埃及后分三个突击方向,突袭了埃及的17个空军基地。不到三个小时,击毁了埃及三百多架飞机,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于航空导弹、电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的火力对抗的作战模式,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以远制近,出奇制胜,将是未来战争的模式。我们能否研制一种高级雷达,能够提前预警低空突防的飞行器,能测出飞行器的各重要参数,并指挥我武器系统进行还击取得胜利呢?我论证并写了这种雷达的研制方案,到了北京向海军司令部装备部、电子工业部的首长做了详细的汇报。他们告诉我这种设想是好的,但0871总厂无力研制这种雷达,第38研究所已开始研制,建议我最好到38所参与研制,38所将由贵州山区迁往合肥。听了他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决心辞去0871总厂设计所所长的职务。

在38研究所研制雷达

1989年我被调到电子工业部合肥第38研究所,被任命为384大型三坐标雷达的副总主持设计师。当时38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总工程师、各研究部部长大多数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友或同班同学,还有几位是在南京研制05工程时的老朋友。我在这里干了近十年的雷达研制工作。

384型雷达是在总结了现代战争对雷达要求的特点,国际同类型雷达的水平以及发展趋势后而开始研制的。

有几十个预研专题和攻关项目，诸如要检测高度百米之下的飞机，有效地进行电子对抗，反反雷达导弹的袭击，如何对付多批次、多层次、多机型、多方位的攻击，如何指挥武器系统歼击机进行拦击，全机如何自动化、职能化，当然还有关键的电子器件、微型多功能模块等。

384型雷达由近百名高级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攻关、反复试验，终于在1993年研制成功。通过试飞鉴定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空军、海军云集38研究所，商谈订购384雷达。在国际上，伊朗、埃及、巴基斯坦、津巴布韦等国也纷纷派军事代表团来合肥38所参观并商谈定货事宜。俄罗斯、法国、美国等著名公司前来洽谈技术合作事宜。后来的384甲型雷达研制与俄罗斯进行了合作。

1994年——1995年我赴伊朗将研制的384型雷达安装在伊朗军事基地，我连续三天三夜工作，经过细心调试和四十五度高温的考验，伊方进行了试飞验收，并和基地同类型的美国雷达相比较，雷达对单机型、多机型、多层次、多方位、近距离、远距离探测发现和作战范围内的跟踪、引导和指挥都进行了严格检验。伊方精心选配最好的飞行员，飞行高度60米，距离10公里，起飞的时间、地点、方位都不告诉我们。飞机起飞就被雷达发现，一直跟踪到降落。进行四十多天的试飞后，又进行了两周的军事演习，伊方动用了三十多架美制F——105战斗机，几乎集中了伊方所拥有的苏制电子对抗设备和雷达导弹系统，四名将军坐阵指挥，制造最恶劣的对抗环境，对雷达进行多方面的考验，最后进行了各项技术指标的复测。

384 大型三坐标引导指挥雷达均满足购买方的要求，得到伊方的好评。

在这严峻的考验中，我们吃住都在阵地，我体重减轻了 15 斤，人像扒了一层皮。但仍然坚守阵地，保养、维修、调试雷达，验收之后，又进行了六个月的试用，伊朗空军司令、副司令都到 384 雷达站参观过，亲手操作，最后伊方决定撤走美制雷达，由 384 雷达代替。于是，384 雷达的第二部、第三部……陆续运抵伊朗并安装在各个军事基地上。

我从事雷达研制工作三十七年，现已退休。我的家人和同学朋友有时问我，你怎样评价你的过去？我给他们打了个比喻：我象一个猎人，善于发现猎物，捕捉猎物，但不太会分享猎物。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一定的天赋，是勤奋的人，是有毅力的人，有机遇也有挑战，都坚持过去了。虽已年迈，看到祖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形势，科技队伍的成长与壮大，看到我们 38 研究所一天一天的新变化，领导班子的团结，全所的宏图规划，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丰富多彩，安度幸福晚年，我心情舒畅，感到夕阳无限好。

2003 年 9 月 4 日于合肥

我人生的春夏秋冬

刘爱华

接贵函心潮澎湃
忆往事思绪万千

当远在边陲新疆乌鲁木齐的我接到家乡政协《高唐文史资料》(海内外高唐人专辑)的征稿信,似亲人归至,如故友重逢,彻夜难眠。翌日,我迎着晨曦登上红山虎头峰,脚踩着红色陡坡岩石,背靠宝塔的红砖绿瓦,我眼望着东方,仿佛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高唐,又听到了旧高唐南城门雄伟屹立的城楼上斗拱飞檐的悬铃随风摇摆而发出的悦耳响声;我好象走到果木市街的北端,看着钟楼下的车水马龙;又好象在高唐"四景"之一的走桥不见桥附近进了小饭摊的布棚,在长条的矮凳上用小瓷勺喝那老棉油炸辣椒黑白分明的老豆腐;我走到"红部"(日伪时期日本人住址,解放后为公裕轧花厂),那倭寇瞪着狼眼挥着佩刀在喝令过往行人出示良民证,吓得我藏在亲人的背后不敢睁眼……嗷呀!我是在红山上站着。我回过神来,顺着幽静的林荫小道漫步下山回家。

家,我日夜思念的老家在山东高唐县城西南十八里的侯里长屯(简称西屯,解放前属第五区信六乡,现属赵寨子乡)。相传我刘氏是从村南的刘善人庄(今属清平

镇)移迁至此,已有十余代。我父亲是中医大夫,又是乡间的学者,老年后被乡里人尊称为刘四爷。他开设"峻德堂"药店,远近患者有求必应,如遇穷苦人无钱看病也施舍一点。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村中算是中等,读有书,耕有田,不愁吃穿。我母亲未读诗书,是位勤劳善良的人,除操持家务之外,初一、十五烧香敬神,祈求全家平安。我1934年6月26日出生,上有一个哥哥。我三岁始认字,六岁入学。学塾设在村中大庙西院,明三暗五一座北房,北墙上用红纸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之神位,入学时学生先对孔子三拜九叩,再给老师磕头。我的启蒙先生是本村人称老秀才的肖长福老师,我上的第一课是《三字经》。每天放学前先背书,我背得最熟,老师认为我聪明过人,能过目成诵,实际是父亲教我早就念熟。我在学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母得知喜出望外,认为我可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故而把我当成掌上明珠。

听说唱萌生学艺
掌中珠变为泥土

家乡风景如画,但交通十分不便,加之常年的战乱灾荒,美丽富饶的庄田也就变成了穷乡僻壤,文化生活特别贫乏,看不上正牌剧团大戏,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来乡下演出的流散说唱艺人(大都是盲艺人)。那时在乡亲们心目中的明星大腕就是高唐民间艺人、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郭汝河(原来唱四平调),还有夏津县的梅花大鼓王长志(人称王二快嘴)。曲目内容都是赞颂义夫节妇和除暴安

良的好汉。我听着这些曲调如临其境，心神痴迷，很羡慕这些书曲艺人，认为他们是代表好人说话的，这是我酷爱曲艺的原因之一。另外从我记事起所见之世道，权势之家族的纨绔子弟可以任意欺压良民的孩童，那些军阀、村霸、街痞横行乡里，凌辱善良的百姓，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仇恨的种子，总想若能学了说书就可以用演唱作利剑怒斩魑魅，使鼓板为铁帚横扫魍魉。六岁那年同村的六乡乡长郑忠和贺新居请来郭汝河演唱，唱的是《杨金花夺印》。散场后我走到郭汝河先生跟前说："老师我想跟您学徒，能要我吗？"郭夫人是伴奏员，她慈祥地看着我，又看郭先生，郭老师笑着说："你还小，好好念书，长大再学"。从此，我就认定他就是我的恩师，因为我非常崇拜他。但不读书还是不行，父母天天盯着我这颗"明珠"，好让我将来大比之年题名金榜，锦衣还乡。

我在学塾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小学韵语》、《论语》、《孟子》，突然王辛庄中心校校长胡桐（字凤舞）来查学，通知一律改换新课本，文言换白话。老师换了徐从儒先生，课本换为国语、自然、修身、历史、算术、常识，珠算改笔算。有一天，老师发现我听讲与众不同，别人上课望着黑板听讲，我总低着头。他走到我桌前，见桌上摆的是课本，抽屉里却是民间的唱本。徐老师对父亲说："这孩子很聪明，但不用心学习。"我父亲听后回家来将我责笞一顿戒尺（包草药时压包装纸的木板），我母亲抱子失声，夫妇大吵一顿，我没认错，也不改，常到村外给乘凉的叔伯乡亲学着郭汝河说唱，还有人夸

我学得很像，父母听说后感到无地自容，亲友也讥笑我父母。常言道："规矩出孝子，娇养无后成"，从此我就遭到严管紧束。上下学母亲接送，除吃饭、上学外，我被禁锢在书房里，每天必须书写一百至二百蝇头小楷或大字，时而我父亲走进，训教一番："咱们是诗书门第，耕读传家，老少辈子都是安分守己，家中不缺你吃穿，怎能沿街卖唱呢！"从此我感到在家度日如年，便离家出走。我离家后得以自由，和盲艺人一起演唱，家中父母如坐针毡。月余我被人找回，母亲见我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恨爱交加。回家人校复读，老师和同学视我为朽木不可雕之材，个别同学叫我"说书的"，我听后不以为耻，自以为荣。

春雷鸣开天辟地
演艺人荣登大雅

正当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时，村中突然有农民打扮的陌生人出现，我发现他肩背柴筐，暗带枪支，以后方知是八路军的驻村干部。不几天，要好的同学神秘地叫我去开会，说要成立儿童团，我问都干什么，他说，站岗、放哨、抓坏人，唱歌、宣传、扭秧歌。我觉得这是天遂人愿，于是加入。驻村干部看我积极肯干，不久就让我当儿童团的指导员。天天开会、抓坏人、唱新歌，把上级的方针政策编成快板或歌词演唱宣传。那时土匪杂团如郭金诚、庞长申、郭隆元、李光华等还守着土围子，农会、儿童团、自卫队成员都有被暗杀的危险。

约在 1949 年我参加了全县汇演，得到了一份纪念品，

记得是一个笔记本、一只铅笔。从此我就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曲艺事业。我最爱演唱的曲艺形式就是河南坠子、西河大鼓和山东快书，有时和仨俩艺人联合演出，有时一人，正当我如饥似渴地钻研艺术之时，有位好心的演员告诉我说，你现在有了名气，可是他们都笑你没门户，也就是没有老师。这句话在曲艺圈是很难听的，不怪别人讥笑，旧时代的艺人多数被人看不起，受欺辱，多年形成行帮宗派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告诉他，我有老师，六岁我就拜见过郭汝河先生，现在我可以带艺拜师。第二天，我买好礼物，去谒见郭汝河先生。见到恩师，我真挚诚恳地说明来意，学着他的唱腔唱了几句西河调。恩师连说很象，当即正式收我为徒，告诉我门户，起了艺名刘爱华（我本名刘春荣）。后又在高唐文化馆拜见了恩师刘桐梧（同武）先生，拜师后我如释重负，心想这可出师有名啦！1952年我经人介绍到茌平戏楼演出，第一场演大鼓《岳飞传》和山东快书《武松起会》。当时的演出倍受欢迎，有关领导看后赞不绝口，并决定留我在茌平县胜利曲艺团当主要演员。我喜出望外，心想，我这个散兵游勇今天竟加入了正规化部队。不久，我担任曲艺团团支书，常和同一系统的县京剧团共同学习政治，业务上兼学些戏剧的特长为我所用，以能者为师，博采众长，苦练手眼身法步，一哭二笑三白口，学会唱再学走，演技大有提高，因而受到文化界领导器重……1955年开挖四新河、治理徒骇河期间，领导让我为河工演唱，我用自行车驮着分量很重的旧式大喇叭、大电池、收音机等到工地演出，遇到下雨天连车

带人陷人泥坑,有一次鞋陷人泥里找不到只好赤脚而行,晚上照常演出。领导见我吃苦耐劳,工作认真,多次表扬。河道竣工后,我没要分文工资(那时没有国营文艺单位),县文教局领导得知此事要给我补助费,被我谢绝。由于我过硬的艺术功底和出色的表现,1956 年底组织任命我为胜利曲艺团团长。

应聘请西陲献艺
从号召边疆扎根

1957 年 3 月,有一位来山东接演员支援边疆的新疆人找我,说看了我几次演出,感到很满意,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去新疆,订一年的演出合同,期满留去自由。并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山青水秀瓜果飘香,但由于地处边疆,人烟稀少,各族群众渴望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曲艺又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希望我能去支援边疆的的文化事业。当时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没急于答应,心想只在当地演出,容易满足现状,不如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开阔视野,这也是锻炼学习的极好机会。我找到文化局长说明去意,尽管当时剧团很需要我,领导还是同意我支援边疆,给我写了证明信,并再三叮嘱,注意安全,按期返回,不要辞去团长职务。我含泪离开领导、同志和亲友,踏上西进的征程。当时火车只通兰州,下车后住兰州旅社,我对接我的友人提出先在兰州演几场,一是增加收人,同时也试一下西北的观众是否认可山东口音。第三天,我们在兰州市文教局办理了演出手续,就在双城门小剧场挂

牌亮海报，头场演出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出乎意料，一炮打响。接着就被兰州铁路局职工家属区负责同志邀去演包场。七天的演出场场都是有悬念（也叫扣子），我演的《小八义》这种曲目雅俗共赏，很受欢迎。期间兰州市文教局负责人找我谈话，说兰州很需要木板大鼓这种演出形式，山东快书在兰州很受欢迎，您若能留下来保荐加入组织。我还没说话，接我的人就火撞顶梁，怒说："你们留下他我们咋办？"我暗自侥幸，在西北我这棵小蘑菇倒变成灵芝草啦！接我的人更将我另眼看待，倍加关照。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在颠簸的路上继续西行，出了嘉峪关，茫茫浩瀚戈壁沙滩，草木不见，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这使我想起发配新疆的林则徐。行程数十天才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我迫不及待地提出看看市容和演出现场，陪同人员带我先到首府最繁华的一条街——大十字，我看后方知城域微如弹丸，两边全是土木结构的矮房低屋，大街小巷是无风三尺土、有雨半街泥的土路，顿时我感到心灰意冷，只盼合同期满立马回归故里。很快乌鲁木齐市有关领导接见了我，当时的文教科长安如清和文化馆长高同志代表新疆文艺界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新疆日报》、《乌鲁木齐市报》都刊登消息："欢迎著名青年演员刘爱华来我市巡回演出。"那时名角到边陲新疆演出的很少，可以说山中无老虎，我这猴子也成王啦！节目是木板大鼓《隋唐演义》、山东快书《武松传》，开演头场领导审查，座无虚席，散场后观众还恋恋不舍，有的还说笑话："看海报上刘爱华这名字像个大姑娘，闹了半天还是

个俊小伙，唱得真好，明天还来。”有关领导也表示非常满意，并告诉我这里暂时条件差，三年后就会大变样，你是青年人，应该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争取在曲艺这个百花园中开出鲜艳之花，结出丰硕之果。我一听打了个寒战，就像包文正说陈世美那话一样，“看是来得去不得了”。听天由命吧！总之我要把节目演好。演出两个月之后，观众还是络绎不绝，晚场我和其他演员再联合演出（行语叫花场）山东快书《武松传》、《马家店》、《鲁达除霸》，还有河南坠子、竹板书、快板、魔术、相声，大都由我作主要演员压场，一人拿两份报酬，但主要精力我还放到长篇演出上。说唱这种形式和其它演出不同，其它可一招鲜吃遍天。长篇是每天两小时接着昨天的故事不间断，同时内容包罗万象，还要有新颖的词句和唱腔说唱人物、故事，才能得到观众的赞许，如若不然，就会失去回头客，后果不堪设想，不像跑场子，一段这里唱了那里再唱。

前边我说这里是弹丸之地，后来察觉到，这里观众大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政治思想觉悟高并有一定业务特长来支援边疆建设的各界优秀儿女，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才荟萃之堂，他们鉴赏能力特别强。乌鲁木齐市书场有十余处，竞争对手更是精兵强将，若想超过对手，那就需要增长各方面知识和苦练表演创作才能，就凭自己这半瓶墨汁，几天的四书五经，现在看来是杯水车薪。随着演出的成功，加上观众的厚爱，报刊、电台、摄影、众多记者接踵而来，报纸经常有介绍我的文章和照片，再加上邀请演出和应酬，我是焦头烂额，感到自己好象压瘪的轮胎超

出它的负荷量，冥思苦想，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奋学习，苦练演技，以报答新疆观众对我的厚爱。

书迷朋友愈来愈多，虽是萍水相逢，但如同故旧。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的关怀和观众的真挚热情，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初觉得新疆真的很需要我。从此萌生了扎根边疆的念头。

每天学习工作，对于节假也就漫不经心。一日去商场，忽见月饼，方知临近中秋佳节，思乡之念涌向心头，此时忽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可能这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吧！另外在平还有我的职位，怎么说也不能一走了之，言而无信，我必须回去办完手续。领导给了我四十五天探亲假。回到家乡见到亲人，陈述以往，假期临近，又去在平办理辞职手续，恋恋不舍含泪辞别父老乡亲，回到乌鲁木齐。从此我真正扎根边疆，献身文化艺术事业。

观晴日防霈天未雨绸缪
拜书籍为师尊苦读寒窗

我开始边工作边学习。谁都知道文艺创作演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认为世界上有两个学校，一是有声，一是无声。大千世界处处都有老师，看两人吵架、聊天都能学到东西。我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小伙恶作剧，我写了一段山东快书《知错必改》，全国汇演得了大奖，全国播放；听聊天写了一段歌颂民族团结的快书《骨肉相连》，全国交流播放；看报纸得知火车南站有一河南籍的街道干部表面伪装积极，暗地容留淫娼，被抓获后，我采

访了干警，写了一段快书《智取夜来香》，演出效果奇佳……

数十年来，为演出创作，我什么都学，还和乞丐交朋友，这为我后来创作表演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演《大隋唐》期间电台请我全部录制播放，被我谢绝，我说我演半截您们播音，观众在家都能听，谁还来买票？他问我会别的吗？我告诉他我会《大八义》、《小八义》、《呼延庆打擂》、《岳飞传》、《左连成》、《杨家将》等，他说那就录《杨家将》，电台播到潘仁美害杨七郎，射了一百单三箭我唱成了一百单八箭，我自己不知道，在四个剧团开大会的时候，秦剧团搬布景的陈老先生，把我叫到一边，低声用亲切的陕西话说："你咋把杨七郎多射了五箭呢？"我听后心悦诚服，请他多给指点，他说："你是大演员、名角，我是杂工，能给你提意见吗？"我说："您是我一字之师，终生不忘。"散会后我请他吃饭，他给我讲了杨家将的好多故事，使我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后来才知道，他是有名的"活历史"，从此我把他当恩师尊待。在演出中说秦琼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孟尝君我知道，但专诸不知详情，如果引证就应该用得准确，我从来就是不懂决不装懂。第二天早晨政治学习完了，我恭敬地请教业务主任班先生，他不假思索地说："唉，爷们儿连这个也不懂啊，你这么大的腕还不懂吗？"我说："不开玩笑。""那我告诉你吧，专诸就是从砖里挖出个珠子来。"当时惹得哄堂大笑，我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常言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暗下决心学不明白决不罢休，要想博知多闻，非学古人孙敬悬梁

苏秦刺股的精神不可，为此下午演完《秦琼卖马当锏》一段，观众就要散场时，我喊了一声："观众朋友稍留片刻，哪一位知道专诸的故事，我拜您为师。"观众当时大惑不解，在猜疑中交头接耳地离开剧场，最后有位五十岁左右的瘦高个先生，后来知道是天山区建设科干部，常看我的演出，他问我说："您刚才说的专诸到底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非常同情而又表示敬佩，他说你这样一个青年人，血气方刚，可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当众求教，实属罕见，真是不耻下问。他把专诸的故事讲得很详细，以后又借给我一本《幼学琼林》。后来除工作学习外，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图书馆不方便，只好借书、买书，《辞海》、《辞源》、《实用大词典》、《学习小字典》，还有其他的书籍，特别是《辞海》之类的工具书在任何时候和场合都可以随时随地请教。

我自幼性格倔强，只要我认为是正当的事业，就义无反顾，坚持学习也是如此，从不蹉跎岁月。除本职工作外我没有嗜好，麻将、象棋、交谊舞也略知一二，也是为业务所用，但从不参与，饮酒、吸烟是"文革"中染的不良之习，我不愿群聚嬉戏，可以说洁身自好吧！

赴擂台再进北京遇恩师
为艺术天山南北尝艰辛

"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领导通知我准备节目参加全国汇演，最好是现代题材。我写了一段山东快书《新中国的花本兰》，内容是歌颂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郭俊卿

同志的，先市后区逐级审查，我单位共七个节目，我被选中。1958年8月我赴京，定在广和大剧院演出，当时安排节目的人告知我快书形式太多，你别的是否能唱？我说还会木板大鼓，他说太好了，还未有人报这种形式。当晚，借了鼓板，演出效果很好，也受到同行的称赞，那时也不评奖，更无金钱报酬，仿佛人们都不注重“名利”二字，汇演期间我见到高唐老乡恩师郭汝河和刘桐梧，还有北京的侯宝林，天津的马三立，总政文工团的快书演员高元钧等。这次汇演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中南海怀仁堂非常荣幸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

1959年5月1日，乌鲁木齐市曲艺团正式纳入国营事业单位，我享受干部待遇，原来演木板大鼓为主，现以山东快书为主，轻便易行，适合上山下乡。

新疆地域广阔，气候多变，这县到那县相距数百公里，下乡演出人在车上被颠簸得全身疼痛，下车后要马上装台，化妆演出，演完要争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喝的是涝坝水，若能吃上一次新鲜蔬菜算是美味佳肴。我经常下工厂、部队演出，最难忘的是去南疆慰问铁道工程兵，途中经后峡跨天山，汽车行走的是盘山曲线山腰狭路，往上看残石欲坠，往下看万丈深渊，有的演员吓得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下车后稍事休息，我去工地，亲眼看到一个个血气方刚、生龙活虎的解放军战士，脸上鳞皮片翘、嘴唇绽裂，手套和手指都被鲜血凝结在一起。我感到他们太辛苦了，当即现场表演。战士们住帐篷，几天见不到新鲜蔬菜，副食以罐头为主。

这天有战士告诉我晚上蔬菜就运到了，可是晚上听到了塌方的消息，政委和几个战士牺牲了，看到战士们脸上挂着泪花，我也流下眼泪，当晚写了一段快书《首长下工地》，唱给战士们听，他们感动得失声痛哭。

去魔鬼城（乌尔禾）为石油工人演出，我差点被风刮走，幸亏几个工人相救；去吐鲁番拍电视剧《聪明与糊涂之间》，电视台李庆平导演邀我演一位车间主任，路经乌吐公路百里风区，面包车的挡风玻璃全被打碎，同志们让我躺在车底板上，用电视机的铁箱挡住我的头部，免受风寒。

……

我扎根边疆已近五十年，为新疆曲艺文化事业走遍天山南北，尝尽苦辣酸甜，但我无怨无悔。

捧残卷心如刀绞
顾大局再接"冕冠"

多年来面对观众的张张笑脸，耳闻台下阵阵掌声，感到幸运，更激起奋发之力。曲艺演员大部分都是自编自演，表演、创作、词句、节奏都要革新，要跟时代。电台、电视、报刊杂志记者更是来去频繁，其中也有大学的负责人邀我去讲课。第一次，在新疆大学讲曲艺艺术始源、发展历程和说唱艺术，出乎意料地成功，同学们的笑声掌声不断，以后又有新疆老年大学、八一农学院（后改农业大学）请去讲课，还给挂上教授头衔。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教授张鸿懿慕名请我给他录了一段木板大鼓。随着众多的

教学活动，我自己也学了很多知识，更愿在社会活动中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少年宫建设、儿童福利基金会、老山前线、希望工程等我都给予捐赠。我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告诫自己台上认真演出，台下清白做人。但“文革”期间说我是“三名三高”，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说我多年演出都是歌颂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破“四旧”的红卫兵将我书架上的书稿、保留的报刊杂志、大小词典，包括纸稿、剧照扔到庭院付之一炬，我扫纸灰时在最下边见有半本未烧完的传统小说《大红袍》，我拿到手里呆若木鸡。我几十年的劳动结晶全部付之东流，那些日子我就象失魂落魄的含冤之人。我想不通，我从内地支边到新疆，兢兢业业地工作，台上从来没有误场、忘词，道德上玉洁冰清，经济上不欠分文，社会上没有狐朋狗友，政治上我从小加入儿童团，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加入中国共产党，哪一点错了？

赴京城群英聚会
逾花甲卸任归园

“文革”结束后，我又被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1979年11月16日在北京又一次荣幸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且结识了很多新朋友。随着乌鲁木齐日新月异的建设，交通和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内地的一些著名演员和新疆文艺界也开始了频繁地交流。1980年在西安市举办了五省曲艺交流汇演，我和新疆曲艺团六位演员赴秦演出，我演唱的快书《鲁达除霸》倍受欢迎。

数十年的创作单段百余，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作品及电台、电视录制播放的包括长篇传统评书等，其数难以详计。出版了自己编写的长篇小说《五女传奇》，《大宋少年英雄谱》即将出版，特别是在《新疆日报》发表的《孙悟空和阿凡提遨游一九八五年》被众多报刊转载。

我唱了多年忠臣良将，我不敢比古人，我可以学古人，我送子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如此。当时没有我儿子参战的名字，我向他部队首长要求最好换下别人的独生子。我对儿子说，爸歌颂了一辈子为国捐躯的英雄，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咱不去叫谁去，不但你去，我也要亲赴前线，为指战员演唱。后来我作为参战军属代表和拥军模范，又是慰问团领衔主演，身兼三职奔赴老山前线。我坚决要求到前沿阵地演出，理由是不带乐队轻便易行，既能用评书单段、单口相声，也可唱快书等。首长说："您已年过半百，是老艺术家、军属代表，腿又不太方便，再加上地雷遍布全山，十分危险，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最后答应我可在战壕对着前沿电话听筒给指战员演唱。因为山陡路滑，加上阴雨连绵，我摔伤了腿。我在前线还和儿子欣喜会面，他荣立战功，火线入党，战地和后方电台、电视、报刊杂志都作了大量的宣传。离滇返新，自治区民政厅给我发了残疾证。我应邀到部队、厂矿、学校作报告，在市领导陪同下去有关单位作前线见闻的汇报，还播放了前线录音、录像，受到乌鲁木齐市各界群众的欢迎。

作为一名扎根边疆的曲艺演出和作家，我为国为民

做了点应该做的事，可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先后被选为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德艺双馨艺术家、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拥军模范、参战军属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获从艺五十周年的中国曲协的荣誉证书，并担任电视台艺术顾问、新疆曲艺研究会会长、自治区戏曲协会常务理事、乌鲁木齐市戏曲协会主席、新疆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校友会艺术部高级顾问，被选进1980年《中国艺术辞典》第一册、《中国专家名人辞典》。这些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我年已七旬，每天清晨学习两小时，照旧为青年人排节目、讲身法、说唱腔，忙忙碌碌，另外挤时间看新闻，刻篆章，作根雕，修剪盆景……如今我的六个子女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做贡献。我和建国初期支边的老同志一样，为建设祖国边疆，献了青春献子孙。

上述五十余年，路径坎坷，而又平坦，吃尽苦辣，也有酸甜。树高万丈生于根，水流千遭出子源，永思高唐生育的根源。祝家乡高唐县经济繁荣，全面小康早至，愿父老乡亲们洪福齐天。

附：

思　故　乡

刘爱华

逝川依稀如梦幻
素怀佳节念故园

星转风驰更童岁
斗移电掣易耆年
常勉为国竭殚力
自愧党恩难报全
承蒙高唐县文史
促膝倾吐肺腑言

2003年于乌鲁木齐

求学之路与教学生涯

韩民忠

我1937年4月生于高唐县梁村镇韩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妹五个，我是老大，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我父亲是只上过两年小学、大字认不了一箩筐的农民，除种地外，还要给人家打劈柴、轧棉花来维持一家生计。父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我上学后，他一再告诫我要好好念书，说无论家里吃多大苦，作多大难，也要供我上学。我在本村读完初级小学，后在离家五华里的范庄上高小。期间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都是肩扛一袋玉米面，手提一兜咸菜作为一周的伙食，如果偶尔能带上几个咸鸡蛋，那就像过年一样了。正因为家境贫寒，深知父母之不易，所以我学习相当刻苦，再加上脑子较好使，有点所谓小聪明，因此学习成绩一直不错。1949年全县高小会考，我得了全县第一名。为此，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了校长杨立先的表彰和奖励。1950年我考入全县首屈一指的高唐中学。该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很高，在三年的学习中我更加刻苦，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1953年7月我顺利考入聊城一中高中部就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名闻遐迩的运河中学，因其校址跨运河两岸而得名。各学科师资人才济济，教学设备和办学条件在当时的全专区名列前茅。我能在这样的

环境中学习实属难得。但是随着学习阶梯的一步步高升,学习费用也急剧攀升,这就为本来已很贫困的家庭造成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全家人省吃俭用,父亲东借西取,想方设法不让我辍学。在学校我十分节俭,从不浪费一角一分。聊城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路之遥,每次放假回家和返校我都是步行,宁肯脚上打泡也舍不得花钱坐车,说实在话,也没有钱坐车。回到家,顾不得休息就帮父母干活:锄地、割草、砍柴、收庄稼、摘棉花、挑水、积肥等什么活都干。因此,我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的含义理解得十分深刻。

195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成为解放后我村第一名大学生。乡里院里和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父母亲更是喜不自禁,因为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也为他们增了光。

我为什么要报考俄语系呢?说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苏关系极为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中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就需要大批通晓俄语的翻译人才。我在初中一、二年级本来学的是英语,但到了初三年级,上级一声令下,一律改学俄语,到了高中自然还是学俄语;二是因为我的祖父。我祖父兄弟七人,他行五。据说父亲年幼时,家中日子很拮据,祖父就只身闯了关东,后来又由东北去了苏联。旧中国战乱频仍,祖父长期滞留国外,音信全无。后来得知他在苏联又与一位俄罗斯姑

娘结了婚,并育有三男四女。1951 年我祖父回到家乡,住了一年又返回苏联。我想学好俄语可以成为沟通中外两家人的桥梁和纽带。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学习外语的最高学府,俄语系的专业课也多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苏联教师执教。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直至毕业,我还学了第二外国语——英语。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有不少人是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业务尖子和教授。在大学期间,我一直享受人民助学金,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异。

1960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但遗憾的是,此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建合同,撤走专家。这样,我要当俄语翻译的梦想就破灭了;并因中苏交恶,我也不敢与远在苏联的亲人联系,唯恐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后来又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更不敢联系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成为连接中外两家的桥梁,我祖父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毕业分配时我当了教师,文化大革命前教俄语,"文革"结束后教英语。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高中外语教学工作,做高三把关教师。由于会英、俄两门外国语,且功底深厚,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治学态度严谨,教学方法灵活,效果显著,担任北京市第 39 中学外语教研组长达 25 年之久。这期间学校多次动员我当教导主任,我怕荒废业务,没有答应,学校同意了我的意见。1997 年退休后又被返聘两年仍任教研组长。先后多次被评为学校和北京西城区教育系统及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我领导的外语教研组多次被评为校区先进集体。1987 年我被评为北

京市首批高级英语教师之一，后又被评为西城区首批英语学科带头人之一。多年来，一直担任西城区教研中心英语教研员、英语学会理事、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北京中学生英语报》编辑等职。受区教育局和教研中心的委派，多次赴上海、南京和苏州等地进行外语教学调研，赴加拿大进行英语教学考察。多次为西城区和北京市其他区、县英语教师举办讲座；为北京师范大学及民盟北京市委举办的外地教师培训班授课；多年应聘为北京电大西城分校英语班学员授课；曾在中央教育电视台为高考学生举办英语答疑课，并应邀赴山东临沂、内蒙呼和浩特等老少边穷地区讲学。

主要著作有：

《高考英语总复习指导书》，由北京西城区教研中心主持编写，本人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由中国书店发行，十几年连续修订发行历久不衰。

《能力·训练·提高英语系列丛书》，与陈平兴等老师共同编著。1992～1995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发行。

《最新高考复习应试指南丛书(英语)》，与沈信予老师等合著。1993 年～1996 年由北京师大出版社连续出版发行。

《高中英语题库》，本人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97 年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 年科利华高考英语冲刺试题(3＋X 专用)》，本人任编委和撰稿人之一。由现代出版社出版，2002 年再

版。

2002年6月应清华同方英语教学部聘请，与李俊和、胡国燕等老师一起录制了高考英语教学光盘。

1993～1999年先后在《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国教育电视报》、《北京中学生英语报》、《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等报刊上发表《英语动词的时态》、《怎样用好非谓语动词》、《词汇辨析与练习》、《英语疑难解析》、《主谓一致专项训练》、《NMET综合训练》、《完形填空做题思路》等学术性和知识性文章数十篇。

1997年退休后，即被破格聘请为西城区教研中心英语教研员和西城区高三英语学科命题组成员，负责全区高三期末英语统一考试和高考前的两次英语模拟考试的命题工作，并应聘在享有"清华大学预科"之盛誉的北京四中培训中心、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培训中心和北京35中志成培训中心等市、区重点学校任教，继续发挥余热至今。我感到退休后的生活十分充实而丰富，实际上是退而未休，甚至更加忙碌。除上课外，我还利用假期进行旅游，不仅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还去国外旅游。

我在参观游览国外的名胜古迹，领略他们的风俗文化的同时，还亲眼看到了国外发达的科学和技术，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风景如画、优美洁净的环境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快速发展，急起直追。而首要的是发展教育，提高科技，这更增强了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虽年逾六旬，但精力充沛，仍能为

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从教四十三年来已是桃李满天下，我教过的很多学生学有所成，已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业务骨干，为国家建设已经做出并继续做出巨大贡献，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幸福！

2003 年 4 月 6 日于北京

我的新闻人生感悟

杨风山

今年六月，我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五岁生日。

踏在这个中年、老年的分界线上，在特殊的时刻，回顾自己无悔的新闻人生，感到十分欣慰。参加工作至今，整整三十八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我在各个工作阶段都较好地完成了组织分配给的任务，获得了不少荣誉，新闻作品获得新华社一、二、三等几十个奖项。几十年来我写下了大大小小近两千篇新闻作品，从“豆腐块”、“火柴盒”大小到整版整版的稿件都尝试过，有许多作品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还有十多篇作品有幸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和人民，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一

我出生在高唐县城南姜店乡大杨庄村。从小记得家乡有一句老话“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话深深刻在我的心灵上，永志不忘。几十年来，我一直用“奋斗，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座右铭鞭策自己去争一口气。六十五年的人生感悟，可以概括为“奋斗”两个字。

我 1957 年在高唐一中初中毕业，1960 年聊城一中高中毕业。

1965年8月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后进新华社通讯社山东分社，1975年我作为山东分社的记者代表出席了新华社的国内工作会议，不久，被任命为分社工业采访组副组长；1986年，受过中央党校培训的我被任命为沿海开放城市支社——新华社青岛支社的社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被调回新华社山东分社任副社长，分管宣传报道工作，先后被评聘为新华社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

我从一个鲁西北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国家通讯社地方分社的领导干部，家乡高唐给我的那种“敢与命运搏斗”的性格起了重大作用。

我的奋斗之路是漫长的，但步伐也是坚实的。我的成长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十年上路，二是十年突破，三是创新和提高，四是走向成熟。

十年上路由两年见习、三年闯关和五年在战役报道中提高三部曲组成。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明确了采访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能独立完成各种报道任务了，并写出了《党的好女儿——毕英兰》、《小钢联有无限生命力》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十年突破是1976年到1985年。我曾以“前十年怎么看，后十年怎么干”为中心进行了思考，立志上路之后，奋发有为地大干“第二个十年”，在业务上来一个突破。1976年前我没有搞过多少报道。“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工作热情迸发出来，仅1977年就写了30余篇稿件，有20篇上

了《人民日报》。

1978年,我参加了新华社总社举办的第一期国内记者训练班,使自己在新闻理论上得到一次系统的武装。在这期间制定了"苦战一千天"的计划,1981、1982年又各搞了"苦战300天"计划。1983年初,记者职称评定后,自己寻找差距,从1983年4月5日起又搞了第二个苦战1000天计划,这一计划于1985年底完成。

十年突破的目标之一是专题调查。通过调查,提高透视生活、解剖生活的能力,实践的结果比较理想。先后写了《陶庄煤矿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成绩显著,两年半完成利润四百五十多万元》(1977年)、《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陶庄煤矿努力增加社会主义积累》(1977年)、《科学家谈科学吃饭》、《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调查》(之一到之四)、《山东省工交系统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调查》、《山东省工交部门实行超定额计件工资制的调查》、《人民城市人民建——潍坊市城市建设调查》(1983年)、《有了灵丹药,不丢金钥匙——西河煤矿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调查》等十几组调查。

这些调查范围相当宽广,调查的主题有集体所有制、工业经济责任制、工资改革、城市建设、城市污染、政治思想工作、党员教育、海洋渔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教育改革、开放城市、短期行为。可以说,十年调查使我的业务能力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飞跃,有了质的提高。期间,有四个新华社一等好稿、八个二等好稿,大都是从专题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还产生了二十多篇三等好稿。

十年突破的目标之二是写一批人物。这些人物通讯约有三、四十篇，总字数约几十万字，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有印象的历史人物。我除了采写各条战线的人物通讯外，还写了一些先进群体。人物通讯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的有：1969 年 7 月写的《党的好女儿——毕英兰》，被编进几个报告文学集，一度收进中学课本，有两家出版社根据通讯改编了同名连环画；1973 年 8 月 10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到爸爸战斗过的地方安家落户》，也已编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雏鹰展翅》一书；1977 年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28 年出满勤的好矿工——刘祥童》，是新闻报道上较早出现的反映以实际行动与“四人帮”斗争的先进典型之一，表现上也有独到之处，此稿被收进《大众日报》新闻研究所编印的《通讯选》；《红旗队的模范带头人——陈孝顺》于 1978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同一天新华社播发，是五届人大期间发的分量较重的通讯之一，报道讴歌了优秀工人“煤炭上不去，永远不退伍”的雄心；此外，写了一些企业家，如《升平岁月胆剑篇》、《临时工做经理》等，热情讴歌了我们这个英雄辈出时代的先进人物以及他们献身四化事业的崇高精神境界。

十年突破的目标之三是新闻理论的系统补课，写出了一批体会文章和业务论文。在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上先后发表了一些业务文章：如《痛苦和幸福交织的回忆》、《把工夫用在采访上》、《潍坊蹲点八十天》、《伸出新闻记者的触角》。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和提高阶段，主要指 1986 年到 1991 年底在青岛支社任社长期间。当支社社长，工作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承担了征地兴建支社和记者之家的工作，又当领导、又当记者。这五、六年，每年发稿数量不少，调查报告、人物通讯，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东西，如：1986 年的《青岛市沧口、四方区污染严重》、《党员带头，致富不愁——莱西县对农村党员进行先锋模范作用教育的调查》、《既要竞争，又要联合——胶东半岛两个开放城市的调查》、1987 年的《即墨县医疗卫生改革的调查》、1988 年的《即墨县创造了计划生育的管理模式——计划生育调查》、1989 年的《平度县教育改革调查》、《山东省集资兴教调查》、《短期行为透视》都是较好的稿件。

1989 年写的《中南海与黄岛》，1990 年写的《喜讯捎给中南海》两篇反映黄岛火灾及灾后一年变化的姊妹篇均被《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同时刊用，被多家报纸转载，这两篇报道分别通过上下联系，反映了中央领导与灾区群众的血肉联系，反映了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我在青岛任支社社长期间，支社多次被青岛市评为先进集体，新华社总社《前进报》发表通讯，介绍支社的先进事迹。

第四阶段是走向成熟阶段，主要是指 1991 年任山东分社副社长以来的十来年。我任分社业务副社长这一阶段，是分社宣传报道搞得红红火火的几年，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和先进单位，像孔繁森、王廷江、朱彦夫、济南交警、济南工商银行等等。1997 年在新华社全国工

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

这期间，我还受分社委托创办了一张《外向经济导报》，出任第一任总编辑，出了80余期，为分社留下了一点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还兼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山东联络站站长，把山东的电讯发行搞到相当规模。这件事一直持续到2002年末，干了十年。

1991年出版了32万字的个人新闻作品选《齐鲁风采》，由新华社社长穆青题写书名，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题写序言；1998年，出版了另一本九十年代的作品选《中天集》，50万字。1995年和2001年分别出版了与人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孔繁森》和《朱彦夫》，这两本书对宣传孔繁森、朱彦夫两位英雄人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特别是报告文学《孔繁森》一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发行几十万册。这期间，我还主编了《山东新闻人物》一、二、三集，共约70万字。近几年又主编了《崛起的山东乡镇》、《新世纪名牌战略巡礼》等大型画册，约30万字，也受到欢迎。

二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章容易写，难得御笔批”，那是说的旧社会。作为在地方分社跑基层的记者，写的东西得到上层领导的重视也不容易。我的这些调查中，有七组得到李鹏、王震、李先念、胡耀邦、薄一波、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对实际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1977年，我通过调查采写了《陶庄煤矿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成绩显著，两年半完成利润四百五十多万元》的内

参,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当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陶庄煤矿努力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为题发了消息,并加了编者按,宣传了积累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杠杆这一马列主义原理,回击了"四人帮"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歪曲,为解决亏损问题提供了经验。

《人民城市人民建——潍坊市城市建设调查》刊出后,胡耀邦看后立即找城建部谈,要发动群众解决城市建设问题。此后,该稿于1983年2月16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刊载,在头版头条以《潍坊城市展雄姿》为题发了介绍这一经验的花边消息,并配发了《依靠群众自己动手谋福利》的社论。社论把"人民城市人民建"提到了指导思想的高度,城乡建设环境部部长李锡铭发表谈话,肯定了潍坊市建设的经验。

《青岛市沧口、四方区污染严重》稿件发出后,李鹏副总理作了批示。青岛市台东区人大常委会来信说:"深感你们为青岛市百万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说出了受污染之害群众的心里话"。该调查形象具体地反映了污染的情况,分析了污染的原因,还提供了一些治理"三废"取得效果的典型经验,评为二等好稿。青岛市也将该稿评为好稿,并在《青岛日报》发消息称赞这一稿件。

《党员带头,致富不愁——莱西县委对农村党员进行先锋模范作用教育的调查》发前,薄一波作了批示。稿子发出后,全国几十家报纸均在重要位置刊登,各县都讨论莱西县委的做法,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加强党员教育,全

国各基层党支部都学习这篇通讯，在整党中解决如何发挥模范作用，敢富会富，带领群众共同富。

《即墨县医疗卫生改革调查》内参发表后，当时的总书记作了批示："即墨的经验值得重视"。此稿被卫生部评为当年中国卫生十大新闻之一。

平度教育改革系列调查《平度的高度》、《八方抬教》、《造血比输血见效快》、《困惑后的选择》四篇调查报告得到李铁映的批示。

三

回顾我的新闻实践，体会颇多，扼要讲三条。

一是坚持深入地调查研究，可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当记者，这碗饭是很难吃的。开始也有过旗开得胜的喜悦，但接着就是连连的失败，所谓"常见记者下面跑，不见稿子报上登"。当时，我没有气馁，靠着农民儿子的一股犟劲，我开始了十年上路的拼搏，我在贫困的鲁西北农村长大，力气有的是，又不怕苦，就不断地向农村跑，向基层跑，向城市工厂跑，泡在下面。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跟上了队伍前进的步伐。十年之后的1976年，我已是能独当一面的记者了，使我跨过这道坎的是调查研究。新华社有一批坚持调查研究的名记者，我十分羡慕他们，以他们为师，深入基层，作专题调查，终于写出了许多像样的调查报告，那篇《人民城市人民建》可算是这一系列调查成果的代表作。这些年来，我反复回味那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名句，我认为，要学新闻，不少功夫也在新闻之外，那就是解剖麻雀、透视

生活、研究社会，靠了这些，我摆脱了写稿匠的巢穴，努力挑起记者的社会责任的担子。

二是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新闻生涯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点。在“文革”时期，有不少问题自己解释不了，我就转向了哲学。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为一件自己参与的事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反思起来，议论来议论去，找不出正确答案，于是我们带上《矛盾论》，多少遍地钻，企图从哲学上解决问题。由此，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就锲而不舍地钻研起哲学来。我手抄了毛主席的哲学语录，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剪成资料卡片、带在身边，有工夫就读，还一边学哲学著作，一边用哲学著作分析文学作品，分析解剖《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研究他们的矛盾，研究矛盾的转化，把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当成学哲学用哲学的材料。分析一段文学作品描写的社会生活之后，再分析现实生活的矛盾，终于悟出了一点东西。读了《矛盾论》之后我又通读了《毛选》(四卷)、《列选》(四卷)、《马恩》(四卷)。后来又读了《邓小平文选》等等。我特别喜欢列宁的《哲学笔记》，读了不知多少遍，这部列宁未完成的著作，使我受益终生。后来，又读《资本论》，在一个酷暑里，每天晚上我光着膀子读书，汗流浃背，就用毛巾擦一把再读，三卷本几千页的《资本论》读了好几遍。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列主义哲学，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刚恢复奖金那一年，年终我得了七八十元奖金，全部

拿来买了整套的《列宁全集》，以后遇到问题就到原著中查找。应该说，我的知识面不甚宽，但啃马列原著的劲，钻研的深度，却又超出常人。

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使我这个原本对新闻事业信心不足的人，信心十足起来，读了马列著作常有“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感觉。

三是探索新闻的内在规律和表现艺术。这是回顾到新华社初期自己知识中的薄弱环节意识到的。1978 年新闻记者培训班使我得到一次自我认识与提高的机会，也增强了把握新闻写作规律的迫切感，在中央党校新闻班里及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认真阅读了国内外几十本新闻理论著作，精读了一些新闻名著，读了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这“江心补漏”的工作，使我的新闻之舟，再鼓风帆，破浪前进。

退休后，我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新华社山东分社领导让我编写山东分社社史，我欣然接受。这个阶段性的工作结束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2003.7.16 于济南

军医范启申简介

文史科　整理

范启申，1939年10月生于高唐县琉寺镇大范村，1960年考入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入伍分配到山东省潍坊市第89医院骨科工作，历任军医、主治军医、主任医师、副主任、主任。1978年骨科晋升为全军创伤骨科中心，现任全军创伤骨科中心主任、主治医师、第四军医大学及潍坊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系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军区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中国肢体残疾康复委员会常委、全军肢体残疾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手外科专业组委员、军区创伤与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实用手外科杂志》、《中国上肢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常委编委，《中华手外科杂志》、《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中华临床医学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美国中华骨科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人民军医杂志》、《实用医学杂志》编委，文职将军，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他主要从事创伤骨科、手外科、显微外科的临床研究，在周围神经损伤再生、骨骼与软骨缺损修复与再生、断指(肢)再植血液动力学与再灌注伤及高血凝状态、骨坏死机理与最佳治疗方法、四肢长骨裸露骨坏死及骨感染的治疗、血管吻合方法与再通因素、吻合血管组织移植

成功关键因素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尤其在四肢大面积软组织或复合组织缺损修复与重建、断指(肢)再植、拇手指再造、下肢长管骨长段骨缺损修复、严重下肢创伤后复合组织缺损修复与重建系列研究、难治骨不连及股骨头坏死治疗、周围神经缺损修复、感觉神经重建等方面具有创造性成果，有较深的造诣。开展新业务及新技术250项，小儿双断臂再植成功、双手9指11段断离再植成功为世界第一例，双手10指10段断离再植成功为世界第2例，吻合血管70厘米长的肩胛侧胸联合皮瓣为文献报道最长的皮瓣，吻合血管骨膜瓣与筋膜瓣联合移植治疗难治骨折不连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胸脐皮瓣解剖研究与临床应用、吻合腓动静脉的腓肠神经移植解剖研究和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骨膜下组合双段(侧)腓骨移植修复下肢长骨长段缺损生物力学研究与临床应用、带血运髂骨瓣与血管束联合移植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解剖研究与临床应用、含血运雪旺氏细胞外膜管矫接神经缺损实验与临床应用、神经端侧缝合与再生神经纤维HRP逆行追踪神经元胞体实验研究及临床应用、神经端侧缝合与神经移植和神经转位缝合对比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小腿平行位对侧胫后血管桥接皮(肌)瓣覆盖胫骨大面积裸露等为国内首先应用。

自他任创伤骨科中心主任以来，将创伤骨科中心床位由45张发展成目前的327张，骨科按专业分上肢创伤、下肢创伤、骨病、脊柱、关节、康复6个治疗与护理单元，病人来自全国各地，且数量较多，骨科年手术量5000例。

显微外科技术是骨科的主要治疗手段，各个医师均能进行断指再植、血管神经修复，重点对吻合血管皮(肌)瓣、足趾、骨骼、关节等组织移植修复与重建进行了系统研究，至目前已做各类显微外科手术13250例，其病例数、技术及成功率均达世界先进水平。骨科现有高级专业职务技术人员17名，硕士及博士生28名，配有当代最先进的显微外科手术设备及器械，骨科设置专门的显微外科研究室、动物实验室、组织病理室、生物力学研究室、骨库与解剖研究室、支具与假肢研究室、康复功能恢复室、医学资料室，为骨科中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与设备条件。

在他的主持下，骨科中心举办了全国显微外科学习班16期，介绍与推广显微外科解剖理论与应用技术，培养进修生、学员1046名，这些学员多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成为地区或全国有名的专家，为全国显微外科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已培养硕士生6名，参与并获得科技成果奖64项，其中国家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3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曾先后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1992年获军区中青年拔尖人才二等奖，1994年获军区中青年拔尖人才一等奖，1996年获“八五”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2000年获“九五”全军重大医疗成果奖，2001年获军区“九五”医学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和专业技术突出贡献奖。1999、2001年曾两次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主编《现代骨科显微手术学》、《现代手外科显微手术学》、《实用显微外科手

册》,与人合编《现代肢体残疾外科治疗学》等书刊16部。发表学术论文224篇,全国及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列入论文汇编250篇。已入《中国当代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中国名医列传》、《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中国当代医学界名人录》、《中国大文化英才辞典》、《中国当代成果大典》、《中国特色名医大辞典》等名典。

他为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做出了贡献。2000年在他的协助下,家乡高唐县医院率先在鲁西北乃至与山东交界的河北地区组建了科技含量高和有一定规模的骨显微外科,并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经他联系,县医院显微外科的5名医护人员先后去89医院骨科进行了深造。期间,他对去进修的家乡人在业务上给予指导、生活上给予关心照顾。每次回高唐他都亲自上手术台,为病人手术的同时为医护人员详细讲解,受到家乡医务界同行的好评。

李振泉自传

我于1940年7月出生在高唐县梁村镇，1963年考入山东海洋学院，1967年毕业后，只身来到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省。从此伴随着山西渔业发展的步伐，用所学的知识和智慧为山西的渔业生产服务。

那时，山西的鱼苗一直靠从南方调运，不仅成本高，而且成活率低，为改变这种靠外调的生产局面，我废寝忘食地工作，查阅资料，勘察设计。在我的组织带领下，1969年在忻州建成一座新型的渔种场，并培养了一批养鱼技术骨干，先后成功地进行了四大家鱼和鲤鱼的人工孵化，从而结束了山西北部地区鱼苗靠外调的历史，填补了山西北部地区鱼苗人工孵化的一个空白。

我长期在基层从事渔业生产和水产科技工作，1981年调到省水利厅后，还经常和同事们跋山涉水下基层，跑遍了全省各大中型水库、湖泊，进行取样、化验、分析，出色地完成了《山西省渔业区划》项目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研究报告多次在全国水产刊物上发表，区划成果获得了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个人也被农业部授予区划先进工作者。

1983年，我担任了水产处处长和党支部书记职务。上任伊始，迎接我的现实是，全省成鱼产量徘徊在1000吨左右。面对这些问题，我跑遍了全省渔业生产重点县、

场、库、村、户，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了解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科学分析，大胆地提出了“一手抓池塘，一手抓水库，以养殖为主，全面综合发展”的指导思想。带领水产处一班人，通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为山西水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成就：

建成黄河滩万亩连片商品鱼基地，被评为山西省水利明星工程；

内引外联，建造了年产5000吨的鱼饲料厂两座，家鱼早繁场一座，改造了现有国有渔种场，使年产量和效益连年翻番；

组建了省水产研究所、省水产技术推广站和省水产开发服务公司，并新建了太原、运城等六个地市级水产技术推广站；

完成了二十多项科研推广项目，引进十余个新品种和新技术，多次获得农业部和省“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科技进步奖；

引进了世界银行第四批日元贷款等外资项目，主持参加了中日专家组的开发调查，提交出完善的项目报告；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农业部和美国大豆协会合作，引进小网箱养鱼新技术，为大水面开发提供了新途径。

……

2000年我退休了。回顾几十年的人生路，最难忘的还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高唐。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读完大学，全凭国家助学金的支撑，我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

高级工程师和部门负责人，主要是靠党的多年培养教育，靠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提供的机遇，个人的努力只能在此基础和前提下发挥作用。如果要对个人做点总结的话，我感到以下三条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

一、工作高效率。我在山东海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自然条件较差的穷省，并且是离省城较远的山区小渔场。在不靠海的山西发展水产业本来就没有基础，再到这样的小渔场，对于我本人来说，今后就很难有什么前途了。经过短暂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最终留了下来。一干就是八年，到1975年终于把该场发展成晋北最大的国营渔种场，并且在鱼苗繁殖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多次受到省地两级领导的表彰，1975年还在这里召开了全省渔业经验交流现场会。期间，我入了党，被提拔为副场长，1976年被调到地区水利局任水产站站长。八十年代初，我又被调到省水产资源调查队工作。在这里，我边学习边研究，完成了一批获奖科研项目，业务水平、工作能力明显提高。1983年我被任命为水利厅水产处长兼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期间，我除抓好行政和渔业科研工作，还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十多项渔业科研及推广项目，其中五项获省部级奖，还主持制定了山西省第七至十个渔业五年计划。

二、思想上严要求。投身社会工作至今几十年，我一直提醒自己任何情况下都要注重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改造主观世界，思想上不要落伍。记得刚走出校门时想入非非，感到与现实生活差距太大了，正是靠了学习毛主

席著作才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逐渐和工农群众拉近了距离，打成了一片。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只是干了我应该干的，党和群众却给了我很多荣誉，为此，我感到受之有愧。

三、学习不放松。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的内容随工作任务的要求更加具体实在。学专业，学政治，学做人，边干边学，用什么学什么。几十年来，我始终抓住各种在职学习的机会，也尝到了学习的甜头。特别是我利用了到美国、日本大学研修中心受训的机会，学习小网箱养鱼和滩涂渔业开发。通过多年的实践，我积累了几十本近百万字的学习笔记。

退休三年来，我又在老年大学找到了学习乐趣。学书法、保健、烹饪、电脑，同时还为水产专业的成人大专班兼授渔业技术经济课。虽然忙点，但很充实。真是学海无涯乐融融，老年大学伴我步人新征程。

2003 年 9 月于太原

国防科研一兵

朱明华

一

退休后，时间多了，时常静坐下来对自己走过的路过过电影。一纸家乡的征文，把我“拉”回到童年，让我的心回到了离别五十多年的家乡。少儿时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仿佛就在昨天。

1950年我父亲朱九武把我从老家杨官屯西朱庄接到四川重庆，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在此之前，我在朱庄生活，上小学；到地里割草喂牛；到村边的杨树林子里捡树叶、拾柴禾；和同龄的伙伴到豆稞地里逮蝈蝈；夏天趁大人们睡午觉的工夫下到村中间的大湾里打澎澎（即狗刨式游泳）、捉鱼摸虾；一块儿弹琉璃球……每逢过年，家乡的小孩子们都穿新衣服，放鞭炮。朱庄的人们生活虽不算富裕，还能过得去。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倒也平静、安宁。以后我渐渐地长大了，断断续续地从父辈和老人们的口中知道，朱庄这个不足二百户的鲁西北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受过数次战斗的洗礼，有着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经常遭受祖长德、陈耀泰、王长山、陈振兰、杜文灵、陈胜堂、云茂才、曲捷清等土匪杂团的骚扰侵犯，不是要粮筹款，就是要枪要牲口。为此，朱庄人与

这些土匪杂团进行了斗争，因而也就结下了冤仇。陈耀泰曾放出风声“不踏平朱庄誓不为人！”终有一天，日寇山口部队一个中队的日军同陈耀泰、王长山、曲捷清等伪杂配备山炮和轻重机枪、骑兵一齐向朱庄发起猛攻，烧杀抢掠。在这次战斗中，朱庄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同敌人展开斗争。朱庄有四十余人战死或被日寇俘虏后用刺刀捅死，还有数十人受伤，我的祖父就在这次激战中被日寇杀害，身首异处。当时，朱庄几乎是家家戴孝，其状惨不忍睹。幸存下来的父老兄弟姊妹全部逃离朱庄，隐姓埋名，不敢说是朱庄人，转年才陆陆续续返回朱庄。我的父亲朱九武（见《高唐文史资料》第四辑《当年鏖战急》一文）和村里的一部分青壮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无奈于1938年5月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干革命求解放的道路。我就是在这贫困加战乱的岁月里来到世上的，时为1941年的农历腊月十九日。我是朱庄人但不是朱庄生人。我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为了躲避日寇和伪军、土匪，我们全家东躲西藏，在途中我降生在一个农家的磨房里。直到高唐解放，我们才回到朱庄。父亲参加八路军后，先是在鲁西北地区，后来随部队转战到山西、西北，最后进军西南到了四川重庆。四川解放后，父亲把我从老家接到重庆上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打那以后，我就和部队、军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上学还是在家里碰到的见到的都是解放军的叔叔和阿姨们，就连我的家庭出身填的也是“革命军人”。我每天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起床、吃饭、上学、睡觉。父亲在工作

之余，也时常讲讲战争年代的经历，但讲得多的还是李叔叔在某某战斗中如何如何勇敢，张叔叔是在哪次战斗中负的伤，孙叔叔如何指挥部队打下了某某城镇。在我还不太懂事的年龄，就对他们无比的崇敬。上中学了，父亲对我讲，过去是打仗，我们这些大人都没有进过学堂，没有什么文化。现在不一样了，解放了，国家要搞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和人才，所以，你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知识，长大后为国家建设出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当时，虽然对父亲的话不完全理解，但是心想，父亲既然这么说，肯定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上中学、大学乃至参加工作后，不论是学什么、干什么我都是认真努力地，争取做得最好。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我长大后”。当时，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画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可见，解放军在我心中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1960年，我高中毕业，在临近高考的前几天，学校突然告诉我，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这个学校地处西安。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我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过上了真正的部队生活，心中的激动和兴奋难以言表。穿着绿军装，唱着嘹亮的八一军歌，行进在整齐的队列里，一种军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一年后，由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决裂，大批在校的苏联专家撤离，我校的许多专业和课程被迫进行调整，有的只好中断，我由无线电系转入物理系。正是由于这次专业调整改变了我毕业后的专业方向和工

作岗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在大学的五年里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学员。1964 年 2 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我感到自己在一步步地向着父辈们的行列靠近。

1965 年 7 月，我结束了五年的军校生活，被分配到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第八三五八研究所。七机部的前身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部队性质的科研单位，保密性极强。从此，我成了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名战士，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

进入七机部领导就对我们说："进了七机部，死在八宝山"。意思是进了七机部就别想出去了，干一辈子。还真是的，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到 2002 年退休长达三十七年我没有离开七机部一步，只是由于发展的需要，1970 年我们单位从北京迁到天津，七机部几经更名如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这也是我引以为豪之处，因为我能成为我国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在我国的航天领域里，为我国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献身出力。回想起来，还算没有辜负父辈们对我的期望。

二

分到七机部后，除参加了近一年的农村"四清"工作和"文革"期间两年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外，我都在直接从事国防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特种功能材料和组件。所做的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CZ—IS 红外线材料研制成功。这种材料是我所研

制 H—Ⅱ武器系统所必需之材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承担了研制该材料的任务，担任工程组长和课题组长。研制这种材料需要一套专用设备，国内没有，在当时的形势下更不可能从国外进口，只能参考国内相近设备，自己设计，自己加工制造。在设计阶段，累病了，我就躺在床上进行构思，绘制草图，然后由课题组其他人员绘制成正式机加图纸。就这样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设计图纸200多张，终于将设备设计出来，投入了加工。在多次工艺实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最佳工艺方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将这种材料研制成功。经国防工办鉴定认为我们“研制的 CZ—IS 材料的性能为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完全满足了 H—Ⅱ的使用要求”，获得国防工办颁发的工艺进步二等奖。

2.HQ—2 材料研制成功。该材料是我所研制某型号武器急需之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接受了该材料的研制任务，担任该课题组长。从筹建设备开始到进行工艺实验，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关键工艺，历时近三年时间，研制出了“国内先进水平，性能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材料，经航天工业部鉴定后，获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3.DH—4 武器系统元组件任务的完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所承担了军委下达的某武器系统的研制。我领导的工程组承担了该系统中核心部分 DH—6 组件的研制。该组件在系统中负责对目标的识别、跟踪、搜索，直至命中。其制作过程较复杂，精度要求很高，前后要经

过二十多道工艺过程。在时间紧、人员少的情况下，加班加点，克服多项困难，攻克了数个工艺难关，用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该组件的研制生产，保证了 DH—4 武器系统的按时完成，为部队提供了性能先进的武器，创下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4. 高纯度 α—MCT 材料的研制。这种材料是我所研制资源卫星和某型号导弹制导系统所需材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负责该材料的研制工作，组建实验室、购置专用设备、制定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反复进行工艺实验、确立最佳工艺方案等，终于掌握了该材料的工艺，于九十年代后期研制出了优质的 α—MCT 材料，纯度达到 99.999996%，使我所研制的某型号导弹制导系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担任过课题组长、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主任和代理研究室主任等职。多次参加了全国性学术交流会，在航天部和全国性科技杂志上发表科技论文十余篇。1985 年起我参加了《导弹与航天丛书》飞航导弹系列之《飞航导弹红外导引头》的编撰，该书于 1995 年由宇航出版社出版发行。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科技工作者。我领导的工程组被评为三院先进集体标兵，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

回首往事，我从一个生长在农村的穷苦孩子到参军入党，成为一名大学生，最后成为我国国防科研战线上的

一名战士。我首先要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可以说,没有党和人民,就没有我的一切;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乡,是家乡人民抚育了我,我永远是朱庄的子孙;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的身影从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们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不搞特殊,要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上大学期间,父亲给我来过几封信,内容都是让我听领导的话,对党要忠诚、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生活要俭朴、学习要上进,生活上要往下看,学习上要往上看,要和战友们搞好团结等,这些话都让我铭记在心中;我还要感谢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是这所大学校把我培养锻炼成一名大学生,一名军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防科技战线的战士。"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将伴我一生。我没有为党和人民做什么大的贡献,回想党和人民的培育我自感羞愧。六十多年的历程,平平淡淡,忙忙碌碌。但作为高唐的子孙,我还是乐意把我的简历和工作情况扼要汇报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好让家乡人民知道,在天津还有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唐人,虽然离家已五十余载,但从来都没有忘记养育了他的故乡。

2003、7 于天津

我的事业之路

李 燕

天下本应无有无能之人，而多有无能之事；因无能之事多者，常为人看作无能之人，而有机缘能成事者，世人必称之有能之人。

天生人皆偏才，偏才得以施展之机遇，又能有自知偏才之明者，扬长而补短，或显长而避短，则世人谓之人才，显之久，则称为天才。

故而人生之机缘——机遇实在难以忽视之。

我生而晚，未能古临贞观之治；我生而早，未能躲开"文革"浩劫。生于安逸，养尊处优，固为肉体生命之幸运；生于忧患，忽体忽咎，恰是艺术生命之幸运；历阴阳变易而生生不息，方可臻于太极佳境，正是古今通例吧！

我生而幸——1943 年 11 月 12 日出生于人文荟萃之古都燕京，故而父亲李苦禅与母亲李慧文为我起名李燕，因"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父亲又为我命字为壮北。

我生而危，是时正闹日寇之乱，我未及满月，父母即抱我奔赴济南，所乘火车爆挤而死伤者众，我一路无声，父母以为去矣！不意下车后我气息尚存，唯脚伤而已。当是老天佑我也！

我幼而始"画地图"——尿床单也。蹒跚而行后改"画壁画"——涂白墙也。两岁母亲教识字，故五岁入学

一年级，课本“人一个人，手一双手”之类已无师自通。至于画画，见物则画，课本前后，作业周边，花鸟怪异充斥无加，唯同学啧啧有赞而师长尽瞪目而斥矣！回家中，父亲毛笔作画于案，我石笔仿制于地，唯画是好，最烦算数，尤爱听大人聊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最厌听照本诵念正经宣教。

及懂事识语，父亲对我说：“人一辈子要干点正事，好好学本事才能干正事。你瞅，有泥瓦匠、木匠、铁匠，咱家干的是教书匠，教学生画画的。要当好这教书匠，就得多读书，勤画画，诚心诚意地教学生。”

小时侯曾住在北京东城根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中央美院宿舍。同院都是大画家，从前院到后院住的是：我们家、董希文、王朝闻（不久搬走住进了张仃）、李瑞年、黄永玉、彦涵、滑田友、袁迈、李可染。常光顾的还有父亲的老师，我称为齐爷爷的白石翁，父亲学五花脸的老师，我称为尚爷爷的尚和玉先生等等名流。我在画家孩子们玩耍的行列里算是个高个子，但吃穿玩用之类大不如人家的孩子，那时我发现父亲变得爱发脾气，尤其酒醉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人，时任校医的母亲下班回来，常为之落泪。我好象也在孩子们中间矮了一截，一怕遭白眼，二怕羡慕人家的吃用，就常到不远的城豁子口外头，跟“野孩子”——农民的孩子玩耍，他们跟我很合得来，一块儿够酸枣儿、游窑坑、逮蛐蛐、捞小鱼儿、捉刺猬……看看护城河里的青蛙，河边的野菜，毛驴车水，青菜畦子，城墙上头的大青蚂蚱，老城楼子……不但不用花钱，还真有大院儿里没有

的乐趣儿，更增加了画材，我回来就把它们画在院墙上，又蹬窗台爬梯子画上了房檐儿……终因淘气出了圈儿，一个女人当着众人面怒斥我道："这个院子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李燕，你等着看吧！"六七岁的我，虽然当时脸红得发烧，可是并不懂什么叫"自尊心受伤"，只觉得，父亲叫人排挤得失去了"教书匠"的工作，过日子都难了（姐姐说的）。父亲好象低人一等，我这个当儿子的也就低人一等，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天我见院中垃圾箱里有些菱形的红壳壳，形色很美，我拾回来洗干净，在屋里地下拼成了种种形状，比七巧板还好玩哩！但忽然有一只大脚从身后踏来，把红壳壳碾个粉碎，原来是喝醉的父亲气冲冲地回来了，他瞪着我呵道："没出息！咱们家吃不起的东西你还拣回家来，给我滚！"我吓哭了，姐姐忙过来抱住我不平地说："弟弟没见过螃蟹，拾回来玩玩又有什么？"因为穷，不知对虾海蟹之类为何物的我，这回是第一次知道这些螃蟹壳是人家吃完蟹肉丢弃的东西。

虽然后来父亲"告御状"成功，毛主席派秘书来家看望，并初步解决了父亲的工作，饭桌上也比先前好了一些。但我心中那"没出息"、碎蟹壳却一直激励着自己——决不当个没出息的人，以至日后任何横来的挫折、侮辱、暗算、嫉恨甚至打击排挤，都成了教我有出息的动力——"道者反之动也"。长大了才日渐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遂书之"铭耻奋志"以为座右之铭。

小时侯父亲带我串门儿，曾到西城跨车胡同15号的齐白石爷爷家里，他画画不避人，我有幸看到老人家作

画，我说："爸爸你跟齐爷爷画的都是粗笔大画呀！"白石老人乐了，说了一番话，但口音很重我不懂，父亲说："齐爷爷对你讲了，这叫大写意！"噢！"大——写……"是那个"意"还是"义"？还是后来才知道的。父亲说过，他是白石老人的第一位学生，但是白石老人从来也不收他的学费。有一回父亲带我去给白石老人拜年，我给齐翁鞠了一大躬，就象上一年级时给国父孙中山画像行礼那样，说声"齐爷爷新年好！"齐爷爷乐着送给我一个小红包，父亲说："齐爷爷给你压岁钱了，还不快道谢！"我又照样鞠了一大躬："谢谢齐爷爷！"临走，齐爷爷还送我一幅《世世太平图》：一只黑身红嘴的和平鸽展羽而翔，下面是两个柿子和两个苹果（后来才知道，是谐音"世"与"平"而命题的）。我仍照样鞠了一大躬："谢谢齐爷爷！"回家看着齐爷爷送我的珍品，又启包一看，竟是两万元（1952 年的旧币，两万元合现在两元，但当时，可买三斤多对虾或 20 个烧饼哩！）这是平生第一次发大财。母亲说："别瞎胡花呀！这是齐爷爷给你买文具的呀！"时过 14 年后，压岁钱早花了，《世世太平图》则在"文革"被查抄而去，1977 年它突然又被好心人找到而且还给了我，真是齐爷爷跟我的缘分割不断呀！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离中央美院很近的煤渣胡同 9 号宿舍，这是一座小四合院，住着名画家张光宇（与我家一墙之隔，因墙不隔音，故每逢他家来客，则谈笑尽人耳中，颇感热闹）。还有油画家戴泽（夫人陈碧茵是工美设计家）、漫画家韦启美、雕塑家王炳照（夫人樊曼

琳是一位很漂亮的声乐教师)、陶瓷专家郑乃衡(善谈老北京掌故)、美术史论家常任侠(博学善谈)。此后下课便到美院去玩,去看,看U字楼走廊里各系的作品展览,看大学生们上课(唯人体课不许小孩看,却能看人体素描和雕塑陈列),到雕塑系泥池里弄些泥捏些小动物,还画些"印象派"——把走廊各种作品的印象画在自己的画里。有一次从门缝偷偷张望大礼堂里开大会,得寸而进尺,蹭进去了,竟无人阻拦,便在后排坐听,大人们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反倒朝我乐。忽然礼堂前东门开了,蹒跚进来一位仪态慈祥的长者,似乎面熟,随行者二三位。"徐院长来了!"不知谁先说的,大家一并起立鼓掌,长者向大家微笑招手,示意大家坐下,他则在前排就坐。回家后父亲才说那位长者是徐悲鸿院长。"为什么大家都起立?""徐院长是我的西画开蒙老师,在美术界最有威望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威望"二字,就是"人们都非常尊敬他"的意思。至今,那刻的印象仍不时浮现脑海——啊!我今生有幸"正式地"见过他,了不起的徐悲鸿院长———一代大宗师!

我常常胡画,父母并不着意指教。直到13岁,父母才叫我进美院附中办的业余培训班,每逢星期日就去学素描和色彩。1958年"大跃进",以前只收一班的美院附中,破格招两班新生,丁并文校长一见我就抱起我说:"来吧!考附中,我培养你!"于是从北京二中初中毕业的我,成了中央美院附中的新生,从此我正式步入了美术征途。

美院附中,是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平时学生一概住

校，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返校，纪律极严。除学习高中各项课程外，当然还要学习一切正规的美术课程和下乡实习。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劝其退学。然而这三年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则令我受益终生。

附中学风甚盛，互相比着谁画速写最多，多的敢于上秤来称！更比着多看书览画册，连看电影回来都比着画记忆画。校旁的隆福寺大庙，是课间和休息常到的地方，庙前是市场，从百货文具书籍到古董旧货一应俱全，市场后头是大雄宝殿，殿内正中抬头望去，有一件玲珑无比的本雕大藻 井，形制规格为世界唯一者，堪称国宝！大殿四周古柏古槐遮天蔽日，虽长夏炎热，此处仍是爽意习习，风铃叮叮，故而檐下高高的石台石阶，早就被五百年来的乘凉百姓磨得镜面一般光洁。它是属于老北京平民百姓的。在这儿能听到好些有趣的京城旧话，还是我画速写的好去处。后来，这庙却被什么人物下令拆光，盖了个不伦不类的百货大楼，面目全非。拆庙 30 年后，似乎老天报应——一场大火把大楼烧个净！如今在原地又盖了个百货大楼，却在楼顶上“恢复”了“隆福寺”——缩小比例的假古董一座！全无当年人文风貌，真是可叹可笑又可悲！

在附中，我的国画成绩往往不如有的同学好，有人笑我“李苦禅之子怎么回事了？”我自愧无入地之门。回家问父亲“为什么不早些教我画大写意？让人家笑话我！”父亲说：“大写意是高度的艺术，不适合少年上手，体会不了，越画越空。不必着急，先打基本功，文化成绩上去了，

功底厚了，再画大写意也不迟。别怕人家笑话，也别跟人家计较，自己用功就成了。”于是我就狠练速写，练就父亲要求的“下笔要稳准狠”，再就多读书，牢记父亲说的“胸无点墨甭想画好画。”

我18岁成年之际，中央美院中国画系首开花鸟科，我即考入此系此科，步入大学殿堂。入学伊始颇不习惯：再不必住校（想住校也可以住），自由时间忽然多了，可是同学们自由竞争的学习风气更浓了，真有些孔老夫子所说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气氛，凡爱用功又成绩好的同学，都让我羡慕，特别是高班的学长：龚继先练笔墨不厌其烦，王继超瞠目凝神颇爱思考，范曾背诗文极多且熟，出口成章并有文章发表……父亲也极爱他们，屡嘱我要多向他们学习。时任此系教授的父亲最反对旧时代的门户之见，主张多方师承。当时的中国画系也实在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产物，近世名家多在此院此系执教。例如吴作人与萧淑芳夫妇、郭味蕖、叶浅予、蒋兆和、陆鸿年、刘凌仓、田世光、李斛、宗其香、李可染、陶一清、梁树年等，更延请校外名家刘继卣 、关松房、屈贞、刘冰庵、王雪涛、黄胄、钱瘦铁、俞致贞等或兼课执教或开办讲座，演示技巧。更因国、油、版、雕、史论各系汇于一校，自然相得益彰。院址又在市中心王府井东邻，南有长安街，西有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实在是徐院长选就的最佳人文环境——人气、文气盎然沛然。

入学头一年课程，人物山水花鸟并不分科，基本功素描、速写尤重。动物速写早已驾轻就熟优于附中以外人

学者，人体速写则是初练，第一次面对全裸体的女模特时，还真不好意思，只敢转到侧面去画，是红着脸上完第一课哩！好在我很快就适应了——人体美的要则正渐现于笔端。

教我文化课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五十开外的文怀沙先生，凡他上课，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外系外校赶来听者立席盈室，文老师一不坐下，二不看讲稿，手眼身声步一并面上，活灵活现了"之乎者也"的真谛。他的课不必记笔记也能铭刻在心里，至今犹能大段复述之。三十年后我又见到了文老，他依然声音朗朗，目光炯炯，文思敏捷，语多机锋，寓庄于谐，大俗大雅，唯颏下多了"吊搭"白须，目光中更添了几许慈祥。我见文老的头一句感谢话就是："您的文学课是有数的那些课，但您为我植下的中华优秀语言的基因，让我终生受益不尽！"他分明知道这是绝然不同于恭维的肺腑之言，他无言地默认了。当我如实复述他当年的授课内容之时，他欣慰地笑了，那是一个真正教书匠的特有笑容——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成果后的一种近乎老奶奶似的笑容。另外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文化课老师就是校外的"非在编"老师包于轨先生，在老北京包家弟兄们以文风名于同辈。父亲带我去他家拜门学习书法，然而他却不仅教给了我书法，更教给我书法后面的国学思想，从治学方法到语言都让我步入了一个幸运的境域！他是一位年近六旬而神貌已近七旬的老文人，面庞清瘦，口边颏下胡须疏秀，颇有些仙风道骨，双目藏神，而一旦有意看你，则仿佛能立时看透你的心意。然

而他没有躲过十年浩劫，竟以“腐蚀青年人思想”的罪名被拉去劳改。拨乱反正后名誉虽复而遗骨无回。我未能报恩于万一，真乃我终生一大遗恨！唉！区区李某之能又岂有包老师十分之一呢？命运之神不公道矣！

父亲常说，古来父子书画家中，往往子因父得名而其实不符——是由于未能超出家学所至，因此不但要“家学加科班”，还要多方求师学习才可能融会诸家之长以发扬家学。古今凡子因父得名的往往称“大小”，如宋代的“大小米”（米芾、米友仁），唐代的“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或称父不称子，如“马远父子”（马远、马麟），而对父子俱有独到成就者，往往并称，如“三曹”（曹操、曹植、曹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因此父亲在校外不但引见包于轨先生教我，还带我向孙墨佛老先生和尚爱松先生学习《唐·孙过庭书谱》。孙老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是位山东老文人，张口便是近代历史，爽快直率，气贯丹田。尚老则是文质彬彬，侃侃谈及魏晋南北朝历史如同拉家常一般，谈到昔时王谢竟如描述老友一样。每到得意处，眉宇间熠熠有光，两颧微红，通室之内，除了书架书箱外，俱充满了他的话语激情！如此追述下去，对每位提到和未提到的当年的老师，我都可以放笔成书的，唯篇幅所限，只得带往。

没有他们——中华文明承前续后的载体，哪有我的一星半点成绩！如今他们已寥如晨星……中华文化历史的重任正落在我辈的弱肩之上！

父亲说：“中国画史上，画匠的画功力高，文人的画文

化高。要有画匠的功力加文人的文化修养画就高了。”又说:“徐悲鸿老师当年教我走中西绘画合壁之路,是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只知临摹不知写生的那一套陈腐画风。教我要有全面的文化素养,不仅要了解中国古来的诸种文明成果,还要了解国外的诸种文明成果,通过你现在的认识融合,方能让中国画创新。”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我养成了一个好学好问刨根问底的习惯,觉得什么是“老生常谈”就一目十行地自诩 一句皇帝批奏折的套子话“知道了,钦此”,觉得什么是新知识的就认真地去琢磨验证,听着什么是老挨批挨禁的知识就犯上了“参玄探奥,正本清源”非要看个究竟的癖好。久而久之,除了国事机密和人家隐私我一无所知亦无所评外,似乎世间大多数话题都能插上嘴,搭上话,人称“杂家”或“学者型画家”,实乃是为我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此皆后话而已。

1966年毕业那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文化大革命,野蛮暴戾之横行甚于返祖归兽,文明人性之泯灭竟如噩梦成真! 我由于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写“十万言翻案书”(实则三万言,罪名却成十矣!),23岁便被关进了“牛棚”监牢,曾与吴作人、李可染、刘开渠、许幸之、艾中信、陈沛、金维诺等美术界名人同牢被难,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侃谈互慰面无忌无疑。此期间受益良深,所听所得胜子同学辈“上正课”多多矣! 而后又是三年在宣化农场的“无期劳动改造”(去时一直不告之期限,也不许请假回家)。此时最富裕的是时间,最切肤的感受是自身的一切言行动止皆由无理的权力在绝对支配,而唯独

无形无象的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原先所学所问所读的书大多只存在脑袋里的桌架子上，鲁迅先生教导的“要读生活这部活书”开始响彻心际，他讲的“借自己的升沉看周围人的嘴脸，格外清晰”也正朗朗于耳边。罗丹讲的“静观丑恶也是一种美”又何其醒神！司马迁写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子放逐乃赋离骚……”正是身边与自身的现实！死的书开始活了起来，对先人、历史、文化艺术的一切一切，从来没有这么富裕的时间去思考，从来没有这么严酷的机会去验证。我的艺术生涯正被逼上一段最险峻而又唯一能通向柳暗花明的征途！

艺术的深刻丰沛来自对生活认识的敏锐深入，而这种认识之程度缘自思想能力之深度，思想能力之提高缘自现实的沧桑风雨对心灵的冲击，从而迫使心灵以更全方位的角度透视现实和印证历史，而后显诸文学、寄诸语言、形诸书画、演诸戏曲，其文野高下便自有公论。禅门哲学有“随缘行”之教诲，无论善缘恶缘随于行系于身，若能动心而忍性地视为人生洗礼与磨练的必经命运与当然天任，那么做人历世尚可裕如，更何况区区作画一事呢？身历十年浩劫，于此方知一二而已！

1971年冬，可敬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特请一些著名书画家为国家宾使馆作画。父亲从一个美院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正挨审查的“反动学术权威”、“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忽然拿起了干涸七载的笔砚，恢复了人的地位！但只有在台基厂国宾馆——周总理的保护伞下才能沐浴久违的人气与温暖，

而院墙之外仍是险恶环生的严冬。

1972年我有幸从宣化的“红色监狱”借调到北京，协助父亲为国家义务作画，直若从地狱到了天堂！在那里著名书画家们经历了一段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生活。在那里大家平等，毫无地位职务之差别，完全尽义务，也没有宣传媒体的排列名次与名誉头衔之别，所以作画无名无利可求，唯一动机，即为国家做奉献。大家从作画有罪的罪人忽而变成了名正言顺的画家。大家见了文房四宝真是如鱼得水，更发之于对周总理的感念之情，全都使出了通身解数，拿出了最佳成绩，故于不长时期内创作出了空前多的杰作。周总理派人妥善安排了这些艺术家们的膳食、医疗保护和临时休息住所，大家精神亦由之舒缓，无形中延长了艺术寿命。众书画家朝夕共处，无忌无忧，友好相待，诸家艺术之充分交流相互影响，亦前所未见。在共同的公敌民贼“四人帮”高压下，大家的向心团结程度亦于画史罕例。我有幸侧身其间两年左右，实在是又上了一个特殊的美术大学！

1973年，通过主持公道的侯恺同志，我以合情理的“走后门儿”调进了他领导的北京荣宝斋编辑科，终于让年迈的父亲身边有了一个儿于照料生活与创作。而两个妹妹尚在“上山下乡”的误人潮流中远远发在云南和内蒙……在荣宝斋六载工作，更是上了一个大学。在琉璃厂荣宝斋——中国书画的中心，我是它的历史上第一个分配去的中央美院的大学毕业生。老师傅们的经验知识和那里无形的人文气息又使我得到了特殊的深造，同时我

也为荣宝斋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不少超前的建议。那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些新作者被我写进了荣宝斋的组稿名单并上报文化部，一些中西结合、国画版画结合等等创新尝试的“非驴非马”之作被我誉为“骡子”，其作者被我著文上了海外刊物，原作挂上了“阶前盈尺之地可扬眉吐气”的荣宝斋大厅和展览。他们大多在不久以后成为名家甚至名声显赫的画家！尽管他们出名之后或另有“新闻热点话题”，但终归验证了我初入社会工作的一段超前思路是得到实践肯定的，是值得欣慰的。在当时的荣宝斋，如同鸟瞰书画界，极便于观察各路行踪，从各种成败途径中间找到自己艺术征途的较佳坐标和正确趣向。这对于我自身艺术的正常发展实在是意义深远。

1976年秋，“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的“四人帮”机关算尽，终于倒台。父亲说：“乱极而治的今天，咱们也该回归自己的本分之位啦！你还是干咱家的教书匠行当吧！读书人，画画的加上教书匠最合适。不读好书不成文人，就别画文人画——大写意，所以要多读勤画——现在不算罪过了！另外，学生们年轻，头脑新，你总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头脑清新不落伍，他们总出新题催你不断上进不断充实学问，古书《尚书》上讲‘教学相长’就有这个意思。”于是1979年暑期一过，我就在张仃院长和阿老副院长的热忱支持下调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年36岁，走出了对一生都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的一大步。

当教员不坐班，课外大量时间自由支配：协助父亲工

作的同时是最好的家学——老人正处在一生中最后一段辉煌的艺术生命之中。母亲主要负责他老人家的保健与生活，我则分工于日常业务和社交工作。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日融融之气氛中，父亲赶上了一生中最舒畅的日子。我的艺术道路已经与父辈走到了一起，共享治世太平的祥和！

“弘扬国粹，勾陈补缺”，程思远老先生为我的题词张挂于画室，这正是我沉痛地告别了慈父之后唯一的志向。先辈留下的重任正呼唤着我这颗敬祖爱国的赤子之心，用我“不惑之年”之后的时光去做我辈应当做的事，它，当然仍然不止于画画，它是国学事业的一个个应有的部分。

我的两次个人画展分别在深圳和北京举办了，由之而拍成的首都介绍本人艺术的电视专题片《砚田耕耘人》，在深圳台和中央台播放了。

我的作品陪着父亲的遗作在东京隆重展出，我陪着父亲遗作在加拿大温哥华展出，我应邀到香港地区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开办讲座，弘扬国学（包括写意画）。我的著作《苦禅宗师艺缘录》、《李燕画集》、《李燕动物速写》、《画里画外》等出版面世。我的杂文也成了一些晚报读者的留意文字。

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撰稿并主持了不少弘扬中华文明的节目（当然包括绘画），通过卫星播往全球。同时自筹资金与夫人孙燕华撰稿策划并由我主持的文化艺术节目多部，无偿奉献给多家电视台，播向五湖四海。这些电视片是“自有电视以来首部从学术高度全面介绍流行于

京津地区的弹唱曲艺”(曲艺界评语)的十一集曲艺片《胡同古韵》与两集《聊聊胡同古韵》、首部介绍画家的大型纪实文献片十集《爱国艺术家李苦禅大师》,另有短片《首都古建卫士》、《漫画家华君武》、《版画家彦涵》和发掘五十年未上舞台的明代徐文长戏曲《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电视片等。

我创作的历史上第一部图文并茂的《易经画传》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在海峡两岸各有出版,又荣选为标准版本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文本由外文出版社印行于世。经文通由本人研究整理后译为白话文,并加以450幅配图与三篇论文,深获《周易》爱好者与行家的喜爱与鼓励。

我与夫人联合社会力量,组织了航天科学家与首都书画艺术家联欢笔会,集资百万元作为给科学家的奖金。并且当场创作了大幅《大鹏图》(由欧阳中石先生题词)由在场一百多位科学家、书画家、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画上,搭载了我国第一艘实验载人“神州号”飞上太空,遨游地球14周后返回祖国。《大鹏图》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件环游太空又安然回收的绘画作品,严格的公证程序与证明书重重地记下了丹青史上的这一笔,令我激动无加!

执教21年以来,我独特方式的国学演讲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欢迎。除了北京各大学邀我开办大型讲座《传统文化艺术与今天漫谈》以外,外省市大学、中学也多邀赴讲,我创造的“无中休,无讲稿,站立演讲”连续四至六小时而听众盈席的讲学风格,得到了青年学生们的热情

支持。我继承先父言出行随、与学生融洽无间的教学风格，尽量多讲对学生有用的知识，尽量当众演示明确的笔头技巧，诚心诚意忠于教书匠的事业。无论是大讲座还是课堂教学，我都在教学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从群众语言、戏曲与曲艺语言中汲取最有现实生命力的营养，终于把最古老的经书和"之乎者也"的先贤论述变成了青年人倍感亲切的身边之言和贴心之语。在克服十年"文革"浩劫形成的文化断层，拉近年轻人和祖先的距离方面自感做了独创性的实验，而且这种实验正日益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近一个多月，我陪伴《李苦禅艺术大展》到了深圳，应邀在广州美院、肇庆大学和海湾中学举办了逾千听众的超大型国学讲座，"从人数规模到听众热烈反映的程度都打破了以往讲座的记录"——院校领导与听众如是评说。又应邀在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大学图书馆和职业高等学院举办了中型讲座，宣讲中国写意艺术，弘扬敬祖爱国的传统精神。一个月之内六次讲座共有听众五千多人，先父在天有灵，当为我而高兴的。

做一个效忠祖国的"读书人，画画的加上教书匠"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这三项对于一位当代的文人画家而言是不可分割与或缺的，这条路父辈没有走完，我还在走——永远向前走！

（此文根据李燕谈话整理而成）

2001 年 11 月 30 日

一片丹心鉴古今

马怀超

陈昆麟，1943年出生于高唐县张庄乡肖庄村（今属人和办事处），196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山东省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文物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理事，山东省钱币学会理事，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聊城市第九届政协委员，聊城市运河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长期以来，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及考古学、博物馆学、旅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文物保护管理和文物旅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是聊城市文博学科带头人。

聊城市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现有近千处，其中包括光岳楼、山陕会馆、曹植墓、阳谷景阳岗遗址、临清钞关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聊城市也进入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列。众多的文物佳绩与陈昆麟的努力密不可分，也使他成为聊城市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依法保护文物方面，他为全省树立了榜样。任市文物研究所主任以来，他一直负责全市地上地下的文物保护工作，担子重、责任大。近几年来通过努力，共从国

家和省文物管理部门争取文物保护经费五百多万元，对聊城光岳楼、山陕会馆、临清舍利塔、东阿曹植墓、冠县武训纪念堂、高唐文庙、梁村兴国寺塔、清平东城门、莘县唐代石刻群等进行了保护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他坚持文物修旧如旧、保持原样的原则，认真审查维修方案，仔细检查维修的各个部位。他不顾自己年近六十的身体，爬上五十多米高的梁村兴国寺塔塔顶检查维修质量。凡是经他把关的维修工程，都顺利地通过了省和国家文物管理部门的验收，为后世子孙留了一批宝贵财富。

为了保护地下文物，他根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组织完成了京九铁路、济邯铁路、济馆高速公路济聊段、高唐时风工业园、聊城大电厂新址、105 国道加宽、景阳岗公园开发工程及其它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文物勘探、发掘和保护工作。在京九线上发掘的张大庙唐代窑址、马庙元代房址、马庄宋元墓群，在济邯高速公路上发掘的梁庄墓群、茌平王老村遗址，在高唐时风工业园发掘的百座唐宋墓群等，在景阳岗发现了距今 4500 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古城，在莘县明天中学发现了明代工部侍郎王稼祥的家族墓地等。总之，近年来新发现古遗址三十余处，古墓葬三百余座，出土文物几千件，充实了博物馆藏品，为发展文物旅游和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源。

聊城市曾经是被省和国家考古工作者遗忘的角落，都认为鲁西是古文化贫瘠地带，很少有人到鲁西来工作，考古工作的主力大都集中在胶东、鲁南一带。陈昆麟独具慧眼，根据多年来在鲁西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分析，地

处黄河中下游的鲁西，在中国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应当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老天不负有心人。1994年在配合阳谷景阳岗公园的开发进行的文物勘探中，他发现了目前中国最大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这一发现，引起了省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派专家组前来考察指导工作。更可喜的是，当这座沉寂地下数千年之久的古城向世人展开它宽阔胸怀的同时，陈昆麟和同事们又发现了两组9座龙山城。这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它不仅使鲁西成为考古界注目的要地，而且也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部落方国时代和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确切地说，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一些国家只承认我们三千年文明史的错误论调。因此，这一重大发现于1995年获全国五大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在后来的发掘过程中，不仅出土了大量气势宏大的陶器，而且还出土了带有文字的陶片，给历史文明增添了光辉。

为了进一步弄清北组茌平较场铺龙山文化时期古城的面貌，他曾多次去北京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的专家们来此考察，详细向他们说明该城址的重要性，终于打动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双方达成共同发掘、研究较场铺龙山文化古城的协议。从初步试掘的结果分析，此处确实是一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重要遗址。发现的三座完整陶窑，不仅在鲁西龙山时代考古发掘属首次发现，就是在山东龙山地区龙山时代中保存如此完好的陶窑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重大发现，为

研究我国阶级的产生、城邦国家的出现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因此，在中国社科院为解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点时，茌平教场铺遗址是所选的六个重点遗址之一，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的重点遗址。

他的另一特点是能够独立思考分析和认识问题，不人云亦云。以阳谷吴楼汉墓为例，有些研究汉代的专家们认为该墓是东汉中期的墓葬，他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又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认定此墓是西汉末阳平侯王禁的家族墓地。此论证得到考古界的认可。

另外，他还发现了临清瓷窑窑址，这处瓷窑址，不仅过去的文献资料没有记载，当代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中也无有记载，为中国瓷器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他的学术成果也十分丰富。先后参与编写了《中国名胜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中国旅游名胜大辞典》、《山东名胜古迹》、《聊城地区党史斗争大事记》；主编了《文博论集》、《山东文物博览》、《鲁西文博论丛》等书；编著了《张秋挂剑台五体十三碑考释》一书；发表调查报告、论文等30余篇，主要有《地方博物馆突出地方特色的几个问题》、《论社会效益是博物馆工作的“唯一准则”》、《论聊城地区发展文物旅游事业之优势》、《傅斯年与考古学》、《聊城地区汉画像石墓调查》、《临清瓷窑址调查》、《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发掘简报》、《马陵古战场考》等文章。每年都有文章获得省考古学会或博物馆学会的奖励。

他积极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根

据聊城市文物资源特点，他于1994年提出《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事业，促进聊城经济全面发展》的书面建议，明确提出京九铁路建成通车之后，如果很好地发挥旅游优势，会进一步促进聊城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写了论据充分的论文《论聊城地区发展文物旅游业的优势》，他从优越的文物旅游地理位置和聊城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两方面，有理有据地论述了聊城发展旅游业的可行性，又明确提出以“运河旅游线”、“水浒旅游线”、“黄河旅游线”为主开发利用、发展旅游业的构思。市委办公室曾以《领导参阅》件的形式转发。为了进一步向地区领导宣传聊城地区旅游资源之丰富，他又借鉴省人大的经验编写了《聊城地区1996——2010年人文自然遗产与保护开发规划纲要》，并选出较好的文物单位，编写了《聊城地区人文自然遗产名录》。1996年，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一保二用”的文物方针，开发我市文物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繁荣我市经济，他又一次编写了《聊城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旅游景点开发三年规划》，供领导决策时参考。由于他连年建议发展文物旅游业，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政府于1998年提出了“把大力发展文物旅游事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决策。为了供领导参考，他又写了《聊城市文物旅游景点概述》一文。2000年，又在《中国名城》上发表了《名城聊城的旅游开发》一文，对于宣传聊城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后，特别是2001年2月，在市政协会上，他的《关于加强保护文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思考》的发言，对聊城市旅游资源作了详细的分析，就发展旅游业

提出了四条措施，又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再一次作为《领导参阅》件印发给市几大班子领导、市委、市政府各秘书长、各县（市区）书记、县（市区）长，为促进聊城市旅游的发展又助了一臂之力。

他多次跑国家文物局，争取景阳岗龙山文化古城博物馆的立项，争取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茌平较场铺龙山文化古城址的项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提高聊城知名度起了重要作用。

十几年前，为将光岳楼、山陕会馆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精心整理材料，多次跑国家文物局，终子使这两处文物子 1988 年成为国保单位。接着他又为聊城市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在申报第五批国保单位时，他根据聊城市内各文物单位的特点，分类排比，认真研究，挑选了四处特点比较突出的文物单位报国家文物局。从公布的结果来看，全省共上报 45 处，批准国保单位 15 处，每个地市平均不到一处，而聊城市就有临清钞关遗址、景阳岗遗址两处，而临清钞关遗址又包括舍利塔、清真东寺、清真西寺、鳌头矶四处，实际等于 5 处，在全省占了第一名。材料上报，仅仅完成了国保单位申报工作的第一步。全国申报国保单位的文物有几千处，评审委员会的各位专家们不可能对每处申报材料都认真审阅，详细了解。要想把这几处国保单位纳入专家们的视线，事前必须要向专家们宣传介绍，在他们的脑海里打上深深的印记。特别是临清钞关难度更大，按照国家要求，应当是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

才能上报。而临清钞关原来既不是市保护单位更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一般文物单位直接申报，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不仅要向专家们做工作，而且要向负责材料和分管的领导做工作。为了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带领临清的同志们多次赴京，最后干脆住在北京，动员上上下下的各种关系向有关人员和专家们讲述钞关的现状、历史和在中国税收史上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临清钞关是运河八大钞关之首，也是运河上乃至全国仅存的一处税收官衙的事实，引起了有关人员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他们的认可。最后，终于使这处一般文物单位一跃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清文物部门同志说临清钞官遗址能成为国保单位，是他们当初连想也不敢想的。

原以为不成问题的景阳岗遗址在第二轮筛选时，排的名次非常靠后，有落选的危险，陈昆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阳谷文体委同志赶赴北京，将前几年的发掘成果、评奖情况和考古专家们关于这处遗址在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汇集成册，及时散发给专家们，终于使景阳岗遗址跻身于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

另外，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不失时机地宣传聊城。1994 年发表的《古运河畔凤凰城》一文，广泛宣传了聊城的名胜古迹。1996 年撰写了《运河发展简史》、《运河与聊城地区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两篇文章，2000 年又在《中国名城》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名城聊城的旅游开发》一文，都为提高聊城知名度起了一定的作

用。他还利用多次跟随地委、行署领导人接待中央领导人和新闻界人士的机会，向他们宣传聊城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遗存及旅游的发展前景，让他们首先对聊城有一个好印象。如《人民日报》发表的《天下不敢小聊城》一文中，很多地方涉及到文物古迹，其中一个大标题"巧借余木做栋梁"是一个典故，就是在《人民日报》副主编李仁臣同志参观光岳楼时，听过陈昆麟对光岳楼的介绍后而定的。

正因为他在文物保护管理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1998 年国家文物局授予他"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陈昆麟把自己深深融入龙山古遗址的传统文化和光岳楼的巍峨峻挺之中，他常说："我要以自己的一片丹心永鉴古今……"

（摘自《江北水城》2002 年第 8 期）

老 兵 新 传

张根山

1943年12月，我出生在高唐县清平镇，1952年至1956年我先后在高唐县清平小学、师范附小读书。1958年6月在清平邮电支局任守机员，同年12月我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空军战士，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工作35年，我始终把家乡人民的嘱托记在心上，用实际行动为部队建设做贡献，为高唐人民争光夺彩，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军衔，正师职）。先后被评为军级优秀后勤部长、优秀共产党员，在1980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91年进国防大学深造期间，先后发表了《三军联勤保障初探》等十多篇关于军队后勤战略保障方面的论文。1994年10月转业。到地方后，我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保持军人的本色，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做贡献。

尽心尽职当好后勤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在部队训练及作战中的作用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从1969年12月开始，我先后担任空军第四军后勤部军需助理员、科长、处长、副部长、部长，主要负责所属部队后勤战备物资的保障工作。期间，我积极按照军委领导提出的“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和所在部队党委的工作目标，带领后勤部机关人员经常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想部队所想，急部队所急，时时处处为部队服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部队后勤保障工作的新路子。广开门路，增收节支，动脑筋、想办法，自筹资金2500万元，建造了36000平方米的上海天鹅宾馆（三星级），5年之内就收回了投资，现在该宾馆总资产已达到2亿多元。既为部队日常工作提供了方便，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弥补了经费的不足，为部队的训练、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受到上级机关和部队官兵的一致好评，我因此受到空军第四军部队首长的奖励。1986年4月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

1991年安徽省和县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我部奉命运送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拨付的救灾物资，我负责组织100多辆车，连续7天运送救灾人员和物资到灾区，出色地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并保证了安全，受到空军政治部的通报表彰。

虽然我在部队工作，但是我时刻不忘家乡的建设。为了支持高唐县的国防教育事业，经过我的协调，1990年，我所在的部队为家乡高唐赠送了一架退役的飞机，我组织人员车辆运送到高唐并进行了安装。这架飞机在供青少年学习的同时，也成为北湖公园的一大景点，受到家乡人民的赞扬。

一心一意抓机场建设

由于工作的需要，1994年10月我转业到上海市空港

管理委员会，任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主持上海市空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期间，我根据上海市空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认真履行市政府对上海空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和驻机场单位工作协调的职能，积极为上海市政府及市空港管理委员会的决策提供参考，牵头组织驻上海空港各单位开展文明航空港的同创共建活动，做好上海空港地区重大涉外接待和特殊物资运输的组织工作，确保旅客、特殊物资运输的有序和安全，受到上海市领导和驻场单位的一致好评。

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和上海市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是上海市建设“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1995 年 5 月，组织上调我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参与浦东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围海促淤、征地动迁、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为取得政策支持，我发挥自己曾经在空军部队工作多年，方方面面情况比较熟的优势，协调上海市与民航总局、军委、总参有关部门的关系，及时解决了浦东机场选址、空域使用、航线申报及免税政策，保证了浦东机场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一期工程建设节约十多亿经费。

在工程建设中，我紧紧围绕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建设这个中心，根据工程投资量大、工作协调量大、时间节点紧、工程质量要求高等特点，以创“全国文明机场”、“上海市文明单位”为目标，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充分

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建设队伍中,积极倡导和发扬"建一项工程、树一种精神、育一批人才、播一路新风、立一座丰碑"的精神文明新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优选施工队伍;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方法,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和责任保证体系,使浦东国际机场工程有一个稳定的建设环境;指导施工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立功竞赛活动,常赛常新,促进各项工程按照节点顺利进行,确保了投资130多亿人民币的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程质量优良和按期通航。1997年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上海市副市长陈良宇、蒋以任莅临浦东机场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

2000年12月,组织上决定我任上海机场(集团)公司下属的建设开发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当时正在建设的32万平方米的专机配套工程原计划是在2001年10月召开APEC会议使用,而上级要求在5月份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就要使用,工期提前了3个月。我会同公司领导班子果断地调整工程节点,召开"奋战70天,确保专机工程圆满完成动员誓师大会",开展了比工程进度、比工程质量、比安全生产、比文明施工、比队伍建设,迎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APEC峰会,迎接建党80周年的"五比"、"双迎"为主要内容的立功竞赛活动,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建设者的热情和干劲。2001年5月,各项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合格率达到100%,为"上海合作组织"和

APEC峰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所在单位2002年再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

抓住新机遇　迎接新挑战

根据国家民航总局2000年制定的十年规划，2003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又迎来新一轮建设高潮，二期工程建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我会同党委一班人及时召开了以“总结经验找差距、苦练内功上台阶，全力投入机场建设新高潮”为主题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浦东机场二期工程建设面临的新机遇、新形势、新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从亚太地区机场建设的形势、国内民航业的发展、建设航空枢纽港时间要求和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建设的任务等方面增强忧患意识，认清浦东机场二期工程建设与一期工程在领导机制、资金筹措、任务要求和建设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充分认识所肩负的新使命、新任务、新目标，以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去探索实践，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聚精会神搞机场建设，一心一意谋机场发展，同心同德干机场事业。

一是强化机场的枢纽性和功能性，不断优化二期航站楼的流程，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二是要严格控制建设投资成本，充分提高土地和空间的利用率；三是处理好经营和建设的关系，确保建设运营两不误。

浦东机场二期工程建设的启动，为单位全体干部职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我将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流程合理、以人为本、提高空间利用率、控制成本开支、满足旅客需求”的要求，优化设计，

优化程序，优化管理，充分准备，精心组织，牢固树立百年大计的思想，确保工程质量，确保各项任务按节点完成，为上海机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新的业绩。

齐鲁艺苑一棵草

鲁 华

1948年正月十二日，我出生在高唐县杨屯乡西朱庄（官道朱庄）。1955年在谢王庄上小学，王春青、刘天成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鲁振声、高振魁、鲁文星、谢春如、谢家水等是我的同班学友……

我已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可是，曲曲芽合小米面的菜粥、青青菜掺黄豆渣的小豆腐、拌棒子面蒸熟的苜蓿芽、榆钱饼子、槐花荠馏，这些纯天然的食物可口之极，一生难忘。尤其慈母刘芳兰精心为我熬的玉米粥，那钉锅的面疙渣实在是香甜无比！今日回味，犹如刚刚吃过一般。另有高唐钟楼路南的戏院、杨官屯席搭的戏棚，可说是培养我兴趣的场所。小香水（艺名）、半截人（艺名）、赵如莹、赵如雁、筱佩珠等，是我孩童时心中的戏曲名角。往事已过近五十载，谁能让我把它忘怀？在此，只好以纸墨代心声，深深地说：我终生难忘的可爱家乡——高唐。

谈及我的从艺，必须先谈谈我的父亲鲁其恒。他老人家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天资聪明：耕耘播种是一手扶犁，一手撒种，且自使缰绳令牛直行，村里人称农活高手；他毛笔字写得很好，春节楹联、红白事事都留过他的墨迹；他双手能打算盘，初级社、高级社年终结账，总是请他回乡帮忙。农闲之余，他常到城南刘海子村与王

志同、刘金福等玩友们唱唱河北梆子，相邻各村都有他的棋友。我的父亲，是农、商、工、棋、艺，尤以孝为真而闻名乡里。他演唱河北梆子很出色，扮相嗓音俱佳，解放前他唱《辕门斩子》，还给京剧名家李和曾打过对台呢！后来，他弃农从艺，先在高唐、禹城，后定位于长清县京剧团，并以编导获济南市文化局颁发的大奖。

我们村因有我父亲这么一位文艺全才，再有刘德贞、刘德义、朱九魁、朱明杰、朱明洪、朱玉珍、朱长利、鲁文远、鲁振元、王万青、鲁秀英、程家义、程双祥等一批文艺骨干，所以，连年春节都搞演出活动。吕剧《王定保借当》、《小姑贤》、《王汉喜借年》是常演剧目。我与侄儿鲁振声垫演的快板书《一对光棍》，让观众笑得前合后仰；我父编演的评剧《不养老》唱得观众泪湿衣裳；还编排了《除四害》等戏……农村演戏多是土台，照明用汽灯。没有电铃，靠"打通"召集观众。鲁其会叔打鼓，朱九西爷打锣，鲁其美伯打镲（铙钹），我就跟着打打小锣或敲敲小钹。——而今，我能成为齐鲁艺苑一棵劲"草"，培植"草芽"的沃土正是家乡高唐。

1960年，自然灾荒有史罕见，可说是树叶皆空，野菜难觅。我这棵"艺草芽"将随灾荒即灭之际，竟有幸被选进了山东省戏曲学校，受到专门培养。这是国家投资建办的艺术园地，吃、住、学习用品国家全管。名教师有与周信芳、马连良等同称"八匹马"的白玉昆、"黑牡丹"著称的关丽卿、享名南北的袁金凯、武生名家徐俊华，等等。我能师从刘友林、刘丹荣学习京剧音乐是我终生之幸运，

他们使我这棵高唐小草在百花园中成长。

艺师刘友林先生是驰名全国的著名鼓师，是个六场通透、昆乱不挡的音乐大家，他因材施教，从未小看我是个农村娃娃，我学习了刚刚半年，就让我打大锣参加了白玉昆校长主演的《古城会》，打鼓伴奏了《小放牛》。

1965年还是学生时期，我就参与了由山东梆子《前沿人家》改编为京剧的创作工作。此剧参加了华东地区的现代戏汇演，获优秀剧目奖。当年，我校编创了京剧《王杰》，由袁金凯老师执导，我参与了音乐创作并司鼓。从而我知道京剧音乐实属伴奏性质，永远辅佐演员，便以花草相比喻，把原名鲁汉三（家谱是三字辈）改为鲁华，心想成为齐鲁艺苑一棵碧绿的小草即足矣，足矣！

毕业那年赶上“文革”开始。动乱时期，谁能例外逃脱？省文化局的办公大楼、省委大院都留下了我来往走动的脚印；工人体育馆主席台上闪动过我挥臂合唱的身影；泉城大道回荡过我高呼的声音……然而，我明白“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道理，就是说：“该干嘛的就干嘛去”，年轻轻的学生不明目的地跟着蹦跳决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即勒马停蹄，通读了“斯坦尼”诸书和中国戏剧史及有关戏曲知识的很多书籍，它使我辨明了红、黄、白、蓝各种“花”色，然而我自知是一棵绿色小草，盼望自己能绿得招目，绿得新奇。

1967年我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奇袭白虎团》剧组工作。它是我这棵“小草”的“吊篮”；它是我事业腾飞的“天梯”。刚报到即随团赴青岛体验生活，并参加了《海鹰》一

剧的音乐创作并司鼓。1969年随《奇》剧组上调中国京剧团。在这里，我结识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剧组的一些名家，那时，我是“样板戏”剧组中最年轻的司鼓。身在“样板团”，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进而求教子梅兰芳大师的鼓师裴世长、尚小云大师的鼓师王万琪、程砚秋大师的鼓师白登云、荀慧生大师的鼓师刘跃增等，对我的业务都有所帮助。

1970年至1972年，我参加了《奇》剧拍摄电影的全过程。在分镜头小组里，我学懂了推、拉、摇、移，全、近、半、特、伏、仰拍摄；摆景布光，试拍、开拍，我在现场伴奏；后期合成由我和方荣翔、刘如意任音乐剪接助理。天天泡在棚里，我就利用拍摄之空隙起草了《京剧打击乐浅谈》一书的纲目。驻所地下室是我修书、练功的宝地，每天写一个小时的字，练一个小时的基本功，还要挤点时间锻炼身体。有时日拍十几个镜头，到凌晨二、三点才完，就这样我仍六点起床习练。天道酬勤，上帝是最公正的。1972年我写完了《京剧打击乐浅谈》一书的初稿。同年，与成公亮同志整理了《奇》剧主旋律谱，其主旋律谱本已于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我在杭州向陈大荻先生学习了近两月的声韵，进一步明白了作为一名鼓师，仅仅会打几个点子，演奏几个牌子，甚至能打几出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能够疾识舞姿优劣、唱念圆缺，才能轻驾戏曲舞台，才无愧为是“戏曲指挥”。

剧组在上海期间，我壮胆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谈述了我要报考作曲、指挥的心愿，却被“目前还没设进修班”

之由回绝。大学与我无缘,使我终生遗憾!

1974年领导派我去出版社校对《奇》剧总谱并届时参加《平原作战》、《杜鹃山》两出戏的学习班。

1975年,我团编排《凌河春》一剧,是一部解放战争时期土改题材的现代戏。特邀音乐家施光楠作曲,由我任打击乐设计并司鼓。每天紧张排练且无礼拜假日。就连爱人生孩子我也没请半小时假,更无迟到一刻钟,按期完成了彩排任务。那几年,均以忘我的工作态度被剧组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这极易随风摆动的艺园"小草",自命名谓"趴固墩",取借它抓得牢固之意。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样板戏"暂停演出,文艺从此进人了万紫千红的百花复兴期。我们恢复了几十出传统戏,改编了多出历史剧和神话戏。1981年剧团正在淄博演出,奉指示赶往青岛给邓小平同志专演,受到了邓老及其他领导人的接见。

更难忘的是,张春秋率团聊城地区一行,剧团走进了高唐,我也随团得返故乡。演出地点是我小时候看戏的老剧场,票价是五角一张,我们一天演两场,有时日演四场且场场爆满。八天的演出,我一人就购买了275元的戏票,可见我会了多少亲朋好友。那热烈而幸运的场面令我难忘。

1982年是复演传统戏以来我团的首次南行。方荣翔、殷宝忠挂双头牌,我任首席司鼓。第一个台口是徐州,首演效果极强烈。首场戏后,方荣翔就给他的弟子宋昌林说:"鲁华还真行,该要劲的地方真给劲!"继下南京、

上海、无锡，均获成功，方先生可说是极红极红！1982年由上海电视台录播、制盘的《铡美案》、《将相和》，就是我的司鼓。我之所以能够胜任此行，应该说一半功劳归于贤妻陈晓华。我多年来是为张春秋老师打鼓，方、殷两位先生的重头戏根本不会。恰在1981年，一团在济南人民剧场公演，我们二团正赶上休息，可谓天赐学习良机。在家境极贫的情况下，贤妻却劝我借了230元，言道"机不再来"。这样，215元买了台"康艺"录音机，15元买了三盘空磁带，晚上观摩录音，回家后连夜翻记，当天的戏必须翻记得清楚细致，因为第二天要把它洗净再录新戏。那时，我没有多买几盘空带的财力。夜以继日地刻苦努力，学会了方、殷二位先生的重头戏，才取得了江南之行的胜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当年年底随团出访了新加坡。

1983年改革开放的势头极甚，在同辈挚友的信任之下，我被推上了承包京剧团二队领导人的位置。

1984年后的几年，我总以司鼓之能为老中青三代人伴奏。曾为我院中青演员参赛获得全国最佳表演奖、梅兰芳金奖、梅花奖司鼓；1987年参加了为中央十三届会议的演出；1988年随团赴香港演出；参加了徽班晋京二百周年的纪念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由我司鼓，中国团李亦平、山东团杜玉琪操琴所录的卡拉OK伴奏带，在台湾由魏海敏、王海波等用来演唱，被台湾评论为："四十年来，海峡两岸艺术家合作之首次"。另：趵突泉要举办"中国济南首届中华梨园名家书画展"，负责办展活动的金晶先生对

我说:“你也是山东京剧界名人,给写幅字吧,一个字也行,主要是要你的名”。当时,张君秋、袁世海、吴素秋及我省名家均已赠送了墨宝。我自知字劣无比且又没写过毛笔字,真是为难了。他以鼓励和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当即赠送了文房四宝。写什么呢?我取巧用篆体自择新句。“文墨唯吾差,枯莠衬百花。”这是依我司鼓特性而编写的五言对。就是说,虽知自己使文弄墨最差,但为了衬托百花园中的万紫千红而甘愿献丑。果然,这幅字竟被装裱好了悬挂在展室门厅。此字,虽说成了观赏者之笑柄,但在我来说,恐已是终生难求的唯一墨迹了。

1991年以后,我事业的脚步更加走顺。在几届中国戏曲音乐研讨会上我都发表了论文,并且获奖。颇受周折的《京剧打击乐浅谈》一书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992年受法国京剧社之邀赴巴黎传授打击乐艺术三个月。1993年晋升为正高职——国家一级演奏员。1996年与几名梅花奖、梅兰芳金奖得主同赴台湾演出,大获成功。曾两次被聘为省文化系统高职评委。

我所著《京剧打击乐浅谈》这本小册子,真是微不足道。可我的好友、上海京剧院著名鼓师给我的回信中却说:“咱们打鼓的写书,你是第一人啦!”的确,有文化者可以写小说、办报刊,却写不了打击乐知识;很多司鼓好手对戏博学广知却缺乏一定的乐理知识。我正是为了填补打击乐艺术这门空白才斗胆提笔,不畏艰难,搞成小册。小册难产的原因,一是把原稿现代戏的内容全部改换为传统戏的,二是此稿曾三换责任编辑,故历经数载一直拖

到实行稿费制才得出版。十年间,这本小册印刷了四次,为普及京剧艺术又出版了一套四碟的光盘专辑。在我收获事业硕果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司鼓之职与其他戏曲演奏员一样,均在侧幕边作业,不给观众直接见面,所以被誉为"无名英雄"。在旧社会被称为"帮(傍)角的",演奏员总是依附名演员而出名,演员的知名度大小将直接关系着演奏员知名高低。我在京剧界之所以小有名气,我想主要原因有三:我身在"样板戏"剧组,曾向全国《奇》剧学习者(包括地方戏种)辅导。在传教的同时向他们学习,给各地学习者留下了很深印象,可谓其一;我从艺四十多年,参与创编了新、老、神话戏20余出,打过170多出戏,参加过无数次的电台录音,还为出版的十几盘盒式唱(伴奏)带司鼓……除了给我院老中青三代人伴奏之外,还曾与国内数十位京剧界名家、名票有过合作,这其中有香港、台湾的名角,可谓其二;业余文艺生活的高涨和普及使我结识了很多新友,依旧以我一颗难变的"淳朴农民"之心,换得了他(她)们平易近人的评论,算为之三吧! 另,我与诸多名家的合作演出,京、津、沪、鲁、冀、粤、港、台等电视台都有录相并播放。

我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会员、山东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这"员"位就算作我的职务吧。我在司鼓行业做出了微不足道的成绩,事迹被纳入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第一卷、《中国音乐界名人大辞典》第一卷、《中华人物辞海》、《世界艺术家名人录》华人第一卷。

我还想再把搁下的《戏曲锣鼓新编》和《戏曲指挥学》两部小册子写出来。若能实现，我可能将“趴岗墩”更名为“马兰墩”了。“马兰墩”叶子宽而长且能开蓝色喇叭花，还能供少儿们做哨习鸟长鸣……

故土的小草正努力拼搏！不管这棵草移送到什么园林之中，它身上所披挂的产地名称一定是——高唐。

2003 年 6 月 18 日于济南

难忘故土深情

——我军旅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王连水

我是从高唐这片深情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名普通军人。在我的心目中，家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儿时的记忆中，不仅有“金高唐”这种对丰厚沃土和淳朴民风的赞美，而且许多口头传说为其披上了些许人文古韵。记得在我的家乡前花园村以西约100米处，有一个叫“柴王坟”的地方，地势较周围高出一米多，虽已成为禾土，但碎砖瓦片显示此地曾是一达官贵人的陵墓，至于地下所埋何人，又为何葬于此地，是否与“柴家花园”的先人有关，村民无人能知，但从当下民间无任何与此有关的传说来看，此陵年代应在明朝山西“大槐树移民”之前。在我所知的范围之内，类似散落民间的古迹传说还有多处，足以说明高唐自古就是一个非凡之地。在我的视野之内，家乡的巨变当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最为伟大，其发展之快，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甚至连我这“常回家看看”的高唐人也常遭遇迷路之“苦”。在县城逗留，宽阔的马路、繁华的街市、美丽的湖光水色常常令我驻足凝思，流连忘返。啊，这就是高唐，这就是我的家乡，她与过去已是天壤之别！家乡的经济发展更是意义深远。近些年我曾到过许多地方，

在陕西、黑龙江、内蒙古、河南……高唐产的农用车随处可见，连我的同事也感叹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家乡的巨变使我欢欣鼓舞，我为勤劳智慧的家乡人民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北疆珍宝岛战斗的炮火硝烟的召唤下，离别故土，走入军营，转瞬已有30多年了。作为出门在外的高唐人，我既为这些年家乡的发展而高兴，也为不能亲手参加家乡的建设而抱憾。唯能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给家乡抹黑，不能愧对养育我的家乡人民。离家几十年来，我曾先后在锦州、沈阳、哈尔滨、北京等地工作、学习。当过基层干部，也从事过机关工作；当过行政领导，也做过专业技术工作；经受过战火的考验，也有过在国外工作的经历。部队和组织曾几次送我入学深造，先后就读于黑龙江大学、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北京大学等。现就任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受聘军事学五级教授，大校军衔，学术带头人，硕士及博士生导师。回首往事，同大多数人一样，我既品尝过顺利发展的喜悦，也遭遇过挫折和不快。但不论是顺风顺水，还是逆境险滩，我始终不敢懈怠，坚持以诚信赢得信任和尊重。在亲人的支持和家乡领导及父老乡亲的关注下，岁月和时光也使自己获得了一些发展和进步。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全面报告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只能剪切我经历中的几个片断，使家乡人民对我有所知晓，也作为我对家乡领导盛情关照的一份感谢和回应。

战 火 之 "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处云南边陲的老山这个弹丸之地，曾因炮火硝烟而声名鹊起。1985年初夏，祖国南疆的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已进入对峙和拉锯阶段，为了改善战场态势，加强作战力量，也为了使和平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军官经受战火的锻炼和考验，奉中央军委之命和学院之托，我率百名营、连职军官赴云南老山地区，经历了在特殊的条件、环境中，同特殊的作战对手进行的特殊战争。

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战争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存在于电影及其它文艺作品中。而对于我和我的家庭及亲人来说，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军人，我渴望和平，但面对国家召唤和部队军令，我必须义无反顾。接到命令后，为了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我无暇顾及"春城"昆明的秀水名山和高原特有的风情，经过短暂的准备和休整，即率队直奔老山地区。沿途损毁的战车、装备比比皆是，使我们初步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与无奈。经过两天急行军，车队于傍晚时分进入老山战区。我也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战火历练。

老山地处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境内，发源于云南境内的盘龙江在此穿流而过，流入越南境内。江水左右两边，八里河东山和老山相向而立，从军事上说属易守难攻之地。在中越友好时期，两国边民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更有通婚结亲之便。战争开始后，边民已后撤至安全地带，他们原来的家园已被炮火夷为平地。与一般战争

相比，此战烈度不高，阵地也相对稳定，但由于战争及战场环境特殊，对部队生存威胁极大。从安全方面说，战区军人主要有三怕：一怕“炮火点穴”。由于战区地幅狭小，所有团以下部队都处于对方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遭敌炮火袭击是家常便饭；二怕“绊雷截腿”。由于是拉锯战，交战双方撤离阵地前都在对方区域埋设了大量地雷，究竟什么地方有雷，谁也说不清楚，一旦踏雷，双脚即断，虽不伤及生命，但后果严重，对人的心理威慑极大；三怕特工偷袭。越南特工人员不仅地形熟悉，对丛林环境极为适应，擅长独立行动，而且神出鬼没，作战经验丰富。我方很多重要目标和关键装备，常遭特工袭击；战区人员的身心不得不处于高度的应急状态。从生活角度看，老山地区属热带丛林区，气候条件恶劣，阴雨不断。由于交战双方面对面对峙，一线人员活动受限，不得不在洞中长期忍受潮湿、寂寞和蚊虫的袭击。加上边界防御这种局部性战争，作战前后方反差大，导致部分官兵心理失衡，大量人员心理和生理出现病态反应。

进入战区后，我所带的干部全部纳入作战部队编制，学员进入一线阵地，我在主要方向任团副政委，参与作战指挥，同时分管和组织烈士及重伤员的后送工作。经过半年的艰难奋战，圆满完成了军委赋予的作战和研究任务，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学员、干部大部立功受奖，且伤亡不大。在副营长位置上牺牲的烈士包新峰同志，被内蒙古人民誉为“草原雄鹰”。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有的还成为军队的

栋梁之才。这对尊为人师的我来说,不失为一种莫大的宽慰。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带给人的是灾难和不幸。但对于军人来说,战争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战争使人坚强,催人奋进,促使人们成熟和睿智。一位先人说过,没有经历战争的军人,同其他人一样,都不会真正体验到大彻大悟。战争的危险和磨难,确实给我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它不仅给人以坚强和自信,而且可以净化心灵,使人淡泊宁静、宽宏达观,给人的事业注人活力。伴随着战火和硝烟,我对战争,对战争中的人,对军人的需要和士气,对心理因素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对于军队的制度和结构等,都有一些关注和思考。其中一些较成熟的看法已反映在我后来的理论著述中。就战争全局而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战争确实使我有资格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友 谊 之 旅

1993 年 7 月底,我经过 19 个小时的空中旅行,到达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作为高级军事专家组成员,执行军事援外任务,并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异域生活。

坦桑尼亚位于印度洋西岸、赤道偏南,气候炎热,地广人稀,民族属于撒哈拉以南典型的黑非洲种族。斯瓦西里语为其国语,官方公文使用英语。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坦桑尼亚的经济、文化并不发达,但其旅游资源丰富,其野生动物存量在非洲国家名列前茅,位于赤道线上的乞力马扎罗雪山是非洲制高点,堪称世界奇观。在政

治上坦桑尼亚是东非地区大国，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举足轻重。

中坦友谊源远流长。据考证，700 年前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曾到过当地的桑给巴尔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坦赞铁路将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山东医疗队长期定点支援坦桑尼亚，中国中医专家组也在此帮助当地人民进行艾滋病的防治。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往密切。很多普通百姓都会说一些中国话，会用中文向我们问候。我们在两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感受到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尊严。毛泽东、周恩来、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同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等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由于中国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在坦桑尼亚的边界战争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坦军上下对中国军队信任有加。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人权等领域全力支持中国。

国家对军人出国有着严格的限制，加上军事援外属于官方交往，工作的好差，自身表现如何，事关国家声誉。所以军委领导对在国外的工作和纪律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坦桑尼亚期间，我努力克服工作条件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困难，没有资料，我就请求大使馆在国内帮助解决，为了了解坦军的真实情况，我多次到坦军部队考察。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多次给坦军领率机关作报告，传递最前沿的军事信息和理念。与同事合

作，为坦桑尼亚军队培训中校至准将级军官39名。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晋升为少将，有的还走上了坦桑尼亚国防部的领导岗位。我所编写的教材，受到坦军军官的欢迎，被翻译成英文后无偿地留给了坦军。在坦桑尼亚两年，虽然远离家乡和亲人，生活上多有不便，但能够亲手为中坦两国和两军的友谊做出有益的贡献，能结交一些外军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格外的充实和欣慰。对于我的工作，坦军领导非常满意，并授予我坦军友好使者证书。我在坦桑尼亚两年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国驻坦大使馆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充分肯定，我所申报的“援坦军事学系列课程”荣获军事教学成果奖励。朱镕基总理和迟浩田国务委员在访坦期间，我荣幸地受到了亲切的接见和款待。

耕耘之路

从1983年至今，我一直在军队院校工作。期间，虽长期兼任行政领导职务，也兼任过短期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但始终没有脱离教育工作。20多年来，我先后讲授过军队政工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教育心理、军队管理心理、作战心理研究、现代心理战等多门课程；参与创建军事教育学专业、学科；参加研制全军军事学“八五”规划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研制“九五”规划课题2项，“十五”规划课题2项；先后出版专著、编著共10余部；参与策划对敌宣传大型画册，印发全军，指导部队对敌宣传工作；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并多次参加全国和全军性学术会议。其中发表于《中国军事科学》的《中西心

理战之比较》等论文，在军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曾先后获全军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军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奖励40余项。

多年埋头于紧张繁重的业务工作，不免有些劳累和负重之感。但当看到我的学生事业有成，当听到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勇挑重担时，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精力也由一般性培训工作转到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作为导师，我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多名。最近，我所在的学科作为军事学博士授权点，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通过，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也正在准备之中。伴随而来的学术科研活动也会不断增加，耕耘之路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有耕耘必有收获。能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努力，多指导一些学生，多培养一些人才，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路虽然平常，但它会继续延伸……

以上是我军旅生涯中的几个简要片断。就个人的意愿说，我非常希望能与家乡的同志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和沟通，但由于军人身份的限制，我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我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感谢亲人的养育与疼爱，感谢家乡的支持及关注，也感谢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给予我知识和力量的家乡老师。

2003年7月底于石家庄

创新永远是美丽的

——记北京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姚望

夏园园

初见姚望，是他作为团市委书记时一次来母校北京工业大学考察共青团工作，那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近谦和，谈吐幽默，博学中充满着睿智和激情。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受校友会的委托去采访这位已担任北京市贸促会党组书记兼会长的校友，此时的他刚刚成功策划和组织了备受海内外瞩目的第三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后改为中国北京国际科技博览会，新闻媒体简称"科博"）的活动。见到他时，我仍能感觉到他工作的繁忙。寒暄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向了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

1997年，刚刚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修国际商务回国的姚望升任北京市贸促会会长。职业的习惯使他不断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北京要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必须要有与之相称的名牌活动，并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广州有广交会，大连有服装节，昆明有世界园艺博览会……偌大的北京能举办什么？姚望把准了科教兴国战略和首都经济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意识到人才是北京的优势，高科技是北京的特色，于是他提出在北京举办高新技术国际展览。1998年，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际化和商品化

为主旨的大规模国际盛会——第一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在五月的北京闪亮登场，并且首战告捷。当时，笼罩亚洲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危机并没有阻止国际周致力于通向世界的科技交往。1999 年，第二届国际周依旧硕果累累。沉甸甸的收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第三届开始把国际周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次盛会，这意味着国际周从此将成为我国高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国际交往活动之一。果然不负众望，第三届国际周盛况空前，国际高新技术展览、经贸洽谈、高层论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在短短的几天里，签约总额高达 60 多亿美元。然而，国际周的收获远不止在这些商机，他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的碰撞和新知识的洗礼，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你沉思，耐人寻味。它的巨大震撼力辐射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给京城社会注入了活力。如今，国际周已成为京城五月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和网络经济、风险投资一样，国际周这个新词语在人们心目中也从陌生到耳熟能详，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国际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姚望谦逊地说，他所在的贸促会只是为四方宾客搭起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大舞台。的确，第三届国际周吸引了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1 个政府企业代表团前来参加，其中不乏国际政要、世界著名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国内 31 个省市组团参展参会，两万平方米的展厅汇集了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55 场高层论坛涉及当今世界高新技术产

业的最新课题,为我们催生着科学的创新思维;各种经贸洽谈和交流,还有网上国际周展览、科技人才招聘、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无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谈起国际周的成功,姚望说从1998年举办第一届国际周开始,他就决心把它办成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使之成为北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窗口,成为北京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如今,他的这一愿望正在实现着。北京成了高科技展示的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为北京吹响了更加开放和奋进的号角,他成功了。

1978年,姚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那时他对经济就怀着浓厚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好学生,自己把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留在了课堂,另一只眼睛和另一只耳朵留给了社会。课堂和书本上的知识对于活泼好学的他来说似乎并不解渴,于是他经常跑到校外去参加培训班,听经济学讲座。大学二年级时,他和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经济管理学会",把经济学的讲座引入母校的校园,让同学们与他一起分享经济学的营养。我想他现在的成功或许正是源于当时的那种经济学情结。

姚望不仅对经济学十分迷恋,而且对英语和计算机的学习也十分执着。大学一年级时英语成绩通过了大学最终考试,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英语的学习,而是到社会上去进修英语口语。他认为那种只会写不会说的哑巴英语很难适应将来的社会需要。如今,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能用流利的英语轻松地同外商洽谈交流,甚至在自

己家里，一有空就会当起女儿的英语老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许多人尚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时，姚望凭借他在计算机应用专业所学的知识，开始把眼光放到如何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前写出了《电子计算机与管理现代化》一书，作为内部教材由北京市科协向全国印发。此后，他又去重庆电大、重庆大学和其它城市讲学，并成了当时非常时髦的"三论研究会"会员。

1982年，品学兼优的姚望毕业后被留在了学校做共青团的工作。从学校团委书记到团市委领导岗位，姚望一干就是十多年。问起这十多年青年工作的感觉，他至今仍然无怨无悔。他说共青团工作给了他许许多多理性的启迪和思考。正因为有这段经历，自己才能了解改革开放中青年的所思所想，才能准确把握当代青年跳动的脉搏，并且在组织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别人看来，贸促会会长和团市委书记是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角色，要实现这种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姚望的身上这两个角色却得到了成功的嫁接。用他的话说，这只不过是"把青年换成老外，把中文换成英文"。

也许是多年共青团工作养成的习惯，姚望处处把真诚看得异常宝贵。因为这份真诚，他赢得了许多外国商人的信赖。他说，你只有和外商真心交朋友，在贸易过程中互惠互利，才有可能促成双赢，不要总想着占人家的便宜。这种真诚缩短了他和外商之间的距离，很多外国商

人、企业家因而也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前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私人法律顾问纳赛尔就为在中国有姚望这样一位朋友而倍感自豪。为了开拓中东市场，首先必须了解中东的法律，也就离不开象纳赛尔这样的法律专家朋友般的支持。自从贸促会在中东开设了律师事务所后，姚望与纳赛尔的接触频繁多了。终于，凝结着他无数心血的第一家中国大型超市连锁店在约旦首都阿曼开业了。

姚望的同事谈起他时如数家珍。来贸促会后，姚望突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大胆地进行机构和人事改革，极大地拓展了贸促会的功能和业务范围，并在国际国内贸易理论上颇有建树。他提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四补”理论和“三个中心”的学说，在我国贸易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他的“三个中心”的学说，从总体上将我国广州、上海、北京分别作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中心，勾画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布局的宏伟蓝图。可以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一届又一届取得的巨大成功，为这种战略构想提供了极好的注释。

由于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姚望经常受到外国贸易团体、商会和留学生的邀请，为他们演讲、作报告，大力宣传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以他的创新思维和独特视角，阐述着他的贸易理念和主张，获得了许多外商的好评和信任。在与国内外的广泛联络中，他为国内企业去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无数的商机。他说贸促会就好比一座桥梁，要充分发挥好纽带作用。当社

会上人们热衷于谈论假日经济、旅游经济、网络经济时，他却清醒地看到了会展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会展经济这一鲜为人知的新概念，从房展、车展、电视节目展到国际教育展和高新技术展，各种会展的火爆，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倘若你去任何一个会展逛逛，你不仅会亲历会展经济带来的活力，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思想的超前。

谈起未来，姚望兴致勃勃。随着北京市东城国际商业区和王府井国际性展览街的建成，百年金街王府井、中央商务区、国际金融区在京城东西遥相呼应。贸促会有忙不完的活，姚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看着他微笑的样子，我感到他正沉浸在创新的喜悦中。这也使我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创新永远是美丽的。

（摘自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的《无价的财富》，本文略有改动）

附：

姚望简介

姚望，1955年生人，祖籍高唐县城南街，随其父姚卿详（又名董华）定居北京，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市顺义县农村插队，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北京市优秀青年。1976年他被推荐到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攻读第二学位。1986年毕业

后，被中共北京市委任命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后当选为书记。期间曾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青年联合会主席、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北京市青年研究会会长。1994年姚望受共青团中央与中共北京市委派遣，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修国际商务。所写研究论文《中加贸易现状与前景分析及工作建议》在加拿大发表后获得好评。1996年回国后，他任北京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会长，兼任北京国际商会会长、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理事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北京工作站主任，还担任世界贸易中心协会(WTCA)国际组织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北京市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并再次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2000年姚望调"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任总监。还兼任北京工业大学、中国旅游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电子计算机与管理现代化》；主编了《跨世纪丛书》、《青年与党》(获奖)；参与主编了《国情教育读本》、《改革潮》(中学生读本)。此外还与人合编了《现代管理科学基础》(获奖)、《人才管理学基本原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辞典》、《独特的经济》等专著。在北京贸促会工作期间发表了一些论文，如：《贯彻十五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国际贸易促进工作》、《发展市场中

介组织,服务市场经济建设》、《关于加大吸引外资工作的思考》、《中国会(议)展(览)业基础理论与实践初探》等。

海外游子　情系高唐

——记美国DDI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海博士

曲海霞

初见李振海博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然而，最令人敬佩的则是他的进取精神和敬业精神。

李振海，现任美国DDI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先后获得系统工程及工程学博士学位。

1958年10月20日李振海出生于高唐县南镇乡河西王村(今属赵寨子乡)，曾就读于高唐三中；1977年考入山东工程学院(现山东理工大学)；1982——1985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系统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1990年赴安徽省安庆支农；1990年赴日本考察；1991年底，他考取了美国University of Illinoise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1993年李振海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Double L公司工作。在Double L公司，李振海博士主要负责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在他负责外贸业务工作期间，充分显示了他在企业管理及国际贸易方面的杰出才能，仅一年，他就为公司赢得了相当于公司前十年所得的利润，这一业绩令那些美国同事惊叹不已。

1997年李振海博士创建了自己的外贸公司——DDI公司，并运用自己独特的运营管理方式使公司在短短几

年内迅速发展。DDI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主要经营养殖设备、服装、机械化工业品、日用品、工艺品等，销售网络覆盖加拿大、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营业额每年可达3000万美元，公司所经营的商品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

其实，李振海博士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国内就已经显露出他的创业及经营才能。1988年他在安徽安庆支农，当时由国家科委投资50万元、安徽省委投资30万元组建的一个农场型公司由他负责经营。在他的管理经营下，这个公司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为拥有三个子公司的大型企业，初次显露了他的经营才能。李振海博士的这一业绩曾被当时的《半月谈》所报道。由于他为安徽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他被提名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人选。

李振海博士身在国外，情系家乡高唐。为了家乡的发展，基于一片游子乡情，他在1997年DDI公司创建初期就在故乡山东高唐投资建立了独资公司"高唐双龙公司"，在高唐鲁西科技产业园内租用土地35亩，建厂房、办公楼及辅助设施，建筑面积达12100平方米。双龙公司建立初期，李振海博士就特别注重联系外商，经他牵线搭桥每年来高唐访问的外商达400人次，大大提高了高唐的知名度，为高唐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李振海博士为振兴家乡的经济，积极与高唐的多家民营企业合资、合作办厂。他还以高唐双龙公司为总部，成立了济南、青岛和烟台三个分公司，并在青岛投资200万美元建

仓库，成为高唐私营企业中第一个在青岛建立仓库的企业。另外还在青岛建立了数据库，全面监控双龙公司的进出口贸易。如今，高唐双龙公司已发展成为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是高唐最大、聊城地区最主要的外贸企业。

双龙公司的主导产品是养殖设备，其中移动猪舍是李振海博士根据所学专业知识以及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考察研究发明的产品。此项专利产品使用港口退役的旧集装箱改造而成，内部水、电、暖齐全，配备了精良的控温装置（部分配套件是由美国进口的），使小猪的成活率达到99%以上，生长速度也有大幅度提高。这种养殖设备因占地面积小、可移动且使用方便，颇受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青睐，每年销量可达100多个。

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进取精神和敬业精神一直为公司员工所敬佩。他对公司业务及产品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所有产品的性能、销量以及库存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每次回国，行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甚至抽不出时间回老家探望老人。每当到双龙公司检查业务时，他对公司许多产品的优缺点及生产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他把渊博的学识运用到经营管理之中，使他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轻车熟路，几年下来，就使公司在国际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DDI公司及双龙公司的迅猛发展离不开李振海博士对国际贸易敏锐的感应力及其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他在管理中的主要做法是：

一、转变经营观念，用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模式、企业管理理念来武装公司员工，培养一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将美国 DDI 公司的业务员与高唐双龙公司的员工互调互派，提高业务员的素质。每一季度 DDI 公司业务员都会到高唐双龙公司进行业务交流。他们不仅带来美国客户的一些意见、想法以及自己在业务中的经验，同时还带来一批新客户。随着国外客户的增加以及对中国高唐的熟悉，不仅使双龙公司的业务员直面国外消费者，在工作中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满足美国及日本的消费者需求，提高公司效益，还会相应地提高高唐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推动高唐经济发展。

二、在中国成立 DDI 公司的翻译部，减少了国内外交流易产生的误会，方便了中美业务的交流。

三、把业务放在北方，主要业务对象是中、小企业，在国内建立自己稳固的生产基地，生产的产品从劳动型向科技型发展。

四、强化质量管理，创 DDI 公司自己的品牌。为了严格质量管理，DDI 总公司在山东烟台成立了质量管理部，全权负责公司的商品质量检验和管理。由于美国 DDI 公司和双龙公司的商品数量大、品种多，协作厂家分布广，烟台质量部根据各企业的水平差异和国际贸易条例的不同，严格控制出口商品的质量，以确保公司的信誉，树立公司良好形象。

五、建立自己的网站，利用高科技的网络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及公司业务的运营速度。建立了 DDI 公司网站

(www.ddicorp.com)以及高唐双龙公司网站(www.gt-shuanglong.com)。网站着重介绍了双龙公司的特点及主要产品,快速提高了高唐双龙公司的知名度和DDI公司在国内的知名度,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顾客通过电子邮件提出产品缺陷,双龙公司都会及时改正,直到顾客满意为止,缩短了信息反馈时间,提高了DDI公司的信誉。

六、独创一种简单高效的外贸经营方式。在国际间贸易的运输方式上主要采用"集中配箱、一步到位",减少了中间环节,既解决了产品的归类管理问题,又降低了运输成本。同时所经营的商品大都要求直接来自生产厂家,而且尽量直接接触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这样可以清楚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进而调整自身商品的性质、种类及比例。李振海博士特别强调要注意搞好售后服务,凡是顾客反映双龙公司有问题的出口产品,通过国外业务员拍照后由电脑传送至双龙公司生产基地,及时改进后再请客户提意见,借客户的眼光完善自己的产品,使公司向名牌企业靠近。

李振海博士依靠这种运营方式使DDI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这种运营方式在公司今后的发展中也将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造DDI品牌产品,创名牌形象,做到国内闻名、国际驰名"是李振海博士的目标,他祝愿祖国强盛,盼望家乡高唐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并努力为之奋斗。

2003年10月

我向家乡汇报

王吉红

尽管我不是生长在高唐，但我是高唐人，因为我祖祖辈辈到我父亲都是高唐人，我的祖籍永远是“山东省高唐县”。有一年，我回高唐看望祖父，“尚官屯”村老家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使我经常回忆起生活简朴的乡亲。村东的徒骇河、村边的河塘和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原野，更让我不忘家乡。

1958年，我出生在北京，那年底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后来随单位来泰安住了下来，一直到我出国留学近三十年。所以，泰安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六岁开始在父母所在单位的子弟小学（文化路小学）上学，小学一二年级，由于成绩好，担任了班长，可惜二年级还没上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姊妹四人都变成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因年龄小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写斗私批修、作大批判文章毫不落后。我十一岁小学毕业，进入当地的泰山中学，我对中学的每一门课都十分感兴趣，特别喜欢数学和物理，“文革”期间没有什么书可读，记得邻居家有两个哥哥，我在他们家发现了一本《平面几何习题集》，真是如获至宝。我试着做了书中的每一道题，做题变成了一种乐趣，每一道题我都试着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去做。诚实地讲，当时有些老师做

不出的题我也能做出来。我十三岁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在高中时期赶上了1973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学校又开始重视教学，我由于成绩突出，在学校颇有名气。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教过我的老师仍记得我这个学生，经常向后来的学生提起我。我十五岁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我的中小学时期，由于父亲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家庭生活主要是靠母亲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非常艰苦。我和姐姐、弟弟、妹妹夏天割草，春秋天上山拣柴禾，冬天拾煤渣。我很小就会做饭、补衣服等等。父亲很少被允许回家，有时过春节也不能回来，我记得有许多春节都是母亲带上我们四个孩子，背着锅、碗、面板、年货等乘闷罐火车到父亲劳动改造的工地上过春节。凄凉的工地上，只有工棚里我们一家守着炉火，母亲做着针线活儿，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母亲的影响，使我吃苦耐劳；父亲的影响，让我努力学习，对生活充满信心。

高中毕业后，由于不够上山下乡的年龄，我去建筑工地做了一名临时工，我子过许多不同的活儿，给泥瓦匠打过下手，刷油漆、铺沥青、安装玻璃等。1975年末，我成为国家一名正式职工——白铁工。打铁的活儿自然不轻松，无论打铁还是下料，我都认真去做，都做得很好，在学徒期间就通过了三级考试。那时，有所憧憬、有所盼望，但也不能不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

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父亲的问题有望解决了，国家恢复高考，让我充满激情和希望，使我第一次感到国

家给予同等的机遇，允许我们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子女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心情振奋。但当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有一天高考政策改变。当年参加高考，由于政审受限，我未被录取。第二年再次参加高考，并超过重点分数线，在高中毕业四年后，我被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系录取。二十六年过去了，回忆考前那段日子仍历历在目，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因白天工作太累了，坐下一会儿就会睡着，我经常是站着看书。那段时间里，母亲和大姐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活，支持我和弟弟复习考试，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上大学后，由于父亲的错案尚未平反，家中生活仍十分困难，我从一个为家里挣钱的工人转为花钱的学生，更增添了家里的负担。大学四年，我有三年穿的是带补丁的裤子，从未穿过皮鞋，从泰安到武汉，为了省钱，我总是尽量乘坐慢车。但我能回到学校感到太幸福了。我热爱大学生活的每一天，珍惜大学生活的每一分钟，学习用功在全系是出了名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系九十多名同学中名列前茅。大学四年，所有的课程考试都在九十分以上，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湖北省优秀大学生。

大学毕业那年，我以两门专业课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矿业学院（现山东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除了本系的课程外，还在数学系学了多门数学课。厚实的数学功底，使我在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我的硕士研究课题是提升机的最优控制，其成果包括理

论及实际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 LQR 设计的准解析及双模最优控制方法，在实践上第一次用 16 位微处理机实现了该控制器。硕士阶段的成果发表在《自动化学报》、《信息与控制》等国家级刊物上。若干年后，论文被美国《数学回顾》杂志摘录。获硕士学位后，我便留校任教，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及优秀论文奖励，其科研重点是计算机应用。

虽然我的工作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可我依然盼望能有机会再深造，从事我所喜爱的控制理论研究。1991 年，我通过了英语考试，如愿以偿得到了去英国进修一年的机会。我来到仰慕已久的 Strathclyde 大学的工业控制中心，学习先进的 H 无穷控制理论，从事 H 无穷 PID 控制器研究。一年后，又获考文垂大学奖学金，在控制理论与应用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从事非线性不确定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及柔性机器人控制。在这期间的主要成果有：(1)解决了带有残余不确定性线性系统的鲁棒控制问题；(2)扩展了美国 Corless 教授在有约束控制器设计方面的成果；(3)提出了直接非线性控制器设计的新方法；(4)以上成果在柔性机器人控制方面的应用。一般需要三到五年时间完成博士学位，我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再次显示了我在大学及硕士学习期间打下的坚实基础。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数学功底也再次得到考验，我的外校考官是世界著名巴斯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四个小时的答辩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把我当成一个数学专业的博士生去考。答辩通过

后，他祝贺我时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我笑着告诉他，我大学本科及硕士都是学的工程学科，这可真让他大吃一惊。

写完博士论文，我转到离考文垂不远的德蒙福特大学机电一体化研究室做博士后。当时的研究室主任是英国机电一体化协会的主席，研究室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在此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博士后期间承担了一个英国工贸部和英国科委联合资助的科研项目，研制成功了高速磁浮气动系统控制器并交付 Bldor 最优控制公司使用。完成博士后研究，我便留在该大学任教，一年后，又获得利物浦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的终身教职，成为该系建系一百多年来的第一位女职员。

我们王氏家族，可以说是一个教书世家，我也算继承祖业，在英国教书育人，现已培养硕士生、博士生近二十名，其中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发表国际论文六十余篇，主持和承担了多项英国国家科委、工贸部及大公司的科研项目，多次在有影响的国际会议上担任职务。但让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我应邀成为美国《数学回顾》杂志的特约评阅人。数学不仅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工具，也是我的爱好。

另一个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我丈夫陈京在出国前是个医生，出国后读分子生物医学，这个学科做实验非常辛苦，在他读硕士、博士期间，我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活儿及教育女儿的任务。现在我丈夫已获著名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

wick)的博士学位,并继续在该大学做研究员。

尽管我已来英国多年,但我仍然是中国籍山东高唐人,我和丈夫一直寻找为祖国发展出力的机会,都分别在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泰山医学院友谊兼职,为校际交流、祖国高校发展效力。

2003 年 8 月写于英国利物浦大学

献身海军装备保障事业的人

——记博士高工刘东风

文史科　整理

在海军青岛基地甚至北海舰队，刘东风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舰队官兵说他是“装备神医”，装备同行称他为“监测专家”，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评价他是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

刘东风1959年11月生于高唐县固河镇南刘庄村，1975年4月在高唐一中高中毕业后回原籍劳动，期间加入党组织，1976年12月参军到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1978年8月考入大连海事大学轮机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在北海舰队干部教导大队机电教研室任专业教员、讲师，1989年6月调入海军青岛基地装备部质量控制室任工程师，1995年12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6年元月起担任质控室主任，1998年8月至1999年3月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留学并考取油液分析专家资格。

入伍二十多年来，他立足本职，爱国奉献，积极探索科技强军之路。他率先倡导并实践舰艇装备“主动维修理论”，为实现舰艇装备维修跨越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率先建立基地、编队和舰员三级装备技术状态监测体系，使舰艇装备实现了从经验型维修向科学化管理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舰艇的在航率和能战率；他先后完成

科研项目9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他多次被总政、海军、北海舰队和青岛基地树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干部标兵”、“学雷锋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2002年被《人民海军》报评为“十大典型新闻人物”。

一

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刻苦学习,创立“主动维修理论”。1989年,基地成立舰艇装备质量控制室,轮机专业出身的刘东风被调到质控室工作。为尽快适应工作要求,他先后学习了《机械设备故障诊断学》、《润滑油液分析》、《光谱分析原理》等十几门学科知识。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他就拿着从舰艇上抽取来的油样、铁屑和照片,向知名专家教授请教,下舰艇到工厂取经,先后记下了4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翻译了发达国家100多万字的维修保障技术资料,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舰船监测基础理论知识,并以优异成绩获海军工程学院轮机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1998年8月,刘东风作为海军装备维修系统的第一个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阿克伦大学留学。学习期间,他几乎整天泡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潜心研究。为捕捉油液在试纸上产生光环的最佳时机,每一种油液他都要做上百次试验,并拍摄大量的图片,制成图谱进行分析对比。由于油液挥发出来的气体和使用的试剂对身体有害,加上饮食没有规律,时间长了他身体有些吃不消,但强烈的使命感和求知欲,促使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

那段时间，他白天对参数进行分析、做实验，晚上整理收集各种油液分析报告，拍摄相关的资料照片，收集了全美1000多个典型机械故障油液分析数据，查证出美海军主要舰艇机械设备的应用检测技术情况和我国新型舰艇同类型机械油液分析数据，掌握了大量相关的第一手监测技术资料。在异常艰苦紧张的学习研究试验中，顺利完成了四种油液的监测标准谱，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油液分析专家”资格。

学习结束回国时，由于刘东风带的资料太多，在洛杉矶机场被查出行李超重，他毅然丢掉衣物，把精心积累的宝贵资料带回祖国。根据这些资料，他提出的舰艇质量控制室及监测体系建设方案得以实施，并率先建成了海军第一家监测设备最齐全、手段最先进的监测诊断实验室。

二

以强烈的进取意识，主动作为，建功科学监测领域。刘东风所从事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工作，就是在舰艇装备故障发生之前，通过油样和振动监测等来判断舰艇设备的技术状态。在刘东风眼里，舰艇装备成了有血有肉有筋有脉的“活物”，如同人抽血化验诊断疾病一样，可以提前判断故障、主动实施维修。

我军舰艇装备维修已经历了事后维修、预防性维修和视情维修三个时期。刘东风以其特有的锐利视觉点击现代装备维修理论，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和探索，提出新的维修理论构想：既然舰艇装备有“生命”存在，为什么不能

破译其生命"基因",使其青春永葆,长期在航能战?国外海军舰船监测诊断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可以全时空保证船舶跨海越洋的航行质量,而我们的监测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由于传统维修理念根深蒂固,刘东风在推广应用新的维修理论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时主动上舰监测,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对此,刘东风没有退缩。1999年10月,刘东风在对某新型艇进行监测时,发现主机润滑油中含有肉眼看不到的金属屑,经过综合分析诊断,确定是推力轴发生过度磨损,需要停航修理。由于该艇刚入列不久,实施这一修理工程要拆掉辅助锅炉等大型设备,许多人对他的结论持否定态度,厂方研究主机多年的一位权威人士反复查看倾听之后,拍胸脯说不需修理,有人劝刘东风,这艘新艇性能一直稳定,推力轴承不可能出现问题,但刘东风就是"倔",坚信监测结果是正确的,丝毫没有做出让步,还直接给部队首长写了报告。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有关部门与厂家终于同意拆检。机器一打开,发现故障与他的诊断结论完全一致,老权威被折服,感叹老经验难比高科技。某舰小修结束试航时,前主机减速器在特定转速时发出异常响声。刘东风经过测试和反复分析论证,得出"异常响声因磨合不够造成,不影响设备运行"的结论。该舰在以后多次执行任务中航行近万里,没有发生任何故障,证实了刘东风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主动维修理论在舰艇部队逐步推广开来,有的主动上门请他做监测,有的请他上舰测振,纷纷送油样请他检验,刘东风来者不拒,乐此不疲。在他的带动下,

搞好装备监测，实施主动维修，已成为部队官兵的一种自觉行动。

近年来，他将装备科学监测手段用于装备主动维修，结合工作实践创立了160多种检测手段，诊断各种疑难故障101起，完成112艘次舰艇跟踪检测和9个科研项目，使基地的舰艇动力装备实现了“从经验式管理维修保障”向“数据信息式保健保障”的根本转变，走出了一条科技兴装的道路。

三

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开拓创新，探索装备保障的新途径。多年来，我海军舰艇控制系统传感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昂贵，购买不便，急用购买时还会受到无端刁难。刘东风感到单靠引进会受制于人，必须瞄准舰艇装备维修技术前沿，闯出一条测研修相结合的路子。根据长期观察和工作实践，他大胆提出了《某型舰艇监控系统传感器国内产品替代方案》的研制课题，为摸准传感器原理，他和课题组的同志吃住在舰艇上，钻遍了每一个舱室，摸遍了每一个角落，整天一身油水一身汗。机舱里的高温和油烟味熏得人头晕恶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遇到风大浪急，晕船是常有的事，有时连胆汁都吐了出来。经过艰辛努力，终于摸清了该型舰艇监控系统的种类、数量及安装位置、线路走向、信号传输、显示页面等。研究方案确定后，刘东风又跑遍全国几十个厂家，调阅几百套资料，建立了监控系统传感器管理数据库。经过几百次的实验和近千次的反复论证，终于完成了《监控系统传感

器国内产品替代方案》的课题，解决了传感器依赖进口的问题，填补了海军空白。

“舰艇航行到哪里，装备保障就跟踪到哪里。”这是刘东风同志开拓创新、致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02 年 5 月，刘东风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我海军舰艇编队首次环球航行。出发前，他在舰艇上建立了临时实验室，对主柴油机、燃气轮机等 36 台主要设备实施全面、系统的全过程跟踪监测。为及时掌握舰艇远洋航行装备技术状况，刘东风将超谱油液光谱仪等高新技术仪器搬上舰，第一次系统地将质量监控技术应用到远航伴随保障中。为及时捕捉舰艇在不同海域、不同气候下装备技术状态参数，掌握远洋航行的第一手资料，刘东风在舰艇上建立了 50 多个采油样点，每天钻进狭窄的舱室采油取样并及时分析处理。临时实验室空间狭小，摇晃厉害，刘东风把显微镜固定在桌子上，用背包带把自己固定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每天坚持把实验项目做完。

在环球航行 132 个日日夜夜里，他“猫”在指挥舰上，一路航行一路忙，不间断地采集、处理、分析油样 500 余份，帮助舰上把 20 多起故障点消灭于未显状态。这一路，他在舰员的配合下，组织测取数据近 6000 组，测取某型装备振动图谱 89 组，及时发现支点轴承故障、主机润滑油变质等多起故障征兆，并针对故障源积极指导舰员主动维修，改善了装备运行条件，为编队首长使用装备提供了决策依据。他指导舰员开展低纬度大洋连续航行装备管理研讨，从根本上提高了编队装备管理水平，实现了编队首

长提出的“全程保持装备性能良好”的要求，创造了舰艇远洋航行重大故障为“零”的记录。

四

以强烈的前瞻意识，甘当人梯，培育舰艇维修新队伍。为推动“主动维修理论”的应用与传播，培养更多的质量监控人才，刘东风在承担大量科研课题的情况下，采取集中办班、巡回演讲、专题培训、现场演示等形式，积极为各舰队、基地、院校培育新人。仅在海军军以上监管干部培训班和部队维修管理系统培训班等讲课就有30多次，培训人员3000多人次，使越来越多的官兵掌握主动维修理论、学会监测诊断技术。刘东风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机械系统主动维修》专著、发表“主动维修——先进的维修思想”等论文22篇，对舰艇主动维修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他还编写了45万字的《舰艇机械设备故障诊断技术》和《十国海军装备调研报告》等专用监测培训教材，倡导并率先建立了本基地舰艇装备技术状态监测体系，使监测诊断自上而下步入经常化、正规化管理轨道。

刘东风有个主张：“让人才充满激情”。他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他的激情带动和影响着周围的人，形成一轮又一轮“磁场”，也就有了一群又一群持有新观念的新型舰艇装备维修骨干。首先被刘东风“磁化”了的是他的部属。他所带的质控室，每年要承担数十项课题研究。为提高年轻同志的技术水平，他坚持定期讲授最新理论知识，传授实践经验。在他的指导帮助下，质控室

8名干部人人坚持在职自学，人人都有课题研究。目前，有2人在读博士，4人为硕士，有3人成为学科带头人，5人评上高级职称。

刘东风作为舰队的科技干部标兵，不但使身边的“磁场”变强，他还把“电”频频放向机关、部队和舰艇官兵。他捧着“关于海军监测诊断体系的建设的建议”的论文四处游说，借机关部队邀请他办讲座、作报告的时机，做首长和部队的工作。在他的倡导下，舰艇装备监测体系逐步完善，明确了各级监测诊断工作职责与任务，尤其在舰员收集、测试、送取监测信息等重要的基础环节做出明确规定，使监测诊断工作有法可依。

为提高舰员级监测力量的技能水平，刘东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人员编写了35万字的《舰艇机械设备故障诊断技术》专用监测培训教材。

磁场效应的回报是丰厚的。近两年来，通过编队级和舰员级舰艇装备质量监控体系反馈的数据达数十万组，在未发之前排除故障上千次。目前，基地辖区舰艇在航率和能战率创组建以来最高记录，监测诊断工作走在了全海军的前列。

五

以强烈的奉献意识，爱岗报国，把满腔的热情倾注到海防建设上。刘东风以身报国，献身海军装备监控事业，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情操。2001年2月，海军要在青岛基地召开装备管理现场观摩会，向全海军推广基地开展监测诊断工作的经验。会期临近，刘东风突发

急性阑尾炎，为准备会议，他强忍疼痛，坚持趴在桌子上写材料。妻子见他非常痛苦的样子，硬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后，批评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马上动手术。"为保证观摩会按期召开，他反复向医生讲明情况，请求采取保守疗法，通过滴注强力消炎止痛，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会上，他作为现场观摩会总导演，强撑着病体，边汇报边演示，忙得满头是汗。开完会，阑尾炎已过了手术期，留下了时常发作的病根。

2000年春节刚过不久，刘东风的母亲因煤气中毒住进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刘东风心里非常难过，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了。当他安排好工作，急匆匆赶回老家，看到母亲病重的样子，禁不住跪倒在母亲身边，流着泪将老人平时爱吃的山楂糕，一点一点喂进母亲嘴里。去年四月刘东风八十多岁高龄的岳父住进医院。老人对刘东风有着浓厚的感情，很希望刘东风能到医院陪陪他。但刘东风因忙于环球航行前的装备保障准备工作，没能满足老人的心愿。出访途中，岳父不幸去世。为了不让他分心，妻子一直没有告诉他。出访归来前，刘东风给妻子打电话，说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岳父陪床，他万万没有想到岳父已永远的离开了他。刘东风觉得有愧于亲人，但他无愧子国家和人民、无愧于装备保障事业。

爱岗报国，重金面前不为所动，是刘东风高尚人格的重要一面。随着"主动维修理论"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监测技术的提高，刘东风的知名度也随之提升，军内外不少单位欲高薪聘请他。1999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研究成

果和才华得到美国诺瑞公司总裁、著名油液分析专家詹姆斯·费兹先生的赏识，在把“润滑油液滤纸分析标准谱研究”课题交给他的同时，提出以每月5000美元的报酬留他在瑞诺公司长期工作，后来又提出让他担任中国开发项目总代理，全部都由刘东风说了算，但他婉言谢绝。去年，一位在美国从事航运工作的同学回国探亲，专程来青岛看望刘东风，邀请他到国外发展，并许愿洋房、轿车等优厚条件，他同样毫不动心。刘东风说：“我是国家培养起来的，我要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海军装备保障事业。”

由于刘东风为现代维修理论和检测诊断技术的宣传和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海军领导机关、首长和部队的好评，《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解放军画报》、《海军杂志》、《青岛日报》、中央电视台、青岛电视台等媒体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2002年，海军青岛基地装备部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刘东风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在海军以及社会上引起反响。

（根据2002年12月17日《人民海军》报和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提供资料整理）

生物工程界的科技精英——魏东芝教授

乡　晴

才智与人格的魅力

若要问一声，当今中国最多的和最缺的是什么？答案可能都是“人”。中国人多已构成最基本的国情，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固然有钱的问题、资源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年轻一代中如能涌现出更多的有责任感的有为人才，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法国一位政治家也颇有感慨地说，只有使一个国家的青年变得完善起来，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

触发以上感想的直接原因是对华东理工大学一位生物工程领域的青年学术带头人、科技启明星魏东芝的访问。作为一位基础扎实、知识面很宽的生物工程专家、教授，魏东芝在学业、科研深度方面，乃至科研组织管理方面都有堪称优秀的记录。这是一个有着趋于完善的人格，值得许多年龄长于他的人所尊敬的年轻人。以下是摘自魏东芝教授档案材料的一段文字，由此可了解他的才能和成就。

魏东芝，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工程学院院长，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鲁华生物技术

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重点学科——生物工程学科带头人，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化工学科带头人，中国酶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中韩生物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联谊会理事。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特殊津贴，国家优秀青年教师奖和霍英东基金获得者。截至到 2003 年 10 月，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完成省部级项目鉴定 6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4 项；近 3 年内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重要攻关项目及企业委托项目 22 项；已培养博士、硕士 50 多人；与日本京都大学、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Ohio State University、Utah State University、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德国生物工程中心 GBF 等分别签定了合作协议，建立了牢固的国际科研合作关系并开辟了人才培养渠道。

魏东芝教授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都渴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能否如愿，不仅与其本身的业务水准、知识结构有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如何，是否具有较完善的人格。只是一门心思钻业务，不考虑与周围同事的关系，不考虑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考虑家庭生活的和谐，那这个人就不是完整的人，而这必然要影响他业务水平的发挥。同样只贪图生活安逸，只是考虑小家庭，业务上无长进的话，那他的生活也不可能是真正幸福的。

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几句话：在我研究所的小环境里，

我就是坚持一个正气、一个人格，不管社会上怎么样，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我想魏东芝及其同事正在创造的生物工程方面的成果，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做出贡献，而他正在实践着的如何追求完整、完善的人格之路，将对一代人的成长提供珍贵的范例，其所可能发挥的效益是难以计量的。

从高唐到上海

魏东芝是农家子弟，出生于山东高唐城西赵庄村。“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以勉强及格的分数进入高唐一中的他发愤苦读，每日挑灯夜战，很快成绩名列全县第一，而且一直保持这一记录。1980 年，魏东芝 17 岁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生化工程系。从落后的农村到我国最先进的大上海，学习、生活上有许多不适应，但他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见地。大学 4 年中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他待人宽、责己严，深得同学们的信任。当好团支书这个芝麻官在许多人看来是小事，魏东芝却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社会工作能力的一种锻炼，表明了他健康和成熟的心态。大学 4 年即将过去，不少同学忙着复习，准备考研究生。魏东芝却不急不慢，在考研的问题上他自有自己不随波逐流的想法。他认为是否报考研究生不仅有一个学业上是否准备好的问题，更有一个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工作、发展方向的全面考虑。不是人家都考了，我也要去考，而应该问一下，我为什么要考，选什么专业，选哪位导师。最终，他凭着自己本科生阶段良好的功底，几乎未做什么准备就轻松地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他的导师后来成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

5年的研究生阶段结束，戴上工学博士帽后，他走上讲坛。从一开始上辅导选修课到后来为本科生上大课，他都很投入。每次上课前他都认真备课，查阅大量资料。由于他本身的知识面广，加上认真地准备，真正做到了厚积薄发。许多学生对听魏老师的课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和热情。两年的执教生涯使魏东芝得到了一种训练，使他能静心地梳理自己这些年的学习心得，提高了自己的知识综合能力，也确立了他在竞争激烈的大上海立足的根基。

从中国走向世界

魏东芝出国是较晚的，不是他没机会，而是他对当时不断升温的出国热有自己不为潮流左右的想法。当时，在读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出国的机会对他而言并非一次，但他对这个问题想得很透：许多人争着出国，其实国外也并不一定能提供好职位。相反，国内的机会开始多起来。关键不是出不出国，而是看有否适合自己的岗位和机会。很多人都出去了，国内的机会就多起来。他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同样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当需要出国的时候，就应该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去进行对等的交流。

现在有类似魏东芝这样想法的人肯定多起来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这种清醒的出国观是能让人翘大拇指的。

1992年8月魏东芝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当时年仅29

岁。同年9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拔,魏东芝以高级学者的身份赴日本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进修和合作研究。在日期间,魏东芝汲取一切对自己、对国家有用的东西。日本京都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学府,在生物反应工程方面更有世界级的权威。即使如此,魏东芝仍秉持自己贯常的为人风格,虚心好学、不卑不亢,在学术上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日于一长,日方专家反而对他礼遇有加。一年期满前,日方专家表示可以帮助延长工作时间。魏东芝婉言谢绝,如期回国。在日方专家眼里,魏东芝是个不同凡响的中国年轻学者,欢迎他随时去交流访问。

1995年8月,魏东芝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并任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随后被批准为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此他开始了崭新的创业历程。1996年9月魏东芝教授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犹他州立大学作3个月短期访问和合作研究,这是他第一次以生物工程教授的身份用英语对讲英语的专家作专题报告。开始时两个大学只安排3次,后来一讲,美国人立即就增加为9次,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开始讲前,魏教授毕竟有点担心,由于我们国内的实验条件较差,自己有的这点东西,美国人可能早就有了。但从听众的反应及所提的问题中,他明白了,我们的水平绝不在他们之下,我们的工作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比他们逊色。在访美期间,两所美国大学与魏东芝签订了非常具体、实在的合作协议。

之后,魏东芝教授每年出国访问、讲学1~2次,目前,

在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合作伙伴、朋友和学生。

诚信与实力竖起一面产学研旗帜

魏东芝教授本人所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制药工程和生物催化工程，这属于国际前沿、国内急需的交叉学科热门研究方向。凭着他特有的对学术发展和实际应用的洞察力，他所领导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1999 年元月，在前期成功合作的基础上，魏东芝教授和山东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赵志全总经理，凭借一个科技人和一个企业家的胆识、魄力、开拓的思路和超前的理念，使华东理工大学和山东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接，组建了联合体——鲁华生物技术研究所，鲁南制药为鲁华所投资 2000 万元，专门建造了生物工程科研大楼，研究所的发展目标是“产学研联合体国内第一”。鲁华生物技术研究所也就此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型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药物基因组学、微生物工程、生物催化工程、生物分离工程、分子生物学、分子药理学、中药现代化和新药开发等 8 个研究室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实验室装备达国际水准，在全国高校中屈指可数；科研队伍从原来的小集团作战，发展成了一支高职称、高学历、高素质，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既成熟又年轻化的集团军。目前，他的研究所已从国内外引进了一批专家学者、博士、博士后，建立了一支拥有 30 名研究人员（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其中高级职称 13 人），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近 100 名的科研团队，谱写着一部团结、凝聚、

求实、创新的团队创业史。这种高校与企业间的大型合作，是高校走出产学研一体化新路子的成功范例。这种成功源子魏东芝教授所倡导的“欲做好事，先做好人”、“诚实和信誉比什么都重要”、“敬人、敬业、务实、创新”。

以魏东芝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于2002年获得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生物技术药物规模化制备技术平台”，这也是凭借这一产学研合作的特色和优势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总投资3000万元的国家重大课题，而且这有可能使他的研究所在今后生物技术药物规模化制备的科研与产业化方面成为全国的龙头。

家庭与事业的和谐

谈到魏东芝的发展及成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出生子高唐县赵寨子乡西炉头村的孙明。她同样毕业于高唐一中，15岁进大学。俩人在大学期间交流学习和生活心得，畅谈理想和志向，这成为俩人事业、家庭发展的基石。孙明现在是国内外著名的上海市重点中学——位育中学的化学高级教师和业务骨干。虽然她同样繁忙和出色，但对丈夫的辅佐和支持始终是第一位的和义无反顾的，并为此甘愿在自己事业的某些方面做出牺牲。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赢得了事业、家庭的双丰收。魏东芝和孙明俩人从零开始，同甘共苦，能够立足上海并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这是高唐人的骄傲。

在科学的王国里遨游

——略述我的工作成果和治学体会

张洪生

我1967年出生于高唐县琉寺镇营坊村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农村大多是民生艰难。回首往事，我并不为当时童年生活的艰苦而寒心，令人心酸的是我那虚弱的身体。1977年仅十岁的我得了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大病的疾病，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疾病反复发作，最后导致我在上高中后不得不休学整整一年，复学后因为看病而请假更是家常便饭。本来脑力劳动需要强健的体魄和经常的体育锻炼，但在整个中学阶段以至其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运动对我来说简直是奢望。果又成因，余绪绵延。体育锻炼的缺乏和服用药物的副作用严重降低了学习工作效率并对身体产生其它不良影响。由于身体的原因，我高考填报的志愿大部分是医学院。熟悉我成长经历的朋友，每每谈到我的过去都会唏嘘不已。在整个青少年时代，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辛和世间的风风雨雨，使我过早地得到了启蒙，懂得了用理智搜寻。皇天不负苦心人。我1984年从高唐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工作在水利建设战线上

大学毕业前夕，我顺利地考上了河海大学的水力发电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1991年毕业后，因为急于报为人憨厚老实、经济拮据的父母于万一，并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回到了山东，在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工作。在山东工作的短短五年内，共参加了十五项水资源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优选引黄供水工程沉沙方案》被收录到水利部优秀青年论文集。完成的主要工作是：1、作为QC（全面质量管理）小组组长和发布人负责淄博市引黄供水工程沉沙方案综合评判QC小组，依据书面材料和出色的现场答辩我取得了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一致评为1994年度山东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2、参加了淄博市引黄供水新城水库工程总体规划工作，并负责完成其中的《沉沙方案综合评价》和《供水系统优化调度》两个专题报告。该项规划被山东省水利厅评为优秀规划一等奖，其中这两个专题报告起了重要作用；3、参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华北水资源管理模型项目，为项目负责人。该项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4、负责或参加编写了《合资建设广北第二水库供水工程技术经济论证报告》、《胜利油田孤岛第二水库工程初步设计》和《山东省利用长江水近期规划意见》等多项成果、资料工作。

人对事物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通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悟到规划设计工作对知识的要求是“横向到边”，科研工作的要求是“纵向到底”；

对工程师工作的主要要求是要知其然，工程师是工作在“必然王国”里；对教授的要求是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教授是工作在“自由王国”里。考虑到自己的性格特长，我对人生道路的坐标和航向进行了微调，我选择了——

奋斗在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

我在工作了整整五年后又回到河海大学海岸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此时，我上有白发苍苍、年老体弱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孩，自己体质较差，所攻读的专业又和过去所学的专业差别不小，困难可想而知。但无论多么艰难，强烈的事业心使我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将汗水和智慧抛洒在科研道路的开拓中。如果说我儿时的启蒙老师从心底喜爱我，我的中学老师对我悉心关照，那么我的博士导师则使我见识到了一代宗师的水平和风范，他以高超的学术造诣指导、鼓舞和激励着我，以鲜明的治学风格感召着我。从此，我在科研道路上扬帆启程。2000年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体会到了研究工作的艰辛，也品尝到了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诱人乐趣。在几年的学习中，我为我的研究工作殚精竭虑，矢勤矢勇，努力探求其可能的解决途径。于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直接工作，而是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我的研究工作。2002年我从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在这里，我作为年轻的

学术骨干承担起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

经过努力，我在这几年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防工程建设，为将祖国建设成海洋强国和造船强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完成的主要工作有：作为主要人员完成了一项国家"九五"科研攻关项目和一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淤泥质潮滩动力学研究初探；完成了包括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在内的多项横向科研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岸水域水流中波浪传播的数学模型及其应用和近岸水域波浪与浮式结构物相互作用的研究；国内最大的港口工程项目——洋山深水港工程中的多项科研课题；一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从攻读博士研究生到现在的几年时间中，我已在中文核心期刊以上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1篇，其中有17篇被世界上权威的论文检索系统《SCI》和《EI》收录，8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

严谨是科研工作的内在要求。在真理面前，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人人平等，不能迷信权威。我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纠正了被称为世界著名波浪理论专家的美国学者在一篇学术论文中的理论推导错误，该篇论文是他用了十年心血在这个研究方向的集大成，我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的同一期刊《Coastal Engineering》上。我是学校第一位正式给博士研究生开设《水波动力学》的教师，采用的教材是美国工程院院士来华进行学术讲座时集众家研究成果而编写的应用数学类讲稿。该书虽只有300页厚(32K纸张)，但从头到尾都是理论公式的推导

和数学模型的建立，然而却存在许多推导和印刷错误。为了彻底弄清理论的来龙去脉，为了避免误人子弟、以讹传讹，我却用16K的稿纸推导了300余页。为了讲授好这门课，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我的心血没有白费，听课的学生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学高为师、身正是范，这是对大学教师的要求。无论世事如何变换，“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这更是我对学生经常的嘱咐。研究生在起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艰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此时，我会详细地向他们阐释我的观点：做学问不要迷信，只要研究方向正确，年轻人就能所向披靡，这是年纪大的所不能比拟的；在科学研究的艰难探索过程中，要沉着坚忍；要善于从理论、逻辑和实际中发现科学问题；在进行科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养成良好的学风，锤炼出自己的治学风格。对于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我总是给他们改三遍，对于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个标点符号都不会轻易放过，并和他们一起探讨文章中的问题，从而以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学风。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们对于每一篇文章都要慎之又慎，“一文千改始安心”。

经过几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我感触很多。其中最深的体会是我感悟到中国古老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精髓所在，感悟到“大道致简”的真谛所在。因此，我在工作

中总是追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统一。我每天接触的是烦杂的理论推导和冗长的计算公式，有时自己虽然成功地进行了理论推导，但仍感到难以直观想象；有时虽然已从理论上给学生交待得清清楚楚，但学生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这都需要我旁征博引，用最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归纳。虽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这背后隐藏的则是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对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需要自己平时的观察和思索。很多高深的理论都可和身边经常发生的最简单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只是平时人们的观察思索不足而已。经过辛勤努力，我终有所得。用简洁的语言、浅显的道理和常见的现象解释了不少高深的理论，学生们听后都感到非常直观形象、易于理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感到通过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辨证综合的思辨，进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会令人豁然开朗、心旷神怡，非常有利于自己的科研教学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常常回想起我的童年，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这都因为——

故乡情深

高唐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是他们养育了我；那里有我的老师，是他们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娃儿培养到高中毕业，并将我送入大学的校门；那里有我的同学、朋友，是他们和我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窗，和我保持着无私的纯真友谊；那里有我的恩人，是他们曾帮助我于危难之时！我回到家乡，心中的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亲不亲，故乡人。家乡的人民和政府也在

关怀着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在此，我向故乡的父老乡亲们道一声：衷心的感谢！祝您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我虽然远离高唐，但总是心系家乡。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为家乡做了一些实事，几次为家乡的基本建设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解决了资金上的困难。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继续以百倍的努力，争取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家乡人民争光，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随着事业的发展，我将争取为家乡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3 年 8 月于上海

农业环保战线的女兵

房　方

1999年秋一次去聊城采访的机会，我偶然认识了浦碧雯，一个热情大方，性格直爽，办事风风火火但不失沉稳的女性。回济后又一次偶然的相遇，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成为朋友，对她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浦碧雯，高唐县固河镇浦庄人，196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1980—1986年就读于高唐一中。1988年8月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1994—1997年在山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检测站工作，现任省农业环境保护检测站综合科科长、省农村能源职业技能鉴定站鉴定部主任，是高级农艺师。她在农业环境保护立法、宣传、教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村能源职业技能鉴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主要表现在：

农业环境管理方面，参与了调研、起草、制定《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此条例已于1994年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从而扭转了我省农业环保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把《条例》贯彻落实到实处，参与完成制定了《山东省农业环境监察员管理办法》、《山东省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已由农业厅颁布实施；参与调查处理污

染事故多起，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起草完成了1993—1997、1997—2000、2000—2003年度山东省省长与农业厅厅长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内容，并完成了总结验收工作，农业厅因此多次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参与起草完成《山东省生态农业建设管理办法》、《山东省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山东省生态农业"九五"规划》等规范性文件，参与开展了生态农业试点县创建活动，使全省生态农业建设规模由村户发展到县级，拥有国家、省、地（市）级生态农业试点县46个，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业环保宣传教育方面，组织创办了《山东农业环保》季刊，主编了20多期，编发稿件近百万字，印发近5万份，充分起到了宣传农业环保方针、政策，介绍、推广农业环保和生态农业先进技术经验的作用，多次受到农业部和厅领导以及国内同行的好评。其中40余篇稿件多次被农业部环能司主办的《农村能源与环保动态》和兄弟省市简报摘用，扩大了山东农业环保的影响和知名度。同时，积极撰写论文和专业书籍。她作为副主编的《农业环境保护指南》一书已经由国家海洋出版社出版。作为主要编写人员的《山东省志·环境保护志》、《农业志》、《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撰写的《农业增长桶理论与应用》、《无公害农产品理论探讨》等多篇论文在《农业环境保护》、《农村经济研究》、《山东农业》、《农业资源与区划》等国家及省级重点刊物发表。先后在

《大众日报》、《山东农业》、《农业知识》、《山东环境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新闻、科普文章30余篇。多次被评为《农村能源与环保动态》优秀信息员、《山东农业》优秀通讯员。组织、参加农业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农村能源技术培训班30多期，培训人员1500多人。

科学研究与应用推广方面，作为主要完成人的《农业生态环境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包开发研究》获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立法研究》课题获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研究》获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研究成果已在全省乃至全国农业环保立法、生态农业建设和信息统计系统产生了积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产生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十多年来，她在农业环境保护战线上不断完善充实提高自己，虽是女性，但对任何事物都不服输。她从未放弃学习深造的机会，工作中她更是全身心投入，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1997、1999年她先后被山东省农业厅授予巾帼科技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被国家环保局、农业部、科技部、共青团中央等四部委评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先进个人。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高唐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海内外高唐人续辑
作者 =
页数 = ２４０
ＳＳ号 = 0
出版日期 =
Ｖｓｓ号 = ８０１０８１２５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军旅文人画家韩静霆＆易水
附：韩静霆简介
走近孙大石＆张志忠
记忆犹新＆王开
杜鸣与《爱晚亭》＆王琴整理
故乡情＆王国骧
姜德明的文学世界＆施斌杰
附：姜德明自传
刘志诚传略＆张春亭
自叙——告家乡父老＆刘福盛
附：刘福盛简介
我从事雷达研制事业＆周怀仁
我人生的春夏秋冬＆刘爱华
求学之路与教学生涯＆韩民忠
我的新闻人生感悟＆杨风山
军医范启申简介＆文史科整理
李振泉自传
国防科研一兵＆朱明华
我的事业之路＆李燕
一片丹心鉴古今＆马怀超
老兵新传＆张根山
齐鲁艺苑一棵草＆鲁华
难忘故土深情——我的军旅生活中的几个片段＆王连水
创新永远是美丽的＆夏园园
附：姚望简介
海外游子　情系高唐——记美国ＤＤ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海博士＆曲海霞
我向家乡汇报＆王吉红
献身海军装备事业的人——记博士高工刘东风＆文史科整理
生物工程界的科技精英——魏东芝教授＆乡晴
在科学的王国里遨游——略述我的工作成果和治学体会＆张洪生
农业环保战线的女兵＆房方